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

BOOK

内部资料 非商品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

引言　长征是……

1935 年 11 月 9 日，陕西甘泉县南面象鼻子湾一个打谷场上，经过一年多长途征战的红一方面军举行全军干部会议。这是 1934 年 10 月开始长征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军干部会议。满面倦容的毛泽东伸手向后梳理了一下长长的头发，站起来做长征总结：

“同志们，辛苦了！”

会场上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两眼放着光芒屈起手指接着说道：

“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六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军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全场再次响起轰鸣的掌声。

毛泽东甩了甩头发，用更加激昂豪迈的语调说道：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①]

毛泽东那宏亮的湖南乡音在打谷麦场四周的山谷里久久地回响……

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各种形式赞美和讴歌长征的作品，不知涌现出多少，红军英雄们的长征业绩，震撼着中国和世界亿万人的心灵。但当我们今天重新回味五十多年前毛泽东那感人至深的语言，仍被毛泽东那人民必胜的坚定信念和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所折服。

要知道各路红军是在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被迫踏上长征征途的。此行北上，前景如何，一直是索绕在人们心头的悬念。

何叔衡，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没有能够随队长征，被留在苏区，

[①] 杨成武《忆长征》第 254-256 页。

当他知道自己被留下后，就准备了清酒花生，约老战友林伯渠作竟夕谈。临别时，何叔衡把自己穿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互嘱珍重。

瞿秋白，要求参加长征，未被批准，吴黎平请他到家里喝酒、道别，他情绪特别激动，喝了大量的酒。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

果然，何叔衡和瞿秋白在红军大部队出发后，双双牺牲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

随大队长征的呢？

方志敏，奉命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结果，突围不成，被捕就义。

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冲破了一道道封锁，已经进入陕北了，但却在一次遭遇战中，壮烈牺牲。

湘江之战，八万多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后人用“血染湘江”，来描述这场恶战，就连一直坚持左倾盲动的军事指挥、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也一筹莫展了。他拿起一支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划再三。

的确，长征的前途如何？中国革命的命运如何？“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林柏渠的诗，道出了人们的心声。

而今长征终于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了，作为这场威武雄壮的历史史诗的总导演，毛泽东能不自豪吗？尽管十几块苏区只剩下西北一隅，尽管全国三十万红军仅存三万，尽管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大军又蜂拥而来，但毛泽东以他独有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眼光，高度评价了长征胜利的伟大作用，并英明地预见到：“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长征，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则是这场伟大历史转折的掌舵人！

荆卿豪气渐离情

毛泽东是从于都踏上长征的征途的。

1934 年 9 月，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被迫同优势的敌军拼消耗、打阵地战、结果人数越打越少，苏区越打越小。9 月下旬，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中共中央不得以做出撤离根据地的决定，命令各军团逐步退到以于都为中心的各指定地点集中，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先行离开瑞金云石山，到于都部署工作。

在于都，毛泽东住在北门外河屋，这里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一所用卵石铺地的院子，迎门是一棵茂盛的黄檀和两棵松树，后院是两棵大袖子树和一棵大樟树，院墙周围是许多青翠的竹子，幽静恬雅的环境，微微拂面的秋风，但却很难驱除深深郁结在毛泽东心头的烦闷。

在夕阳余辉的沐浴下，毛泽东漫步于都河畔，万千思绪象奔淌的于都河水一样越流越远……

第五次反“围剿”.面对蒋介石 50 万大兵压境，博古、李德等人一改过去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反而以劣势的装备和兵员，以硬碰硬的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自己和刘伯承等多次力争，终未被他叩接受，结果，先是黎川失守，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的联系实际被敌切断。接着，又坐失联合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的良饥，使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解除了后顾之忧，一举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攻占广昌。博古和李德等还不醒悟，继续分兵把守，使红军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牺牲惨重。至 1935 年 5、6 月间，东路敌军已占领苏区的沙县、将乐、泰宁、龙岩、连城；北路敌军已占龙冈并进驻广昌以南；南路敌军已占领筠门岭；西路敌军已进至兴国西北。根据地日渐缩小，红军大量减员。

刘伯承因力谏而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下派到五军团任参谋长。彭他怀痛骂他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骂又有什么用呢？李德等我行我素，战至 9 月，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的白衣岭发动进攻；南部粤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根据地不守已成定局。

想到此，毛泽东愈发烦恼和沉痛。作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毛泽东此时心情之悲愤，是人无法全面体会得到的。

峥嵘岁月稠

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下，我们党开始创立自己的武装。毛泽东独辟蹊径，提出“上山下湖”。他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这个只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大兵的教书先生，凭着信仰和胆略，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毅然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暴动。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创建红军的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的，就说起义队伍进军方向的选择吧。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原定进军方向是会攻长沙。但起义之初，由于强敌反扑，参加秋收起义的各部农军相继失利。怎么办？是循当年国民党先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之路吗？不行，在前不久举行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携九军、十一军、二十军共三个军二万多人之众进军两广，仍在优势敌军的围击下失败。何况秋收起义的队伍这时已只剩下一千多入，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到浏阳文家市集合。然后率部队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山区进军。这是一个不得以的选择，但它确实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想到此举竟是后来进一步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起点。但是改变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就这样迈开了。

再说进军湘赣边山区的途中，部队迭遭挫折。毛泽东向农村进军主张的坚决支持者、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中敌埋伏牺牲。身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此时也很惨，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被挂破了数处，脚也在行军中磨破化了脓，走起路一瘸一拐；更严重的是旧军官不听指挥，曾经当过黄埔同学会的宣传科长的黄埔一期生师长余洒度，就带头起哄，这位黄埔军校的骄子，昔日颇受校长蒋介石、教育长邓演达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青睐。这时他激进地坚持已不可能实现的起义初衷，要队伍去攻打长沙。[①]更多的旧军官和士兵、农民等，则是对前途丧失信心，不少人纷纷扔下枪当了逃兵。起义队伍入数锐减，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了。毛泽东不急不躁，他把部队带至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他废除军队内的旧制度，实行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建立起士兵委员会，特别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从而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那时，毛泽东在领导军队和指挥打仗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但这恰恰应了他后来的一句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一开始就按照一种全新的方式创建和领导军队。既不同于苏联，更不同于国民党和和旧军阀，而完全是在实践中摸索。

比如改造井冈山地区的农军首领袁文才、王佐，他没有象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简单地把他们视做土匪头子杀掉，也没有沿用旧军队封官许愿、金钱拉拢一套手法，而是做具体的分析。他们是穷苦出身，政治上有进步倾向，袁文才还是党员，有一定的群众拥护，但又有不少江湖人的毛病。毛泽东对他们以赤诚相见，第一次见袁文才，他不带大队武装，只带三五随从，

[①] 余洒度在三湾改编不久，就以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名义到了上海，脱离。共产党，加入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黄埔革命同学会的反蒋工作，1931 年被捕，他又背叛了邓演达先生，彻底投到格介石门下，在国民党军队中搞“政训”。后来，连蒋介石也抛弃了他，以贩卖鸦外的罪乞将他枪毙。

还给缺少枪枝的袁文才送去一百条枪。袁文才大受感动，立即撤去埋伏防变的人枪，杀猪宰羊招待毛泽东。在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何长工等真诚耐心的帮助下，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很快被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这对秋收起义的队伍能够站住脚和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就一反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这样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和军队将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敌强我弱形势下革命军队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这种消极的转移，逐步变成了在敌人统治的边缘建立红色政权，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积极战略进取。

在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上，毛泽东也没有采用过去一切正规军的战略战术，他是中国古代绿林豪杰和当地农军领袖同敌人“打圈子”等战术中，逐步悟化出一套适合那时敌我力量对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 1928 年 4 月迎回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建立起红四军后，毛泽东就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这成为红军作战原则的基础，就是运用这一战术原则，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同优势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四军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了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1929 年 1 月，毛泽东为粉碎湘赣敌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又运用这一原则，做出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主力向敌后方赣南、闽西挺进，“围魏救赵”，牵制敌人，粉碎其“会剿”的决策。在他和朱德率领下，红四军“红旗跃过订江，直下龙岩上杭”，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基础。

仗越打越大，红军越打越多。1930 年 12 月 30 日至 1931 年 1 月 3 日，按照“撤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五天两仗，歼敌一万多，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干净利落地粉碎了蒋介石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五个月后，1931 年 5 月 16 至 31 日，各路红军遵照毛泽东集中兵力失打弱敌，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由江西富田福建建宁，“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 3 万余人，缴枪 2 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二十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接着，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军，在 8 月上旬到 9 月中旬，打了六仗，共歼敌 3 万多人，缴枪 1 万 4 千余枝，粉碎了蒋介石亲自统率的 30 万嫡系部队对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使得“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进一步扩大，包括 21 个县，250 万人口、达到全盛时期。毛泽东麾下的红军，也由刚到井冈山时的不足一千人壮大到 3 万多人。

这一幕幕“漫天飞雪，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毛泽东历历在目。每念及此，顿生无限的豪迈和感慨。

正当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整套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逐步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强有力的挑战。

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学习和培养过的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中央根据地。同时，他们也把苏联的一套套建党、建军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搬到了中国苏区。特别是 1931 年 1 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中央的统治地位后，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去了中央代表团等“钦差”和干部，全面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张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各个都是“科班”出身，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有留过洋，又不修边幅的毛泽东，他们显得更具有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由于他们大多是以贯彻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代表身份出现，似乎就更不容置疑和抗拒。而事实他们的理论指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的。

他们一到苏区，就以高高在上的领导口吻说：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①]接着又指责 1930 年 6 月成立的红一军团前委（毛泽东是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和中央苏区（毛泽东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 1931 年 11 月 1 日至 6 日的赣南会议（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们就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旦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

毛泽东素以不畏权威，敢于坚持真理而著称。他那种“不信邪”的勇气，常为世人赞叹。但也不尽如此。请看 1927 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教训时的一席后：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紊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当年毛泽东在讲这席话时，可能不无懊侮之意。但也许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在 1931 年面对手持中央和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左”倾错误执行者，毛泽东没有丝毫的疑虑和畏缩，他坚信自己在四年多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了做法是对的。

1932 年 1 月，为贯彻上海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提出要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在审时度势后，旗帜鲜明地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如果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毛泽东的意见未被采纳，结果攻打馈州严重受挫。3 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局领导继续贯彻中央“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坚持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毛泽东反对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方针，指出攻打赣州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只能进行运动战，不能冒险去进攻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300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心城市，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不对的。他主张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范围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这实际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同城市中心论的一次交锋，苏区中央局自然不会听毛泽东的意见，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分为中、西两路行动。毛泽东随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前进。途中，毛泽东说服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指挥中路军改向闽西发展。苏区中央局终于接受这一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指挥东路军占龙岩。攻克漳州共歼敌约 4 个团，俘敌 1600 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在漳州筹款 100 多万元。

攻漳州获胜，打赣州受挫。两条路线，两种结果。这更坚定了毛泽东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决心，也大大激怒了“左”倾冒险主义者。

1932 年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一份长电，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毛泽东及其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这是与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这份电报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发出公开反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号令。

毛泽东没有被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所压服，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他和总司令朱德从战场实际出发，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北移，在乐安、宜黄、甫非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为第四次反“围剿”设计了一张战略蓝图，后来的四次围剿”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设计发展。

然而，这一训令却引起中央局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于 10 月 1 日电示前方：“我们坚决不同意 9 月 26 日训令的军事部署。”接着，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会议的焦点是第四次反“围剿”应取什么方针，是贯彻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呢？还是采取毛泽东主张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呢？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操持下，批评了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做法，指责毛泽东和朱德颁发的 9 月 26 日《训令》是“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是所谓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会议“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中央局领导人提出：前方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总责，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以便前方战争领导“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但最终毛泽东还是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到后方养病。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探望、安慰，毛泽东坦然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10 月 12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毛泽东“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 月 26 日，周恩来正式被任命力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没有完全听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令，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和朱德坚持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七万红军，连战连捷。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枪，

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境地并没有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改变。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 1933 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为了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以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为满足，他们看到毛泽东在广大军队和地方干部中所受到的拥戴，他们开展起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以彻底清除毛泽东的影响。

1932 年 10 月间，毛泽东在汀州傅连瞳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福建省委（亦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那里住院。毛泽东找罗明谈话，对罗明谈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上）杭、水（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扫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天，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 1933 年 1 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在报告中把毛主席与斯大林并称为“我们最好的领袖”。

罗明报告惹来了大祸。2 月 15 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地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普遍展开。福建省较高较老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 年 2 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毛泽东的亲弟弟，谢维俊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先后提任寻乌县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邓毛谢古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中央局排挤毛泽东表示不满。“左”倾冒险主义者讥讽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邓毛谢古却说：“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围剿”斗争中，邓毛谢古机动作战，不与敌人死打硬拼。“左”倾领导者对他们大力不满，指责他们“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即逃跑主义”，“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绝对反党反国际”，是“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小集团”。接着，在江西全省开

展反“江西罗叫路线”的斗争，把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撤了职。

在军队中也开展了“反对经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因“左”倾错误指挥造成的黎川、浒湾战斗失利，而被移罪撤职判刑，罗荣桓、腾代远、李井泉、余泽鸿等一批军队干部，也受到了打击，并被撤换。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领导这场斗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有倾遍于国中”。又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①

毛泽东本人也被彻底剥夺了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 年初在“二苏大”上，又免去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闻天充任。毛泽东再次被架空。

“左”倾领导者兴高采烈，博古曾兴奋地说：“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哈哈！”

踏遍青山人未老

毛泽东在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仍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等调查报告。他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和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李维汉在回忆毛泽东当时情况时说；“他（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①]

在做好政府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注。眼看着根据地在一片片被敌人占领，而“左”倾领导者仍指挥红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多次犯颜直谏。

1933 年 9 月中旬，敌北路军正准备由北向南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人的进攻目标可能指向黎川一带，他及时地向中央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②]这个建议和中央负责指挥军事”三人团”关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是相抵触的，自然没有被采纳。

1933 年 11 月 20 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在福建事变的酝酿阶段，10 月初，第十九路军派出代表陈公培（吴明）、徐名鸿来到瑞金，携带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以潘健行（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谈判，毛泽东、朱德亦多次与陈公培、徐名鸿会见、谈话，取得了一致意见。10 月 26 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互通商品贸易，互派全权代表互驻等。这一协定的签订，从政治上推动十九路军走向反蒋，十九路军领导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即于 11 月 20 日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使蒋介石“围剿”中共苏区的东部战线倾刻崩坍，这是前四次反“围剿”中从来出现过的有利形势。对于这一事变，在毛泽东的参与下，中共临时中央的政治上利用了它，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看到，这是转变战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主张在军事上也利用它。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①]一次在李德住处召开的军委会上，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 338 页

[②] 《萧劲光回忆录》第 132—133 页。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版第 219—220 页。

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苏、浙、皖、赣四省交界的地区去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要堡垒对堡垒，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的保垒政策归于失败。”[①]彭德怀也曾向中央提出类似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②]如果实行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必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也能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据参加这次“围剿”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③]福建事变被镇压后，蒋介石曾对其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说：“过去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④]可见，如果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得到采纳、实行、第五次反“围剿”必将出现另一番情景。

然而，博古、李德坚持用教条主义眼光看待事物，把十九路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不原意在军事上支持十九路军。他们斥责毛泽东的建议是“放弃根据地”，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拒绝打击东调去镇压十九路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却把红军主力从东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他们不愿意利用福建事变这个粉碎“围剿”的有利时机，致使良机坐逝。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于 1934 年 1 月下旬，立即重新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左”倾领导者要求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短促突击战术顶住敌人的进攻，并向敌人的堡垒阵地攻击。从 1 月下旬到 3 月底，红军在阵地战中连连失利。4 月，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昔战 18 天，接连失利，广昌失守，中央苏区逐渐缩小。反“围剿”陷入缺少回旋余地的非常困难的境地。

然而，红军在北部战线广昌苦战失利时，南部战线会昌却“风景这边独好”。1934 年 4 月，毛泽东来到了南线会昌，直到 7 月间才回到瑞金，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方门户，粤赣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一到会昌，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到部队调查研究，参加粤赣省委会议；找苏区边沿地区的县区干部谈话。他指示在筠门岭打阵地战的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他说：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

[①] 伍修权：《往事沧桑》第 101 页

[②] 《彭德怀自述》第 184 页。

[③] 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文史资料选辑》第 45 辑。

[④] 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文史资料选辑》第 45 辑。

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①]

当时因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在会昌等地出现群众倒向敌人的“反水”现象。对此，毛泽东指示说；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同时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争取“反水”群众加到我们这边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方强他们重新作了战斗部署，会后主动地有计划打了五六个小胜仗，并在一次夜袭中把敌一个加强营大部歼灭，使敌人较长时间龟缩在筠门岭，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始终没能占领会昌。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地方工作也改变了“左”的错误政策，作了深入宣传，“反水”的群众态度转变了，不再向敌人通风报信，而是转向红军报告敌情了。中央苏区的南部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和巩固。

一个月后，毛泽东进一步向前线深入，他来到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看望干部战士。

5 月间，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组成的中央团来到南线，他们严历指责筠门岭失守是退却逃跑，对红二十二师的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师政委方强被关进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其他师团干部也受到错误处理，部队情绪波动很大。这时，毛泽东对该师干部说：“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为革命不惜自己的生命，前面哪怕是刀山，哪怕是火海，也要闯过去。因为我们是红军战士的指挥员，战士们在看着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研究情况，从出现的问题中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深入细致地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从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这样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①]

毛泽东在反“围剿”的紧张时刻，足迹踏遍会昌前线各’地，对南线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听取了粤赣军区司令贝兼政委何长工的汇报，一同分析了敌人，认为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可以为我所用。他们详细分析了陈济棠的情况。陈济棠是粤军地方军阀，“围剿”军南路军总司令，他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偏安广东地盘，永据“南天王”宝座，并不想为蒋卖命。他深知蒋介石反复无常，居心叵测，他知道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石两鸟，借刀杀人”，他在派部队向药门岭进犯时，怕蒋抄他后路，颇有后顾之忧。他在攻占筠门岭后，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的架势，骗蒋晌械，暗地里却派人前来，找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企图借苏区作缓冲，避免蒋军直接进入他的防区。蒋虽已察觉，斥陈“借寇自重”，但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慧眼识微，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目前仍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做以卵

[①] 方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南方战线》：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 149—151 页。

[①]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 155 页。

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谈到当前部队的行动时，毛泽东说：“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还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强调地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的本钱。”[①]

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开阔了何长工的眼界，为他以后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停战协定，打下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央红军顺利突围作了铺垫。

毛泽东身在会昌，心系全局。调查有得，及时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1934年6月22日，他在会昌发出《关于粤赣地区作战及七军团在瑞金待机问题给恩来电》。关于红军战术，他提议应选择“群众、地形及隐蔽条件均好”的，“加紧全力训练，加紧敌情侦察”、以待机行动；当向敌出击时，我们的战术“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敌”。当时中央军委拟将军团调住南线，加强与粤军作战，毛泽东认为陈济棠有与红军“明打暗和”之意，进攻不积极，不宜将红七军转入调往南线，提议红七军团仍“以瑞金待机为宜”，并可从南线调一部分主力红军下来配合地方部队，肃清苏区内部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铲共团”，以巩固苏区内部。[②]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改变了红七军团南调的部署，十余天后，红七军团踏上了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转战的征程。

毛泽东在会昌巡视、工作了两个多月，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使部队的作战和苏区的建设都发生了积极的巨大变化，与北线屡战屡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带领一些同志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极目四望，浮想联翩，以如椽大笔写了《清平乐·会昌》的光辉词章：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南线形势的好转；并没有改变整个战局。1934年7月，毛泽东从会昌一回到瑞金就面临着战略突围的严峻形势，他那才得稍许舒展的盾头又紫皱起来。

[①]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29—130页。

[②] 《历史的丰碑》第30页。

告别苏区

中央红军决定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项饭其重大的决策。毛泽东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却无缘参加这决策。是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无暇顾及自己情感上有无失落感，立刻转向为这个预料之中又不愿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那时，毛泽东最关心的莫过于战略转移的方向。但组织没有说，毛泽东虽然仍为关心也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资历去打听。聂荣臻回忆：一次他同林彪去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到这里来呀？”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问：“什么任务？”聂答：“要转移。”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谈到这里，毛泽东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林、聂也不便再谈转移的问题。关于这次看望，聂荣臻评论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①]

从会昌回来，毛泽东仍住在瑞金沙洲坝。这时局势越来越紧张，敌人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敌机常来沙洲坝狂轰滥炸。8 月，中央政府和军委搬到瑞金以西的岩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在这里，毛泽东每天工作非常繁忙，白天开会，搞调查研究，晚上经常写作到深夜。他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默默地力战略转移做着准备。反“围剿”的战争，是他经常注意的中心。为此，他写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的文件，由中央政府发行科用蜡纸刻印后发到各县、区，指导当前的斗争。

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有一次来向毛泽东请示工作。当时，中央政府在石城烂泥坑有一个“金库”，存放着作战和打土豪缴获的金条、元宝、银元、国民党的纸币等重要物资。毛泽民说：“敌人很快就要到石城，这个金库不搬就等于送给敌人了。”毛泽东问：“你们搬到哪里去？”毛泽民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他们告诉我，敌人已经到了滕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①]按照毛泽东指示，各种钱币被分到了各军团。

毛泽东很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战友的生死去留拴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了，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共他一些同志也提出同样建议。博古同意了。王稼祥的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瞿秋白，曾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左”颂领导者不喜欢他，不让他参加战略转移。毛泽东得悉这一决定后，很同情瞿秋白，向中央建议让瞿秋白随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 210 页。

[①]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 106 页。

红军一起转移，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张闻天也向博古提议让瞿秋白随红军一起走，博古也没有同意，这样，瞿秋白希望参加转移的愿望未能实现，后来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何叔衡、刘伯坚、瞿秋白、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有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力他们留下后的生死而担忧。其实，连他自己的去留他都把握不了。有材料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战略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江淹在《别赋》中，把离别时的痛切和难舍，写得凄凄惨惨。毛泽东在长征前也有过一场离别。

1934 年 9 月，毛泽东奉命到于都部署工作。毛泽东知道，此去就不知何时再能回到瑜金了。他召集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称之为“青山会议”），布置善后工作。他在会上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撤高苏区的决定，并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①]

安排工作后，毛泽东这才回家与妻子贺子珍和儿子毛岸红（毛毛）话别。贺子珍，江西永新人，学生时代投身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5 月，在宁冈茅坪与毛泽东结婚。她对同志城恳热情，干工作沉稳老练，大家亲切地称她贺大姐。

小毛，是毛泽东的小男孩，是 1932 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岗位后降临人世的。稍长，天真、活泼、懂事，毛泽东非常喜爱。在被排挤打击、心情郁闷的那些日子里，小毛给毛泽东带来了欢乐。

想到要和娇妻爱子离别，毛泽东紧锁的眉头愈加难以舒展。抱着小毛亲了又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他又不能独自吞咽这离妻别子的苦水而瞒着母子不说。贺子珍敏感地觉察出毛泽东的神情的变化，她问：“你今天怎么啦？好象出了什么事；”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的队伍坚持不住了，要撤离苏区。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他很动感情地对贺子珍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贺子珍伤感的程度远超过毛泽东，但她也是个意志坚强，心明大义的人。她强忍着生离死别般的痛楚，安慰毛泽东；“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毛泽东向毛毛投去深情的一瞥，然后和贺子珍互道“珍重”，就纵马奔于都去了。[①]

……

一幕幕往事象清澈见底的于都河水，在毛泽东脑海映现，为革命前途的担忧，政治上的失落和受打击，与亲人牵肠挂肚的离别，一齐向毛泽东袭来，毛泽东的郁闷和烦恼到了极点。他只有拼命的工作，以求解脱。

毛泽东一到干部，不辞辛劳，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检查赣南省各级政府的工作，召开各种会议，请工人、农民、赤卫队员和区、乡、村干部来座

[①] 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中央六十年纪念文选》第 318—319 页。

[①] 贺子珍后来得以随大队长征，小毛却托负给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毛泽覃、贺怡夫妇。后毛泽覃牺牲，贺怡工作变动，小毛又托负给老表，以后再也没有找到。

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干部座谈会上，他教育大家说：“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能搞强迫命令。干部有缺点，要向群众作检讨，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给大家讲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方法。

毛泽东天天密切注意战局的变化，凡有从敌占区或敌人刚占领地区来的商人和自己同志，他都找他们来进行详细询问，了解敌人的动向，以从中得出必要的判断和结论。

毛泽东已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①]但是他来于都后却主动承担了选择突围路线的任务。后来，中央红军就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顺利地渡过了于都河。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无法驱散的烦恼，使毛泽东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第二天高烧到 41 度，嘴辱干裂，两眼深陷，脸颊消瘦，呼吸急促，脸烧得通红。卫生员钟福昌给他吃奎宁片、打奎宁针，用冷毛巾敷额头，依然高烧不退。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吴吉清急忙打电话向瑞金梅坑中央政府汇报，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瞳得讯连夜骑马赶往于都，在毛泽东发高烧的第三天傍晚赶到毛泽东的病榻旁，经过观察，确诊力恶性疟病。在他的精心治疗和工作人员的细心护理下，毛泽东的病情才逐渐好转。第八天体温降到 37 度时，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又开始工作，傅连瞳等一再劝他多休息几天，可他回答的只是一句话：“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虽然大病初愈，但头脑时刻思考反“围剿”的大局。当时敌人逐步向苏区中心推进，苏区日益缩小，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毛泽东不顾过去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均被搁置，仍然向中央领导人博古写信，提出打破敌人“围剿”的新建议，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路线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的黄洈，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鄠县、茶陵、攸县，在衡山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兰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去。”[①]

信写好后，毛泽东在午饭后找来警卫班班长胡昌保和吴吉清，要他们二人把信送到瑞金交给博古。他表情严肃地嘱咐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你们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拴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②]

胡昌保二人接受了任务，立即赶路，从于都到瑞金，把毛泽东这封极其

[①] 伍修权：《我的历程》第 77 页。

[①] 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②]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 166 页。

重要的信送到博古手里。

可是，博古对这封信很冷淡，他与李德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破灭，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0 月中央红军离长征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毛泽东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他严肃地告诉他身边的战士多打草鞋，多准备干粮，他自己则仔细地清理文件。在获知有 30 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后，他派警卫员到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让她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同时，让她把他日用的衣物交警卫员带来，他将在于部随先头部队出发。

于都“扩红”突击队长刘英也在获准随军行动的 30 名女战士之列。毛泽东通知她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刘英是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派来于都扩红的。罗迈以严格实行“铁的纪律”著称。她不知这“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毛泽东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神秘而又严肃地强调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定，有特别任务啊！”不多时，罗迈也来电话通知她有“特别任务”——长征的行列。后来，刘英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刘英说：“你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毛泽东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①]

中央红军开始集结行动了。10 月中旬，毛泽东在于都谢家祠召开赣南省委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 200 多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动了感情。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从四面包围封锁红区，妄想‘断水捉鱼，，扼杀我红色政权，扑灭革命的火种。因此，我们红军主力就要‘顺水而出’，冲到敌人的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革命的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伯，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毛泽东对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非常关心。晚上，他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于都河边。这里于都河上已经架起了一座浮桥。毛泽东向工兵连长王耀南询问了搭桥情况。

王耀南则向毛泽东提出了红军战士心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呀？”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斩钉截铁地说：“是的，红军是要回来的！”[①]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1934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5 点多钟，毛泽东头戴八角红军帽，穿着上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斗笠，来到于都河畔。阴霾的天空透出一线落日余辉，萧瑟的秋风吹打着于都河水发出呜咽的声

[①]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①] 《关山阵阵苍》

鸣，成千上万的老表和战友拥到浮桥边，“ 你们千万要回来呀， ”呼喊声震撼人心。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

要离开这里了，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离开一批一起战斗和生活了五、六年的战友与人民，毛泽东的心揪紧了。他向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挥了挥手，大步迈上浮桥，从这里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

挽狂澜于既倒

长征，是在国民党军重兵进逼下迫不得以的行动。“左”倾领导者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中央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佳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本来，可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好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局面，打开新的局面。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懂得军事辨证法，他们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奉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想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台后，放下行装，再举反攻，消灭敌人。

但这一意图已被蒋介石侗悉。

1934 年 9 月 20 我中央红军出征前，蒋介石就曾致电其北路“围剿”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通报“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1]他命令薛岳作好围堵准备。蒋介石调薛岳、周浑元两路军追击，又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立即调集部队，全力进行堵截。蒋介石在红军的进军路上，一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布下四十万大军，采取围追堵截的战术，企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鉴于这种形势，在红军出发前，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经龙布西北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义、耒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但这个正确建议，没有被采纳。主力红军继续按原部署被引向蒋介石重兵把守的埋伏圈。

不仅如此，“左”倾领导者没有把转移作为一次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行动，而是实行了一次“大搬家”。他们组织了十分宠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人数一万多人，一千多付担子。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非战斗人员众多。还携带了大批轻重，包括需要几十人抬的笨重机器，如制造机械、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野战医院的 X 光机等坛坛罐罐都统统被带上了。行军时，以三军团和八军团为右翼，一军团和九军团为左翼，五军团殿后，从两翼和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作用。这不是一支准备打仗的队伍，而是镖局的保“镖”队伍。这样的军事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根本谈不上机动灵活地开展运动战，只能是被动挨打的掩护战。起初，为了隐蔽，避免敌机轰炸，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连同挑夫，近十万人的队伍，沿着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艰难地行进，拥挤不堪。平均每天只走三、四十里路，有时一夜才翻一个山头，一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这种速度怎么可以摆脱拥有现代武器装备之敌军的围追堵截呢？

脱离了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在“左”倾领导的瞎指挥下，面临着更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没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他不顾一次次建议被拒绝，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懈努力，想方设法减轻“左”倾错误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

---

[1]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他虽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不能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但他时刻关心长征的每一步发展。尽管他大病初愈，身体仍很虚弱，时常不得不在担架上行军，但他每到宿营地，仍象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在他的办公桌上摆上马灯、公文包，打开军用地图，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却自觉地在为全军的安危、长征的胜利操心。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洞察长征中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实践着他的名言："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①]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版第 160、161 页。

一次成功的统战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面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把守的。还在长征出发前的酝酿准备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和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何长工仔细分析了陈济棠的情况，以及陈与蒋介石的矛盾，认为大有文章可做。

如前所述，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有广东的地盘，永踞“南天王”宝座。陈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介石在驱使其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与广东接壤的西南地区，虎视眈眈。陈对蒋介石以重兵收买陈的部下，也很不满。陈深知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但因蒋介石控制南京中央政府，实力强大，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其真心并不想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指出：“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①]毛泽东一席话，使何长工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为何长工以后与陈济棠代表谈判的成功，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不久，毛泽东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对陈济棠开展双管齐下的军事和统战工作的建议。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对部队发出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的指示。

9 月，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是：“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三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徐参谋前来商定谈判地点、时间及其他有关事项。”[②]徐参谋携带陈济棠的信来到瑞金，周恩来接见了他，进行了热情的谈话，请他转告陈济棠，红军总部赞赏陈总司令的决策，准备派出代表团进行谈判，并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随后，朱德总司令致信陈济棠，对陈愿意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揭露了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卖国政策，阐明了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并经药门岭迅速运输等五项建议，还提出“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的提议。”[①]

陈济棠接到朱德信后，于 9 月 27 日复电说：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10 月初，中央军委即派何长工、潘汉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代表前往谈判。周恩来亲自交代任务和联络密语等事项，叮嘱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军委副总参长叶剑英说：“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

[①]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 128—130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江西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央苏区时期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期。

[①] 《朱德选集》第 18—19 页。

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②]

10 月 5 日，朱德亲自写了介绍信，内容是：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戎祺

朱德手启

10 月 5 日

10 月 6 日，何长工、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从瑞金出发，赶往粤军独立第一师第二旅旅部驻地——江西寻乌县一个寂静的山村，与粤方代表谈判。粤军派特务连前来迎接，当潘、何到达的交界的药门岭时，该特务连连长严直悄悄地对何长工说：“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又说：“何司令，不要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我们打败了你们，捞不到什么油水；你们打败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粤方准备了两顶四人抬的大轿，抬着潘、何，一路畅通无阻，于傍晚时分到达罗塘镇，被安顿在一个僻静地方一幢两层小楼房的二楼，粤方代表则住在楼下。第二天，在楼上的会议室里开始秘密谈判。谈判进行了三昼夜，成功地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 40 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谈判期间，何、潘收到了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参与谈判的粤军参谋长杨幼敏很敏感，问道：“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很机智，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表示祝贺之意。”何、潘心里明白，红军很快就要开始战略转移了。

谈判结束，何、潘立即回到会昌，周恩来派人来这里等候，并带来了一封信，告拆他们中央机关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他在于都等他们。何、潘立即赶往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经过及达成五项协议的情况。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①]

中央红军进行集结准备开始突围时，红军总部根据“互相借道”的协议，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将同红军谈判达成秘密停战协议的内容要点传达到前线部队少将以上军官，要求各部队认真履行协议，让路与红军通过，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②]

这次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代表的成功谈判，是毛泽东、周恩来、朱

[②]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 131 页。

[①]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

[②] 黄继祥：《关于中央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军事停战谈判的几个问题》、《历史的丰碑》第 191 页。

德巧妙地利用陈、蒋矛盾，举行谈判，建立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一大胜利。这次谈判的成功、停战协议的商定，使中央红军在突围战斗中得以较顺利的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这一胜利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第一道封锁线，曾被吹嘘为“钢铁封锁线”，是由碉堡群筑成。这些碉堡群是一年前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采用“碉堡政策”精心策划构筑的。碉堡大多建于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和山头，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多以砖石砌成，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形状、大小也下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时，敌军扼守在碉堡内，有无数枪眼可向外射击，由于红军的武器装备差，这些碉堡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妨害极大。顺利通过这道封锁线，不仅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更重要的在于这一举动突破了蒋介石一年来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和封锁，使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得以实施，使红军迈出了夺取长征胜利的第一步。而且，红军主力出故意料地迅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赢得了主动和时间，使蒋介石无法从容布阵，为后面红军突破第二、三道防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逆境中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夺取长征胜利做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心系党的集体领导

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陷红军于生死存亡般危险境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左”倾领导者的盲断专权。他们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加上他们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使人下敢怀疑其权威性。这样，党的集体领导被少数人的专断所代替，权力越来越集中，最后集中在“三人团”。

“三人团”，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决战失利之后，大约 1934 年 5 月至 7 月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是党中央当时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在“三人团”中，政治上和干部处理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转移准备和作战计划的实行，在“三人团”中，博古、李德起决定作用。

由于党在领导体制上的问题，正确的意见无法形成党的决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党内军委内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引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①]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被严重削弱了，甚至象长征这样大的举动，也未在政治局讨论，[②]可见“左”倾领导者的集权专制，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毛泽东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出来，必须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而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用党的集体领导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曾作出过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即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决定，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①]这一提议被接受了。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均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实际揭开了更换“左”倾领导，使党的领导转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序幕。

从 1931 年 4 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性质的认识。他从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绝不搞非组织活动。他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居于少数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性的大事，但他坚信党内大多数同志会觉悟，会回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党的立场上来的。而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整整一年来屡次失利的残酷现实的切身体会，多数人开始觉悟了，包括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于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开始发动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其对中央领导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41 页

[②] 1943 年 11 月 13 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①]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 47 页。

的斗争。

如果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中的一年里，毛泽东虽然向“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确是衷心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改正错误，从而胜利地打破敌人的“围剿”，使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航向前进，但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的想法，他只是把对革命前途的优虑深深地埋在心问。可是，当反“围剿”失败、中央根据地沦陷，特别是在不得不踏上长征征途的红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命运时。他挺身而出了。他开始着手组织发动撤换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因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是胜利还是灭亡！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的错误意图行动，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拖向绝境；而只有改换他们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新生的希望，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唯一的抉择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历史赋予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也是全党和全军对毛泽东寄予的厚望。

这段历史的经历者之一、现年 86 岁的老人陆定一，他在自己在封笔之作《陆定一文集·自序》中评价毛泽东和曾经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瞿秋白烈士时这样写道：“毛泽东同志比瞿秋白同志强在什么地方呢？论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他们都读得很多。论实践，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里，亲身经历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写到这里陆定一深信地引用了《左传》中称赞晋文公的话：“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

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他当仁不让，勇敢地站出来，“拉起旗帜干”。

毛泽东开始时很谨慎地将他的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他首先争取的对象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

长征开始，毛泽东因病坐担架，王稼祥因伤坐担架同行。每到宿营地，他又邀张闻天与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王稼祥 1925 年投身革命，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卷进了“左”倾教条主义漩混。1930 年回国。翌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同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在工作中有较多接触毛泽东的机会，通过工作实践他逐渐认识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中所阐述的建军思想，对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对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深感敬佩，从而逐渐地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在 1032 年 10 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剥夺毛泽东对红军领导权的错误决定。毛泽东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夫了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①]听了这些活，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崇高革命品质更加敬重。

王稼祥在中央军事会议上很注意倾听毛泽东对于军事问题的科学分析，从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水平，逐步形成了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态度。当“左”倾冒险主义者歪曲毛泽东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作

[①] 朱仲丽《忆稼祥》，《回忆王稼祥》第 222 页

战原则是“守株待兔”时，王稼祥公开予以驳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说是‘守株待兔’呢？”[②]1934年4月广昌决战之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指责说，“象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当时，张闻天同志在军事上不大在行，稼祥同志专门向他讲解自己的认识，解说广昌战役失败的原因，分析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这样，张闻天同志也开始对错误的军事指挥表示不满了。”[③]

王稼详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这样描述了这个过程：“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冈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①]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被敌机炸成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被震破。长征中他因伤坐担架随军行动，与毛泽东同行。他们行军时交谈，到宿营地也交流思想。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优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表示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毛泽东深入浅出富于哲理的话语，使王稼详深受启发，他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正确，他从革命的前途着眼，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毛泽东后来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①]

张闻天，又名洛甫，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0年末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原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之一。但他忠诚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曾说过：“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②]

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时，对毛泽东是既无成见也无偏见，既不了解也不重视的，也没有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中央让他分管政府工作的时候，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正常，毛泽东写的文章，他都在《斗争》报

[②] 王首道：《一位严肃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回忆王稼祥》第16页。

[③] 吴黎平：《王稼祥同志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回忆王稼祥》第29页。

[①] 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62页。

[②] 《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上予以发表。1934 年年初，“ 左 ”倾领导者派张闻天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排斥、架空毛泽东。尽管张闻天对毛泽东不太了解，但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因工作关系而联系密切起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接触和了解。张闻天就职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前任主席，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的长谈，他认真地倾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佩。有一次，毛泽东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到后深为感动，说：“ 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

1934 年 9 月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张闻天获悉后，立即要傅连暲去于都治病，使毛泽东的病得到及时治疗并很快治愈。这时，张闻天与毛泽东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大的意见与毛泽东的主张逐渐接近。

对于福建事变的态度是一个例子。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他们不愿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相配合；毛泽东主张配合，提出一个既可粉碎第五次“ 围剿 ”又可援助十九路军的正确建议；张闻天也主张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积极配合，反对博古他们把红军主力西调赣江方向活动的计划和行动，这与毛泽东的主张比较一致，而与博古产生了分歧。

在对广昌战役的看法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军委一次会议上讨论广昌战役时，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不应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大为恼怒，批评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 1905 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立即批驳博古的这种污蔑，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次冲突，加深了他和博古的矛盾。李德也是很关心中共中央的领导的，他对这次冲突很“ 关切 ”，他要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他的“ 劝告 ”：“ 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意思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同志不要闹磨擦，这是为了维护教条宗派的团结，也是为了防止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接近。

张闻天没有重视这句话，没有理会这个“ 劝告 ”，继续与毛泽东接近。博古与洛甫的矛盾继续发展。博古开始排挤“ 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步削弱。长征准备阶段，项英刚从闽赣巡视回来，又把张闻天派到闽赣去巡视工作，企图把他排挤出中央政府。在他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张闻天，使他深感不快，长征即将出发时。张闻天才从闽赣回来。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 三人团 ”决定，张闻天只是按“ 三人团 ”的通知办事。“ 三人团 ”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 三人团 ”决定，张闻天只是按“ 三人团。 ”的通知行事。“ 三人团 ”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极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 三人团 ”批准。中央政府可随军行动的高级干部，一律由“ 三人团 ”决定。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即使提出了意见，出不受尊重。瞿秋白向张闻天提出要求同走，张闻天表示同情，并向博古提出，但博古表示反对，瞿秋白也就未能参加长征。长征出发之前，“ 三人团 ”要把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泽东的提议未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在张闻天的眼中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他

开始同毛泽东倾吐心里话，表露对博古的不满。长征开始以后，他又与毛泽东进一步交谈，互相接近，互相合作。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①]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经常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交谈党和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由于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是当时每个党的高级干部都在思索的重大问题，因而他们也很自然把这个问题作为交谈的中心内容，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家样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使张闻天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深为折服。张闻天后来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①]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他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长征路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在不断接触中，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加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逐渐地，他出现了一个转变：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到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长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机。

毛泽东也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

此外，毛泽东还深入部队，调查部队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对于这一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非常反感。后来，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①]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对干部战士进行思想工作，这是他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优良作风。李德对毛泽东的攻击是错误的，但他这一段话，恰恰是毛泽东在长征中深入群众，积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78 页。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79 页。

[①] 《中国纪事》第 119 页。

极开展思想工作的一个证明。

正是在战争实践教育下，在毛泽东的启发说服下，党和红军高级干部首先觉醒，提高了理论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长征中实现战略转变打下了基础。

湘南争论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后，进入了湘南。这时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定沿五岭山脉，从桂北兴安、全州间西进，“不致北犯”。11 月 6 日、13 日他连续下令在湘水、潇水以东聚歼红军，12 日又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并调集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湘军、桂军共 20 多个师，部分粤军以及一些民团，[1]组织第三、四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情，应该选择什么战略方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了一场争论。11 月 6 日，在广东仁化的城口，毛泽东提议：“红军不要向文明旋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2]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五次“围剿”仍有可能。然而，博古、李德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命令红军仍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向蒋介石预设的封锁线前进。

红军继续西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窄不堪，湘、粤敌军从北南两侧压迫、中央军尾追而来，情况紧急。这时，红一军团首长命令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俺护全军通过粤汉路。李聚奎即命令一、二团在粤汉路以东继续抗击粤敌的进攻，他亲自带红三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到了全军的前面。当李聚奎率红三团到达乐昌地区时，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正在路旁交谈。周恩来见李聚奎到来，说：“你们来得好快呀！”接着他详细交代任务和具体方法，并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他郑重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李聚奎认真倾听周恩来的指示，并计算路上需要撒下多少部队，琢磨最后如何收拢这些部队，他担心沿途撒下部队太多，战线太长，收拢困难。

毛泽东就对李聚奎说：“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天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又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①

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从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第一次见到他。李聚奎这次又听到毛泽东过去在交代战斗任务时常说的大方向是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以往很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周恩来和朱德紧接着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在宜章甫北的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调集重兵，在桂北湘江边构筑了一道最严密的封锁线，即第四道封锁线，敌情非常严重。

---

[1]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 111 页。

[2] 将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的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当红军在郴州、宜章问时，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将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淑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1]博古、李德对这个建议置若罔闻。

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再次就进军方向提出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改道（州）、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1]这项建议又被束之高阁。

毛泽东有着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钢铁意志，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他不顾自己的建议多次被拒绝，仍以红军前途为重，不断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又向中央提出：“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2]这次建议的命运与以前的没有两样。

红军只好继续按蒋介石预料的路线前进。11 月下旬，红军越过都庞岭进入广西边境时，严重的敌情就在面前。这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改变进军方针建议，郑重提出：“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1]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讲了这场争论：“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立即向湘桂黔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李德的话从反面映证了毛泽东当年据理力争时之急切和坚决。

无论毛泽东等怎样坚持提出正确的建议，红军还是被博古、李德等引入到敌人四十万重兵的包围圈。

蒋介石在红军突破其第一、二、三道防线的过程中，调集粤湘桂三省及其嫡系部队共 10 个军、40 万兵力，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立即赶赴广西泉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南面的灌阳夏威所率的十五军密切联系，进行堵截；以吴奇伟第四、五两军主力和薛岳直辖的韩汉莫、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与贺龙和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以三十六军周浑元率领所辖三个师围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以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的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右翼突围道路尾追；以十六军李温珩率领所兼的五十三师，取道临武、

---

[1] 《彭德怀自述》第 193 页。

[1] 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2] 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1] 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蓝田，沿红军左翼突围道路尾迫，蒋介石的算盘是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重兵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于潮江东岸进行决战，以造成红军最大伤亡。蒋介石在下达这一战役的命令时，怕他手下的将领不认真执行，特别引用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己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陷入了敌人重围之中。从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红军在湘江边进行了突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恶战。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奋勇作战，终于突过了湘江，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也证明了毛泽东、彭德怀主张的正确性。

红军渡过湘江后，即进入了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当地叫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东西长 300 多公里，南北宽 100 多公里，其最高峰苗儿山海拔 2142 米，山峦重叠，树高林密，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在这里的行军途中，从党中央的领导人到红车厂大指战员都在认真地进行血战后的思考。李德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博古感到责任重大，一筹莫展，在行军中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

实践出真知。人们从胜利的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从失败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刘伯承说得非常对，他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占”。[①]

[①] 刘伯承：《回顾长征》。

转兵贵州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他立即调整部署，企图把红军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水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重新编组部队，把五路兵力编组为两个兵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率所部由东安向武冈前进；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率所部经新宁、城步、绥宁，节节截剿，另以两个师出洪江，位于梅溪口、长铺子附近，以一个师位于武冈、花园、瓦屋塘一带。在这一方向上部署了十五六个师的兵力，以堵截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中央红军北去湘西途中，修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布置好日袋，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在广西方面，桂军以四个师组成两个追剿队，向湘黔边境前进，尾追红军，阻止红军重返广西。

在贵州方面，黔军也在防堵，贵州当时有兵力一个军，但派系林立，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蒋在珍又各成一派。各派口头上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所能调动的只有自己一派的两个师五个旅十五个团。贵州方面是蒋介石围堵部署中最弱的一路。

这是中央红军面对的敌情。

只剩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向哪里去？这是当时关系红军命运的最重要问题。“左”倾领导者下顾红军数量锐减、去湘西道上敌情严重等情况，坚持北上湘西会台红二、六军团的原定方针。如果按这一计划行动，中央红军就将与五六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作战，三万多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毛泽东认为去湘西方向是敌人的防堵重点，红军不能北上与敌人硬拚，而应避强击弱，西进贵州。他与王稼祥交换看法，说明蒋介石已在湘西布置好了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王稼祥正为红军在湘江的损失痛心，为红军的出路苦苦思索。毛泽东的真知的见使他看到了出路所在，他立即赞同地说：“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

毛泽东又去找张闻天交谈，说明应该西进贵州，并应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的意见。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红军损失很大，同意召集会议研究。”[①]

1934 年 12 月 11 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后，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

[①] 罗明的回忆，载《遵义地区党史资料）第二期第 5 页。

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②]。博古支持李德的意见。按照通常的做法，李德一发表意见，博古一表态支持，问题就决定了。然而从通道会议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会上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向湘西进军路上的困难，竭力说服错误路线领导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布置好的罗网。他提出应立即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稍事休整，并在贵州创建新根据地。王稼祥和张闻天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与会多数人造成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

博古因部队受损，自己苦无良策，只得同意西进，改道贵州北上，因为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①]

李德见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首次遭到挑战，愤然中途离开会场。他在《中国纪事》中叙述了他坚持北上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计划后说：“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浦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指反对博古、李德错误指挥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四方面军）会师。”[①]

李德虽然中途退出会场，但他很关心会议的最后决定。会后他去问周恩来，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②]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了。这是自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他对军事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从此，毛泽东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贵州，是古夜郎国的故土。红军长征时那里是几个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即命令贵州军阀择要堵截。王家烈接电后，心烦意乱，他既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是红军对手，阻挡不了红军前进，又认为蒋介石总想排除异己，攫取贵州，但又不便也不能拒绝中央军尾追入黔。经过苦思集虑，他下了决心：“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③]。于是，他调兵至黔东防堵。至 12 月中旬，黔东南的从江、黎平、锦屏、天柱一线的兵力，还只有“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何知重师直属的两个营和周芳仁旅的两个团，以及各县的民团。防线很长，兵力薄弱。

根据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开始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

[②] 《中国纪事》第 124 页

[①] 《中国纪事》第 125 页。

[①] 《中国纪事》第 124—125 页。

[②] 《中国纪事》第 125 页。

[③] 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

芳仁旅第七团和格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使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时间进行休整。

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并未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于 12 月 18 日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上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持反对李德的主张，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建议放弃北进计划，继续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李德。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后来谈到黎平会议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指红二、六军团）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①

黎平会议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三人团"的专断，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黎平会议的决定，作为我们党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正式决定而载入史册。

12 月 19 日，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行动部署，决定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红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军委要红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要求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钳制川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20 日，中央红军按军委部署向黔北进发。

黎平会议决定向师以上干部传达，是在红军向黔北行进途中进行的。大家对黎平会议的决定，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红一军团由军团政委聂荣臻负责传达，当他传达到黎平会议改变了去湘西的决定，而去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传达到"在向遵义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干部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①

黎平会议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逐渐疏远，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②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因找到了正确方向而精神振奋，连博古也受到感染，从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眉。

---

① 《李聚奎回忆录》第 129 页。

② 《遵义会议文献》第 64 页。

在离开黎平后向黔北进军途中，一天，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通过。他们即到红一师师部来看望部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来了。他们听取了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等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他们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中，毛泽东说话最多，询问最多，他仔细地询问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因为战争指挥员，在部署部队行动时，是必须考虑战士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一步步走过来的等等实际问题的。

这一天，恰逢红一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口猪，领导同志听取汇报后就在红一师吃饭，炊事班一下端上好几盆肉，在长征路上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有的高兴地喊道："嗬，还有这么多肉呢！"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目睹此情此景的李聚奎说："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①]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他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在部队却传成"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说不好，就进行纠正，但纠正不过来，因为部队对李德的作风很反感，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

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途中，黔军"双枪兵"（每个士兵除有一支步枪外，还有一杆鸦片烟枪）望风披靡。红军一路凯歌行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就相继攻克了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城镇，直抵乌江南岸。

1934 年 12 月 31 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由于"左"倾领导者对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月：日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左"倾领导者在会上提出：主张中央红军不过乌江；在乌江南岸消灭小部黔敌及土匪；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要求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建立根据地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部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使黎平会议开始的战略转变得到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猴场会议，是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

[①] 《李聚奎回忆录》第 128 页。

会议的胜利召开进一步做了准备。

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所四合大院中宿营，有三间大房子，当中是会客室，西一间办公室，东一问是住房，硬木板上铺了很多稻草。因为是 1935 年的新年，警卫班的同志按中央苏区时的惯例，准备在这里开新年晚会。他们在迎门堆起了两个大雪人，有眼睛，有鼻子，身后插了一很大刀似的长木棍，煞是威风。他们又在办公桌周围摆了十几个大小不等高低不同的凳子，准备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首长来贺年时使用。还准备了毛泽东平素喜欢的东西如辣椒、炸豆腐、牛肉、醪糟等。他们考虑着毛泽东一路太辛苦了，盼望他能在这个老苏区也很难住上的好地方多住几天，痛痛快快地过个新年。

一切准备停当，夜幕已经降临。警卫员陈昌奉和小曾去到中央开会的地方迎接毛泽东。接近午夜，会议结束了。陈昌奉提着马灯照着毛泽东朝驻地走去。雪花飘扬，寒风刺骨。陈昌奉开口了：“ 主席，过年了，咱们该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了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

“ 怎么，过年的事情都准备好啦！ ”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 是呀！准备得可好了！还有节目呢！ ”小曾回答说。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 我们不能在这里休息，还有比过年更紧要的事情呵！ ”“ 我们要争取时间突破天险，打过乌江去！我们是红军，什么事情对红军来说最要紧？现在就是打仗，消灭敌人。突破乌江很重要。是一件大事。你们觉得这猴场就是个大地方了，不，大地方咱们中国多得很。乌江那边的遵义就比这里大，还有比遵义更大的。等我们突破乌江，打开遵义，在那里过年才有味道哪！ ”

毛泽东又扼要他讲了当前的形势：蒋介石派了薛岳、周 浑元等几个纵队，紧紧地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抢渡乌江，把敌人远远地甩开。

到达驻地，毛泽东看了布置，笑着称赞说：“ 可真有个过年的样子！ ”并告诉大家他已在军委吃过饭，不要再为他准备了。接着，便打开文件，准备开始夜间的工作。

警卫班的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劝毛泽东尝尝他喜欢吃的东西，微笑着期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不忍拒绝身边工作人员的好意和盛情，他要战士们在一圈凳子上坐下来，他坐在大家的中间，乐融融他说，“ 好嘛！咱们就在这里一起过年吧！ ”于是，大家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在乌江畔过了长征中的第一个新年。

吃罢年饭，大家都去睡觉了，毛泽东又独自在灯下 ”惯于长夜过春时 ”，思索着渡过乌江后的行动，规划着创造着遵义的春天。

初到遵义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汉置设县，唐改名遵义县。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矛头直指遵义。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下，红六团智取遵义。1935 年 1 月 7 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在中央红军到达遵义之前，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组织了“红军之友协会”（后改称“红军之友社”），准备热烈欢迎红军。1 月 9 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

在旧府衙前搭了一个临时台子，欢迎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党的杭日救国主张，说明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个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接着讲话，他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说明红军是为了解除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到这里来的。阐述了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于人”们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有很大的号召力量，文告号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 月 12 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小商贩，以及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①]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和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遵义三中学生黄颖，听了毛泽东等的讲话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他们简练通俗的语言，亲切平易的态度，朴素简单的服装，由浅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讲得很透彻，使我既惊讶又佩服。原来国民党诬蔑他们是‘红胡子’、‘红头发’、

[①] 遵义会议纪念馆：《毛主席在遵义》。

‘每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却是这样的和善可亲，文质彬彬。”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①]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一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于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①]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②]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立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并同努力下，在 1933 年红军曾发展到 30 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 30 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到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34 页。

[①]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 178 页。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 237 页。

来。”[1]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进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力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由于这次会议要解决从湘南开始的争论问题，而且是由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召开的，博古深知会议是会对他提出批评的。因此，在会前和会中，他们积极开展活动，以争取主动。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早就对博古、李德的指挥不满意，没有答应。凯丰即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1]

然而，召开遵义会议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关于反对王明路线的时机问题，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下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1]

伍修权说过：“最近听到有位者同志讲，遵义会议后，他曾问过毛泽东同志：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于，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2]

毛泽东不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是顾全大局的：在遵义会议上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展开严肃的斗争，也是从革命全局出发的适时的。

---

[1] 杨尚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1]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 241 页。

[1] 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

[2] 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

伟大的转折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参加会议的共 20 人。

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是他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①]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①]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64 页。

[①] 《中国纪事》第 132 页。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蓉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辨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再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①]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的“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还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耐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①] 刘伯承，《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

①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②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是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伟大功绩，称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在会议上，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了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也有少数人坚持错误。凯丰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他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一段时间仍坚持错误立场，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

---

① 1977 年 8 月 23 日《访问陈云副委员长谈话记录》，贵州省博物馆资料。

① 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

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和凯丰都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撤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李德受到了批评，对博古的批评很大一部分也是批评李德的。他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他要求随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仍然很尊重他，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然而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遵义会议极为不满，甚至到 70 年代初期，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仍然充满愤懑，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①]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改在川滇黔边发展。

遵义会议最后还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①]

会议还增选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扎西（威信）的行军途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水田寨宿营时，常委开会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达 40 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篇章。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的错误，这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对此，张闻天有亲身的体会，他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

[①] 《中国纪事》第 137 页。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42 页。

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①]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主要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共成立初期，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纲领和中央全会的决定都依赖共产国际起草。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而遵义会议，则是在失掉和共产国际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虽然参加了遵义会议，但他在会议上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再也不能对我党发号施令。我们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毛泽东则是最早实践这个结合的伟大旗子。毛泽东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①]又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①]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80 页。

[①] 1964 年 3 月 23 日同外宾的谈话。

[①] 1963 年 9 月 3 日同外宾的谈话。

全党所接受，这表明实际上他被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春城无处不飞花

春城无处不飞花。遵义会议象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巨大鼓舞。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热烈的欢迎。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委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其他各种方法向部队指战员进行传达。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象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喜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肖华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这是当时部队热烈情绪的生动写照。

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找在一起开会，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都非常喜悦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他们沐浴着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珍重地保存着遵义会议文件，精神振奋地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全团，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信心倍增。

在南线乌江边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乌江边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党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时，会场上顿时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刘少奇继续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是‘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又说：“现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二、六军团的胜利相配合，眼前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中国革命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当时军情紧急，遵义会议精神还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1 月 29 日，当红一军团第一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参谋找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卿、政治部主任谭政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

会议，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一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他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看？”

“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

“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

“还有三千多人。”李聚奎答道。

“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大多了一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这是红一师领导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①]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都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以后，2 月 10 日军委纵队召集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并提出了“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的战斗任务。当天，大家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不顾细雨濛濛、寒风嗖嗖，仍然聚精会神地倾听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细心琢磨会议决议的伟大历史意义。会后，各单位分别向全体同志作了传达，1935 年 2 月 19 日的《红星》报对此作了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地方工作部副部长凯丰参加了会议。遵义会议结束后，李维汉问凯丰会议有什么精神，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因此李维汉对会议精神不得而知。听了张闻天的传达，他才解开了迷团。后来他写道：“听了张闻天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是他说的，表明了他的坦率态度，说明了他还是位好同志。”[①]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在遵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庆祝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张闻天、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大家一致热烈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异口同心地说：“还是毛主席

[①] 《李聚奎回忆录》第 133 页。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 354 页。

来领导好，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我们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敌人就有钻不完的‘口袋’！”

总之，遵义会议精神一经和广大指战员见面，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胜利信心，重新焕发了强大的战斗活力，重振了红军的军威。

遵义会议决议也及时地传达到其他红军，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在江西坚持斗争中央军区领导发去了几份电报。其中一份简要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方面军高级将领参加，博古等负责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次行动他们要负责，这是严重的错误，但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参加了书记处的工作，另一份电报是对中央军区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认为中央苏区还是有办法的，根据具体情况好好做。你们来的电报情绪是不好的，对局势的估计有消极的方面。希望你们努力，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搞大的中央苏区是不行了。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接到这几份电报后，中央军区的电报机于2月中旬毁坏了，从此隔绝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接到中央电报后，项英与陈毅发生了一场争论。项英说：过去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陈毅则说：“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的。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样全党在毛主席的路线下团结起来完成长征。这是个妥协。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能没有联系？中央主要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导致了军事上的错误。”又说：“我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上台就有希望。毛主席这人懂得军事，五次‘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搞得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项英批评说：“你是迷信个人。”陈毅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相信毛泽东，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威信，博古等人没威信。朱毛原来是小队伍，从很小的队伍带大。你们是半截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一直败到遵义，怎么会有威信？人家毛泽东很少的队伍打胜了，当然不简单。现在毛泽东出来了，有了毛泽东就有办法。他一出来，群众士气一振。我就有这个信心。”陈毅预言说，“以前是外行来领导。现在是内行来领导。内部团结了，几千人就有办法，不要说几万人，三年五年以后又是一个大苏区。”[①]实践证明，陈毅的看法是正确的，时间过了长他的预言就实现了。

项英和陈毅对中央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领导中央军区实现了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向游击战争环境的转变，从而坚持了伟大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及时向红二、六军团通报遵义会议决议，给予工作指示。1935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分析了二、六军团周围的敌情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指出。

“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

[①] 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上），《军史资料》1985年第4期。

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一电报后，感到中央军委这次的提法和过去不一样，就打电报向中央询问。2 月 28 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把遵义会议精神向部队传达，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这两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当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说：“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我们坚定地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我们继续取得胜利。”[①]

2 月 28 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也把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通报了红四方面军，遵义会议决议全文则是在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才发到四方面军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在同红四方面军干部谈话时，都阐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张闻天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红四方面军党的支部中进行讨论。徐向前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中央来过电报，会议的正式文件，在长征中过草地的时候，我才看到。”[②]张国焘闹分裂召开阿坝会议围攻朱德时，朱德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当面质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吗？”又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成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

伟大的遵义会议，也引起了敌人的关注。蒋介石嫡系将领薛岳率部队从江西一直尾迫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他对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一向畏惧。1935 年 2 月他获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情报。他对此极为重视，一面迅速上报蒋介石，一面通报所属部队要谨慎行动。蒋介石从重庆参谋团贺国光和薛岳送来的情报中，得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情况，他喜忧参半。喜的是，他认为遵义会议表明中共和红军内部有分歧，意见不统一，幻想红军发生分裂，便于他各个击破。他企图利用红军长征遭到削弱，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机会，加紧围攻，聚歼红军。忧的是，他领教过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强大威力，怕他的部下不是毛

[①]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388 页。

泽东的对手，因此他告诫他的部下千万“不可轻敌”，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薛岳，叮嘱他：“今后作战，务必谨慎小心，稳扎稳打。”[①]

地球转动了五十个春秋。在长征过去了半个世纪的1985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②]

中共中央的调整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遵义会议一次完成的。

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决定一切，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这就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仍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博古仍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博古的领导发生了困难，继续领导没有人服气了：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又对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赞同。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庄子——水田寨宿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洛甫就成了中央的总负责人。在洛甫负总责期间，毛泽东积极支持他的工作，而他在领导工作中能够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他曾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洛甫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生动地比喻说，洛甫是个“明君”。

遵义会议后进行的另一项重大调整，就是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和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是李德擅权，独断专行。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限制了李德的擅权，使党的集体领导与军事民主得到了发扬，红军也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个规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仍然处于强敌围追堵截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讨论作战问题，洛甫每天要召开20余人的中央会议，实行集体决策。这种情况，是与紧急军情不相适应的，为了及时抓住战机，并保证毛泽东能够实施及时的指挥，急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于是三人军事小组就应运而生了。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之后，来到鸭溪、苟坝一带。在这里中央召开会议，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开始被否决，后来又得到尊重。有鉴于此，洛甫提议以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则提议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提议被通过了。1972年周恩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遵

[①] 李以劻：《薛岳部蒋军追堵红军经过》。

[②]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38、146页。

义会议开了以后，打仗如何打法问题引起了争论，“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城）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象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①]

1935 年 3 月 11 日前后，三人军事小组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正式成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当时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参加三人军事小组，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69 页。

神来之笔

遵义会议之后，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敌情仍然是非常严重的，仍然处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如何粉碎强敌的进攻，争取主动？这是摆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也是时刻萦绕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问题。

当时，敌我力量非常悬殊。蒋介石调集了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地方军阀部队约 150 个团三四十万人的庞大兵力，他们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有空军助威，有全国政权作后盾，粮食被眼弹药供应充足，运输比较方便。而中央红军仅有三万多人，武器落后，弹药不足，粮食被服给养缺乏，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空军，没有汽车。敌我兵力对比为 10：1，敌强我弱形势非常明显。为了克服被强敌围追堵截的困境，毛泽东运用其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动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

这次战役，敌方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中央红军方面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战场上的第二次直接较量。第一次是 1931 年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统帅 30 万大军向红军大举进攻，被毛泽东指挥的仅有 3 万人的弱小红军打得大败而归，损兵折将 3 万余人，蒋介石亲自品尝了毛泽东指挥艺术的厉害。

这次四渡赤水之战，蒋介石飞重庆，奔贵阳，自任统帅，亲督三四十万重兵，又以十倍的优势兵力运用第五次“围剿”中获胜的堡垒政策，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追堵而来。蒋介石并不是白痴，而是一个有很强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的人物。1938 年毛泽东曾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代、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①]

蒋介石的学习是广泛的，他读过《四书》、《春秋左传》、《尚书》、《易经》、《纲鉴》、《礼记》、学过周、秦诸子的学说和宋理学，还学了《孙子兵法》、《曾文正公集》，这为他打下了国学的基础。他很关心时事，爱读报纸，学习过英文、日文、俄文。

蒋介石酷爱军事。他曾东渡扶桑，入振武学校学习，并到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先当二等兵，后升为士官候补生。一年的高田士兵生活，对蒋介石影响很大，他体会最深的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他认为一国军队如要做到精强和富于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他很重视阅读与军事有关的各种著作，他看过《防海纪略》、《平浙纪略》、《定夷丛刊》、《太平天国外略》、《地形学》《蒲鲁美战略论》、《初级战术》、《西洋通史》、《拿破伦本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巴克尔战术》、《军事常识》、《日本军制学》、《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大演习战况地图》、《世界大战史》、《统率学》等。其中，对《战争论》和《巴克尔战术》（德国人著）两本书，他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对后一本书尤为重视，看过六遍以上。“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故文忠三集，手未暂释。”[①]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510—511 页，第一版。

[①] 王俯民：《蒋介石传》第 45 页。

1923 年，蒋介石奉孙中山命令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任团长。在三个月时间内，他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苏联党政军机关进行考察了解，参加了第三国际的会议，了解苏联的政治制度、革命史和党建情况，尤其重视对苏联红军的考察，参观了苏联海军、步兵一一四团和各类军事技术学校，回国后，在建立黄埔军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又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指挥作战，他对苏联军队的建制和战略战术有相当的了解。

尽管蒋介石留过洋，进过军事学校，熟读兵书战法，讲起军事来头头是道，在军阀混战中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军事韬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在四渡赤水的战场上，能否实现聚歼中央红军的梦想呢？在与毛泽东比军事韬略、比指挥艺术的交锋中能否致胜呢？

作为红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他没有留过洋，没有进过军事学校，没有军事方面的“学历证书”。然而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了解中国的优秀军事传统，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一套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他是集军事理论家和军事统帅于一身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决定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战胜敌人，他说：“国民党的士兵有两条腿，我们的战士也有两条腿，可是他们的两条腿，走不过我们的两条腿。”[①]

现在，毛泽东指挥的三万余红军与蒋介石统率的三四十万大军进行的四渡赤水之战即将拉开战幕。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后，蒋介石判断红军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回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后一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绝路。蒋介石在这三个方向都作了布防，而以主力部署在防堵红军东去湘西与北渡长江道上。

东面，以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进至乌江东岸沿河、思南一带布防，并渡乌江参加“追剿”。

西面，以滇军参谋长孙渡率步兵、炮兵六个旅十二个团二万四千人的兵力，布防于黔西毕节一带堵剿。

南面，以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部署于贵阳、清镇、修文、贵定地区，以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以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以桂军廖磊两个师进至黔南都匀地区；粤军三个师于 1 月 11 日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

北面，蒋介石令其驻川参谋主任贺国光和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以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国民党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川南叙永、古蔺和赤水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1 月 12 日，“川南剿总”组成，下辖 12 个旅 36 个团的兵力，布防长江沿岸，重点加强以叙永、泸州为中心的防御，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同时，蒋介石又令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鄂豫入川，速向黔北松坎布防，令徐源泉部急向黔江、彭水一带防堵。

1 月 19 日，蒋介石下达“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压迫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他命令薛岳部中央军、黔军和湘军大部速

[①]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 197 页。

向遵义前进，担任“追剿”任务；命令川军、滇军和徐源泉一部，担任“堵剿”任务；以徐源泉部主力和上官云相部为预备军，待命出动。

蒋介石把堡垒主义当法宝，在整个追剿长征红军期间他始终抓住不放。为了堵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他严令各部抓紧修筑碉堡，并在这一方向构筑了两道封锁线：沿泸州。叙永、毕节为第一道封锁线；以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为第二道封锁线。

蒋介石再一次希望在川江南岸把下央红军一举歼灭。

中央红军方面，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贵州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我党在贵州没有工作基础，红军处在两江（乌江、长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敌人重兵围追，因而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而四川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可以接应；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派系众多，矛盾重重；蜀道崎岖，交通不便，蒋介石向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较多。因此遵义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一渡赤水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中革军委立即部署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地区北进，准备北渡长江。预定的渡河点是宜宾到泸州一线。

1 月 19 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以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从松坎出发向西，直奔赤水；以军委纵队和红五、九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官店向赤水挺进：以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从懒板凳出发，直插江安。

1 月 20 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计划还规定：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密切的战略协同作战，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是非常重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的战略协同的。1 月 22 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发出了《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这是一个关系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毛泽东，日夜思虑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巧妙地与强敌周旋，把中央红军引向胜利的坦途。

根据军委渡江作战计划，中央红军三路纵队从 1 月 21 日开始，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开进。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于 23 日进占东皇殿（今习水），24 日进抵土城。随后向赤水城挺进。左路纵队红三军团从懒板凳出发，经李梓关、花秋坝、兴隆场等地，于 1 月 27 日抵达土城。

中央纵队于 1 月 25 日到达东皇殿，此时，侦察到川敌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已渡过长江，从綦江方向南下，企图阻击中央红军北上，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距离我军仅一天路程。

在从东皇殿向土城行军途中，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军委领导同志同行，共商歼敌大计。他们边走边察看沿途地形，发现道路西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军孤军深入，进至土城以东的屋其坝、黄金湾一线，我军就可以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歼灭敌人。

1 月 27 日下午，中革军委到达上城镇，红五军团进入土城东北地域，此时侦悉尾迫之敌两个旅四个团正向土城方向扑来。红军总部召开了会议，研究敌情，部署战斗。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迫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大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①]根据当时所了解的敌情，

[①] 1964 年 6 月 28 日一 7 月 1《访问江西南昌老红军座谈会记录》，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

红军总部下了决心：红一军团第二天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占领土城镇以东二至四公里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敌先头部队以迎头痛击。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和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

当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决定“我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消灭进占丰城坝，青杠坡之敌，九军团及二师应担任这一战斗预备队的任务。”

各部迅速作好了战斗准备，1 月 28 日晨战斗打响，红三、五军团向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敌军拼命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敌人遭到重大打击，阵地几不能守，红军也付出了不少代价。红军连续奋战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展战果。

当天，潘文华向刘湘报告：刻正以四个旅兵力“向土城猛攻”，“匪主力全在土城一点，合围之势已成，请各友军各派小部轻装截击，必可一网打尽。”红军在战斗中抓住了敌军一批俘虏。毛泽东发现俘虏中有四个以上团的番号，对敌人兵力的判断有错误，原来以为敌人是两个旅四个团，约六七千人，这时发现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同时发现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原来以为川军的战斗力与黔军“双枪兵”的战斗力差不多，实际上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并且红一军团已于上午沿赤水河右岸奔袭赤水城，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

敌人猛烈反扑，红五军团阵地被敌军突破，敌人抢占山头，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突进到镇东面白马山的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前有敌人猛攻，山后就是赤水河彼涛滚滚，若不能顶住并击退敌人进攻，将面临严重后果。

毛泽东发现问题后，立刻通知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

朱总司令决定亲临火线最紧张地段指挥作战。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朱德诚恳地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来到了前沿阵地亲自指挥，红军指战员士气大振。

下午，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动了连续猛攻，战斗更加激烈。红军子弹和手榴弹即将告罄，战士们拣起石头砸。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口次冲锋。敌人发动了更猛烈的第五次冲锋，一度突破红军阵地。被红军战士以刺刀、大刀砍了回去。

第六次冲锋也被红军战士杀退。

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刻，毛泽东立即命令军委干部团发动反冲锋。朱总司令赶到干部团亲自指挥。干部团的成员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战术思想明确，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术好，战斗力强。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指挥下，干部团以猛虎下山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一个猛冲，把敌人打得仓皇溃退。

下午二时过后，红一军团二师跑步返回增援，到达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红军的阵地。

当天，川军潘文华在报告中说：“午刻，共军一、三、五军团向我部猛攻，激战甚烈。郭部第八团阵地，地势低下，受敌瞰射，该团官兵伤亡过半，士兵伤亡更重，阵地几不能守。”

这次反击作战，陈赓指挥勇敢机智，干部团勇猛击退敌人进攻，立了一功。毛泽东称赞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毛泽东及时掌握战场形势的变化，鉴于在战场的敌人比原来侦察的要多，而且援军即将赶到，在战场阵地巩固以后，决心撤出战斗。他说：土城不能打：一、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①]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天下午，毛泽东紧急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同志开会，讨论战场形势。决定我军行动。毛泽东认为，根据当前敌憎，原计划由赤水北上，从沪州至疽宾之间北渡长江的方案已不可行。因此他在会上果断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力主动，不应与郭（勋棋）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上城渡过赤水河西进。”[②]政治局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按他提出的意见进行如下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作战科拟写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由朱德签署于 1935 年 1 月 29 日 3 时发给所属部队。《部署》规定：“我野战军拟于今 29 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并以红一、九军团、军委二、三梯队、干部团上级干部队为右纵队，军委直属队（第一梯队）、干部团及红五师的中央纵队，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主力为左纵队，分别由猿猴、土城下游和上游浮桥渡赤水河西进。

部署既定，立即分头行动，朱德、刘伯承迅速重返前线指挥。

红四团奉命到青杠坡阻击气势汹汹的川敌模范师的尾追，以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赤水河。敌我相距仅数百米，战斗形成了胶着状态，红一军团组织部长肖华奉命来到红四团加强战时政治工作。他对指战员进行战斗动员，特别强调这次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赤水河西进的重要意义，号召大家下惜一切代价完成阻击任务。他的有力动员，激发了红囚团指战员的高度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钢铁意志。

朱总司令来到了红四团前沿阵地。指战员们斗志大增。他仔细观察敌情，见撤退时机已到，果断下令后撤。红四团以一个营坚守阵地，两个营相继后撤。敌人子弹横飞，情况相当危险，肖华等同志一再请求朱总司令先走一步，他的每次回答都是两个字：“不行！”部队全部从前沿撤下来了，朱总司令依然在阵地上观察敌情，非常沉着。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又带 20 余人，重新冲上山坡，顶住敌人，保卫朱总。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也来到了阵地上，都盼望朱总司令快点回到安全地方去。然而，朱总司令又手持望远镜继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从从容容地回到阵地后面来了。他一回到阵地后面，杨成武就开口了：“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紧接着说：“我们急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朱总司令开心地笑着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哩！”

周恩来承担着组织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的紧迫任务。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道，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经贵州赤水县，到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

[①] 1964 年 6 月 28 日—7 月 1 日《访问江西南昌老红军座谈会记录》，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

[②]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 180 页。

420 公里，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这一带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百米，水深十·余米。要在一夜之间在这条桀骜不驯的赤水河上架设能渡过三万多人的浮桥，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周恩来迅速召集各军团工兵连干部开会，下达架桥任务，规定完成任务时间，提出了严格要求，架设浮桥，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两岸有整齐的道路和阻敌尾追的有利地形；二是要有船只；三是要有木板、门板、竹杆和绳索等。周恩来命令各工兵连立即到赤水河上下游沿岸收集船只，收买架桥器材。各工兵连迅速行动，在当地居民的热情帮助下，很快收集到十几只帆船及其他架桥器材。周恩来亲自带领作战参谋和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到赤水河畔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架设浮桥。

工兵部队抓紧施工。他们把收集的十几只帆船，编排在河面上沉锚固定，然后用竹杆把各船连接、绑牢，再在上面铺上一块块门板、木板。拂晓前，架桥任务如期完成，一夜之间，一座能同时通过三路纵队的轻便浮桥果然出现在赤水河上，“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

在工兵部队紧张架设浮桥的同时，朱总司令又指挥部队在浑溪渡口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

这两座浮桥的架成和夺取，保证了中央纵队和左路纵队的及时顺利渡河。

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前卫红五团二营在猿猴渡。经过激战，强渡成功，为右路纵队渡河打开了通路。

陈云紧张细致地在进行工作，他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奋不顾身地从阵地上把全部伤员抢运下来，逐个进行妥善安置；督促部队进行轻装，把笨重物资机器投入赤水河中。凌晨四时，任务全部完成。

1 月 29 日拂晓前，各路纵队开始西渡赤水河，晌午前，三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所有架桥材料全部作价付款后，随即烧毁了浮桥，汹涌的赤水河，阻断了敌人的尾追。

土城之战，川敌受到了沉重打击。毙伤敌一千余人，俘敌一部，粉碎了川敌妄图将红军“一网打尽”的恶毒计划。四川军阀刘湘以“迟滞不前”、“贻误戎机”力名，撤销了廖泽的模范师副师长兼第三路指挥职务，仅保留他旅长一职，要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土城之战，红军也受到较大损失，红一军团团政委赵云龙、红三军团团长欧阳盒不幸壮烈牺牲。

毛泽东既是高瞻远瞩、振聋发喷的军事理论家，又是叱咤风云、善于总结经验的军事统帅。每次重大战斗战役之后，他总要对优点和缺点、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于土城之战也是这样。后来在扎西（威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他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大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

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1]

毛泽东总结这三条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由于总结了土城之战的经验教训，就为以后三渡赤水打大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土城战斗进行中，毛泽东俯瞰战场风云，在危急情况下，镇定自若，应付裕如，胆略过人，当发现原来对敌情的判断与战场的实际不符时，果断提出改变计划，撤出战斗，渡过赤水，不与敌人死打硬拼，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毛泽东运用军事辩证法的锐利武器，善于从战场的实际出发，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变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灵活用兵的卓越指挥范例之一。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即进入了四川南部。四川军阀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对红四方面军取守势，对立足未稳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取攻势，在中央红军未人川境以前，就要把它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在他的命令下，“川南剿总”潘文华已将所部 36 个团，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严密封锁长江；并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长江上游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动员了民团和地方武装，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中央红军在川南活动时，先后在三岔河、叙永城遭敌截击，而且援叙敌军不断增加，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分析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正适合于敌人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战略要求，因而毅然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省扎西地区前进。2 月 6 日 1 时，朱德电令红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2 月 7 日 19 时，军委电告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 月 8 日，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滇东北扎西地区集结。2 月 9 日，军委进攻扎西县城。

红军突然改变方向进入扎西地区，大出敌人意外。蒋介石和川敌顿时失去目标，一时不明红军去向，不敢贸然动作，川敌潘文华 2 月 9 日电告所属各部：“刻下匪踪不甚明了。”严令各部“多派侦探侦察匪踪”，“并坚工严阵，勿稍勿延。”这样，使红军又赢得了一些休整时间。

2 月 9 日，中革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总结了上城战斗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当前敌情，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提出了中央红军当前应取的战略方针。他说：“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甫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应是当前的战略方针。[1]毛泽东针对有的人存在的思想顾虑继续分析说：“我们来到三省交界的山顶上，把国民党军也带到山下来了，国民党军敢不敢上山？他们是不敢的，他们上山吃什么？他们一定要在山脚下等我们。这样，有人就担心，我们能不

---

[1]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 181—182 页。一 126—

[1] 《红日照扎西光辉暖万代》，《云南日报》1977 年 9 月 17 日。——128——

能冲出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山连山，他们那里守得住，我们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冲出去，出去了还不让敌人知道。因此，这就要轻装，要精简机构，充实连队。”[1]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作出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动作战，回师东进，重反黔北的决策，还决定整编机构，加强基层连队的工作。

2 月 10 日，军委在扎西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

根据命令，各部队进行了缩编，除红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编制。红一军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由三个师缩编成四个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各缩编成三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整编中，还决定把笨重物资都精简掉，以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搞坛坛罐罐大搬家，既不利行军，又不利作战，把战斗部队变成了掩护队。虽然沿途进行过轻装，但仍不彻底。这次扎西整编，决心进一步轻装，笨重物资坚决甩掉。总卫生部有台德国造的爱克斯光机，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作了极大努力才搞到手，并想方设法于 1933 年运往中央苏区的。这台机器为治疗红军指战员的伤病曾经建立了不朽功勋。王稼祥遭敌机轰炸臂部受伤，是这部机器为他拍了片子，使医生得以取出弹片。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兴国战斗中受伤，住医院一个多月，因没有电爱克斯光机发挥不了作用，拍不成片子也就开不了刀。长征前夕，1934 年 10 月 9 日，周恩来到医院探望陈毅，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派人去把电台的一架发电机抬到医院里来，把已经包装好准备随军长征的爱克斯光机也重新打开，马上发电拍片，看清了碎骨部位，当场给陈毅做了手术。医生们都把这台机器当作宝贝，长征以来一直抬着行军，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一直抬到云南扎西。这次，这台机器也在精简之列。然而总卫生部长贺诚对这台机器感情深厚，说什么也舍不得把它丢下。毛泽东亲自抓轻装中的思想工作，他来到了贺诚面前，恳切他说：“将来全国解放了，还缺少爱克斯光机吗？蒋介石为我们准备好了，你去接管就是了。”经毛泽东耐心说服，贺诚才派医政局长陈志芳，忍痛把这台机器送到石坎杨家寨一户名叫杨保和的贫苦人家掩藏起来。

扎西整编时，军委决定抽调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干部团政治科长余泽鸿，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等，组成中共川甫特委。另抽红军指战员 200 余人及留下的伤病员，于 2 月 17 日，在离扎西四五十里的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后又组成川南游击纵队，人数最多时达一千余人。在川南地区积极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

在扎西，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大力帮助群众做好事，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红军扩大了三千多名新战士。

---

[1] 《红军长征过云南》第 8 页。

二渡赤水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西进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主要负责“围剿”红二、六军团，而以部分兵力参加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专门对付中央红军；以甘肃军阀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陕军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

蒋介石对第二路军的作战序列也重新作了划分：以嫡系吴奇伟部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棋部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锡珩部为第七纵队。蒋介石的企图是：将中央红军包围和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

蒋介石追剿长征红军，怀有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要剿灭红军，又要排除异己。1934 年 12 月，蒋介石在南昌对他的心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力政，共军人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地方军阀对蒋介石这一手是有警惕的。1934 年 12 月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时，蒋介石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当时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向龙云建议说：“蒋介石这次追堵共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有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井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力量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井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①]对孙渡的这一建议，龙云深为赞赏，他即委任孙度为第三纵队司令官，率滇军 6 个旅、两个新兵团共 14 个团又三个营；共二万四千人的兵力，出兵滇黔川边，防堵中央红军人滇境。

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各怀鬼胎，矛盾重重。这是一些可供红军利用的矛盾，而毛泽东也就是在巧妙地利用了这此矛盾。

蒋介石为把中央红军消灭于扎西地区，亲自作了分进合击的部署，以第一、二纵队从扎西东面和东南方向向红军攻击；以第三纵队从扎西西南方向的镇雄向红军进攻。以川军各旅从扎西的东北和西北方向向红军逼进；以第四纵队为预备队，在一、二纵队后面跟进。

刚于 2 月 6 日就任“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的龙云认为，滇东北地形险峻，交通不便，气候多变，给养困难，红军多系客籍，语言不能，行动艰难；而滇军熟悉地形、语言相通，地方民团早有组织，各路大军正向扎西地区并进；因此他认为红军“已人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国民党军事当局于 2 月 13 日公开宣布：“13、14 两日，当有剧战”，断言共军“决

[①] 孙渡：《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

难越雷池一步，”“可一鼓荡平。”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各路敌军纷纷向滇东北杀奔而来，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却命令中央红军神速东返，矛头直向敌军的薄弱部分——黔军王家烈部杀去。使战役态势迅速地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为了把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变为全体红军指战员的自觉行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于 2 月 16 日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告阐述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原因，中央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苏区根据地的意图，指出“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于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说明“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评价这个文告时说：“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蒋介石和他的指挥百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①]

国民党高级将领也看出了红军长征在战略上发生了“一大转变”，从此，“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倘佯，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②]

正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 2 月 13 日公开宣布：13、14 日将在扎西地区与红军“剧战”，“可一鼓荡平”时，中革军委已于 2 月 10 日开始部署东进，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 11 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2 月 11 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东进。军委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指出川黔边为我们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作战。2 月 14 日，红军已越出”雷池”，抵达古蔺、营山、摩泥、黑尼哨等地。

2 月 15 日，军委发布了《二渡赤水何的行动计划》，规定：“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淬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淬进攻而消灭之。”

2 月 18 日 21 时，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分析了周围的敌情以后指出：“现我处此各方有敌的河套中，急须远离迫敌，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我各军团首长必须认识这一战役的严重性，须在明（19）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在 20 夜及 21 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敌人没有睡觉，他们也在行动：然而他们战线过长，黔北兵力薄弱。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黔军王家烈为红军离开黔境暗自庆幸，他命令副师长魏金镛、侯汉佑各带一个团，至二郎滩东岸布防，防堵红军重返贵州。而

[①]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 179 页。

[②]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在太平渡方向则没有派兵防守，为红军渡河敞开了大门。

18 日下午二时，红一军团前卫二师抵达赤水河畔，太平渡无敌，红二师迅速控制了渡口两岸。

19 日，红三军团两个先锋团——红十二团和红十三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架搭浮桥。二郎滩东岸把丝坳制高点有黔敌两人团把守。红军迅速渡过了一个营，又渡过了后续两个营，这是一个背水阵。红军向敌人发动了冲锋，两团敌人似惊弓之乌，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渡口。

19 日和 20 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敌人企图在滇东北地区把中央红军“一鼓荡平”的计划落空了。

遵义大捷

中央红军重返黔北，又一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判断中央红军有“东与贺（龙）、肖（克）谋取联络之趋势”，急令黔军速往松坎一带堵截。在桐梓之黔军第四团立即开往松坎防守，留下两个连接防，旅长杜肇华亲率第六团赴桐梓一 136 一接防。为防中央红军向黔北纵深发展，王家烈急忙从贵阳到遵义坐镇指挥，并就近把驻湄潭、金沙的部队调往遵义集中防守。蒋介石命令确保遵义，薛岳急令留守贵阳的吴奇伟亲率 59 和 93 两个师速渡乌江，增援黔军，保住遵义，又令周浑元纵队向遵义靠拢，共同阻截红军向黔北纵深发展。

滇军因与川军发生矛盾，一时无法参加“追剿”。滇军孙渡在 2 月 25 日一份电报中说：“此次本军入川，因驻叙（永）川军种种阻挠，遂致粮秣及滇市行使，均感困难。复因土城方面，川军进驻甚多，对于任务地区，又未明白规定，”因此只得“暂行休息整顿。”[①]

川军潘文华，因怕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未敢集中全力“迫剿”。

毛泽东抓住敌人内部的矛盾，决定把打击方向指向黔军和中央军。

进入黔北后，中央红军进军的主要目标，就是桐梓和遵义。2 月 21 日，军委规定：“现我野战军任务主要是迅速脱离川敌，进攻桐粹，遭遇黔敌，对追我之敌则侦察戒备并掩护，在有利条件下则准备回击，消灭其一部，因此力争取先机，我一、三军团应日行七十里左右，用四天行程逼近桐梓，期于 25 日会攻桐梓，并准备沿途遭遇黔敌。”

红军各部队分头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红三军团在习水县回尤场召开了干部动员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做动员报告，他深刻他说明了当前战斗的重要意义，并说，敌人就象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最后他号召大家勇敢战斗，为消灭周浑元、吴奇伟纵队而努力，干部会后，各连队分别进行了动员。广大指战员纷纷请战，摩拳擦掌，斗志昂扬。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指挥战争，总是全局在胸，有一个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长时期的方针，既部署正兵，又部署奇兵，既考虑主攻方向，又考虑牵制方向，既慎重初战，又考虑第二仗、第三仗以致最后一仗的打法。中央红军重返黔北以后。毛泽东决心打一次大仗，根据敌情变化，他果断地决定：以红五军团三十六团在北面良村、双龙场一带阻止四川追敌；以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夺取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

这次战役，以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红五军团则以红三十七团力后卫，军团宣传部长张际春带一部电台来到三十七团，传达军委要他们停止前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北面来敌的指示。他说：三十七团“这次是配合主力重占桐梓、娄山关，回师遵义。敌人不来则罢，若来一定不善，任务很艰巨。军委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的手段；把敌人顶住三天或更多的时间。从现在起我们直接受军委指挥。”红三十七团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等听说红军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打大仗，又是毛泽东亲自指挥，都非常兴奋他说：“行呵！一 138——咱们这回又要打个漂亮仗啦！”广大指战员对完成这一任务

[①]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一一 137——

信心十足。

红三十七团巧施妙计，声东击西，诱敌牵敌，逐步把敌人引向温水方向，待敌人获知红军仅有一个团兵力，大呼“上当”时，红三十六团已经把川敌三个旅九个团的兵力牵制了六天之久，有力地保证了主力红军再度夺取桐梓、娄山关、遵义的伟大胜利。指战员欢呼雀跃他说：“毛主席指挥真英明，我们在这里‘牵牛’，兄弟部队在那里‘宰猪’呢！”

在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北线阻敌的同时，红一、三军团与干部团胜利地进行了遵义战役。

初战是攻克桐梓，军委规定红一、三军团于 24 日会攻桐梓，由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以一师一团为前卫，于 24 日晚抵达桐梓，随即攻城，战斗不到两小时，守敌两个连即弃城向松坎方向逃窜，红一团进攻桐粹，切断了黔军的南北联系。

初战胜利，红军指战员斗志更旺，王家烈却慌了手脚。25 日，他致电薛岳告急求援，告以遵义“只驻第一团全部，担任卫戍，”请“飞令各师，兼程到遵增援，以收歼灭之效。”滇军孙渡深恐落到黔军同样命运，自感孤危，于 27 日致电王家烈联络，称共军“攻陷桐梓，不胜悬念。贵部现在何处，及匪情有无变化，希随时电示，以便连络协剿为要。”蒋介石担心遵义有失，急令薛岳派兵增援，薛岳立派两师人速渡乌江，增援遵义，正适合毛泽东在运动中打援的要求。

毛泽东设计了第二仗，攻占娄山关。

娄山关，雄踞大娄山脉中段，海拔 1400 多米，关口 1280 米。中间公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地势险要，周围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誉。娄山关是川黔两省交通要道，是黔北门户，遵义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王家烈很重视娄山关的防守。派其精锐部队第六、第十五等团防守，由其第一旅旅长杜肇华亲自指挥，杜的指挥部设在娄山关以南山脚下的黑神庙。

夺取娄山关，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着。这一仗，关系到红军能否歼灭黔军，再占遵义，也关系到能否歼灭援敌中央军，扭转战局。2 月 24 日晚红一军团攻占桐粹后，当晚 24 时军委发出指示：应乘虚占领娄山关，以便我军以后作战和转移。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红一、三军团，并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红三军团到达桐梓后，立即辉师南进，向娄山关进军。

毛泽东和军委规定每个军团都确定一个团作军委预备队，必要时直接指挥预备队作战。红三军团确定第十三团作军委预备队。毛泽东亲自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打电话下达命令；速令十三团务必于今日（2 月 25 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山。彭德怀迅速向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传达毛泽东的命令，要求他们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

彭雪枫亲自对部队进行简短有力的动员，随即率部冒——140 一着毛毛细雨向娄山关进发。红十三团以迅速敏捷、机智勇猛的动作，首先夺取了娄山关隘口两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和大小尖山，并于当晚夺取了娄山关口。击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后，红十二团留一营在关口向板桥方向警戒，团主力退回关下向桐棒方向宿营。

当晚 23 时，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指示》，决定：“我野战军应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

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我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应干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直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健。”

彭德怀、杨尚昆立即指挥第十、十一、十二团投入战斗，命令第十二团协助第十三团从正面向娄山关以南之敌实施冲击，以第十、十一团从东面迂回板桥之敌，配合正面部队突击敌人。并指挥红一军团由长岗、大银厂出发，向石炭关进攻，攻占后，继向黑神庙东南之侧后迂回。

敌人企图夺回娄山关口。王家烈命令旅长杜肇华不惜一切代价“扼守待援”；命令其第四团沿道桐公路北上，从中路增援退踞娄山关南坡的部队；以其第十团、第十六团从板桥出发，从左右两翼包抄，企图配合中路一举夺回娄山关口。

敌我双方都在抢时间，比速度。

红军各路部队按照彭、杨命令迅速行动。25日夜，细雨寒风，道路泥泞。红十二团于午夜12时从桐梓城出发，向娄山关疾进。红十团、红十一团连夜从东侧迂回。红一军团第一团抢占了石炭关。

“飞将军自重宵入。”在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率领下的红十一团，经过一夜急行军，于 26 日拂晓突然出现在板桥附近，迅猛地向镇里发动冲击，敌人惊慌失措，伤亡惨重，仓皇逃窜。

26日，娄山关南坡守敌第六团连续组织反扑。红十三团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反扑，牢牢控制了娄山关口。红十二团接替十二团后，又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反扑，并组织突击队冲破敌人的防线。突击队二营五连连续突破了敌人沿公路设置的八九道障碍，把敌人赶到了娄山关下面的黑神庙。战斗进行中，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腿部负伤，由苏振华继任，参谋长孔权亦负伤。

战斗进行至下午8时，王家烈驻守在娄山关、板桥一带的四个团大部被歼，残敌向遵义逃跑。娄山关再度为红军占领，为回师遵义打开了通路。

红军告捷，敌军告急。26日，王家烈连续向薛岳发出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电报说：“我杜（肇华）旅在红花园、黑神庙、小箐、观音阁一带，与匪三师约万人，于有（25）日晨9时激战至育（26日）晚，伤亡极重。第六团、第十五团共计伤亡官兵六百余名。因陷匪重围，以致失利。”“现匪先头已进至板桥南端之观音阁。查其企图，似有扑遵之势。遵城兵力太单薄，守亦不易，现固守待援。”[①]红军在娄山关把王家烈打痛了，王家烈坚守遵义城的信心动摇了。

在红军重占娄山关后的一天，毛泽东从桐梓出发，登上了娄山关顶。向遵义方向望去，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正兴高采烈地向遵义前进，而一批一批的俘虏则哭丧着脸向桐梓方向走去。毛泽东找来红军指战员谈话，询问战斗情况，热情鼓励战士们努力杀敌，多抓俘虏。毛泽东又叫来了几个俘虏兵，询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什么时候到遵义地区来的？了解敌方情况。

毛泽东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的胜利而感到欣慰，他登上娄山关顶，极目四望，豪情满怀，文思潮涌，在“马背上”哼成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词章：

忆秦娥
娄山关
西风烈，

[①]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588页。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接着，毛泽东挥师进行了第三仗：重占遵义，当娄山关战斗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谋划夺取遵义及其以后的战斗了。根据毛泽东的作战意图，红三军团十三团特派员欧致富奉命带两个连，连夜驰往鸭溪和倒流水实施侦察。

26 日，红军占领娄山关、板桥之后，军委指示：估计遵义较空虚，薛敌韩汉英的九十三师和唐云山的五十九师今日以前不能到遵。一、三军团仍由彭、杨指挥、应乘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的韩、唐两师。

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遵义方向迅速猛推进，于 27 日拂晓进抵董公寺、飞来石一带。当天下午三时，军委鉴于遵义守敌除原有第一团外，其在鸭溪、湄潭之数团均可于今晚赶到，薛岳部的九十二、五十九两师可能干 28 日下午到遵义的情况，决心迅速解决遵义守敌，占领遵义。为此发布指示强调指出，情况如此迫切，而又是转圜战局的战役，要求红一、三军团集中全力实行迂回，务期于 27 日歼敌，勿使良机稍纵。

27 日下午，红三军团逼近遵义城外，于黄昏时占领了遵义新城。为迅速攻克遵义老城，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亲自与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团参谋长蓝国清一起到阵地前沿侦察敌情，观察地形，部署夜间的战斗。邓萍给团、营干部传达了彭军团长的决心：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攻下遵义城，以便明天歼灭增援遵义的中央军。正观察时，突然，敌人的冷枪击中了邓萍头部，不幸牺牲。邓萍是红军的优秀指挥员，英勇善战，深受红军战士的爱戴，邓萍的牺牲，红军战士深感悲痛，更激发了大家夺取遵义老城的决心。

当晚，红十一、十二、十三团向遵义老城发动猛攻，击溃残敌，终于在 28 日凌晨，赶在援敌中央军到来之前再次解放了遵义城。

邓萍牺牲后，红三军团首长致电中央，要求叶剑英去接任，中央同意了三军团的要求，于是叶剑英在转圜战局的关键时刻就任红三军团参谋长。

打援战斗即将开始，27 日，军委命令红一、三军团于当夜解决遵义老城残敌后，随即以精锐部队乘势跟追溃退之敌，直到与来援敌中央军接触，以侦察敌人的部署。并要求把部队集结在遵义城南适当地点，准备 28 日打援。还命令红五、九军团主力进到泅渡以南，作打援预备队。

吴奇伟率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增援来了，王家烈好似捞到了救命稻草，非常高兴，27 日下午 3 时，王家烈带着一排手枪兵前往忠庄铺会晤吴奇伟，策划反攻遵义的计划，王家烈兴高采烈他说：“ 中央军及时开到，遵义就有办法了。 ”吴、王同定：川黔公路（不含）以西，由吴部两个师向红花岗进攻，川黔公路（含）以东，由黔军第八团防守。指挥所位于忠庄铺北端。定于 28 日上午 10 时开始进攻。

红军进行了严密部署：红三军团以十团、十三团控制遵义附近制高点：老鸦山、红花岗、插旗山、碧云峰一线的山头，构筑防御阵地；以红十二团在遵义通贵阳的公路以西迂回，向敌侧背进攻，配合正面防守；以红一军团的三团和红三军团的十一团分别向懒板凳（今南白镇）和鸭溪方向迎敌、引敌；以红一军团主力进至遵义东南之水师坝及其东北地区，准备打击授敌，断敌退路。

老鸦山，位于遵义城西南，离城约二公里；红花岗，位于遵义城南约一公里，与老鸦山毗邻。两山并立，构成遵义城南面的天然屏障。红三军团部署了兵力坚守。

28 日上午，红三团和红十一团出发诱敌、红三团到达懒板凳时与敌先头部队接触，红十一团也在去鸭溪途中与敌接火。两个团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抗击，消耗、疲劳敌人。把敌人引到遵义城外后，红十一团即进入红花岗阵地固守，红三团也依山构筑工事，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

吴奇伟的两个师是强敌，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战斗力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然而它孤军突击，立足未稳，适合红军打歼灭战的要求。敌人被牵到了遵义城外，它以主力向红花岗、老鸦山一线红军阵地展开猛攻，企图二举夺取制高点，歼灭红军，夺回遵义，敌人炮火极为猛烈，打得阵地上树断枝折，石飞草燃。敌人向红十一团坚守的红花岗阵地猛攻，实施集团冲锋，均被击退。敌人转而向坚守老鸦山主峰的红十团进攻，以一个多师的兵力轮番进攻，正面攻不上就从侧面攻，并出动飞机助战，一度攻占了老鸦山王峰。战斗中红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壮烈牺牲。

军委命令：老鸦山阵地必须夺回来。彭德怀命令军委干部团从北向南进攻，红十一团从左侧仰攻，配合红十团进行坚持反击，迅速地夺回了老鸦山主峰。敌人不甘心苦战夺来的王峰又复失去，又一次次地发动冲锋，总是遗尸阵前，失败而归。

敌人继续向红十一团红花岗阵地和红十团插旗山阵地发动猛攻，同样地未能前进一步。

是出击的时候了。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红一军团立即出动。一军团接令后，迅速沿遵义城东南山脚，绕到敌侧翼一个山梁的松林里隐蔽集结，准备突击敌后续部队，同时派出一支部队直捣敌忠庄铺指挥所。

总攻即将开始，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军团侦察科长刘忠说：“你速去传达命令，告诉一师二师首长，敌二梯队正向前面山上运动”趁敌立足未稳，向正面运动之敌，进行猛烈的攻击。”[①]红一、二师首长接令后，立即向敌二梯队正面运动之敌发动猛攻。顿时，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敌后续部队撤退了，进攻部队惊慌了，敌机轰炸扫射弄不清目标了。敌西师之众迅即陷入了红军的重围。

下午五时许，红军发动总攻。红十二团、十一团的迂回部队逼近了敌人的背后，红一、三军团同时向敌展开猛攻，锐不可当，敌人“兵败如山倒”，闻风而逃。

当天下午二时，吴奇伟察觉红军正迂回其忠庄铺指挥所，战局非常不利，即与王家烈商量，决定撤退，并向薛岳报告，薛岳令其撤回乌江北岸防守，

[①] 刘忠：《长征的尖岳》，《风展红旗》（1）第 41 页。

不许退回南岸。下午四时。吴奇伟乘汽车向南逃跑，王家烈向黔西南窜去。吴、王只顾自己逃命，已经掌握不了部队。

残敌疯狂逃窜，军委命令：一、三军团要不顾一切疲劳，乘胜猛追，强调“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的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大战果到消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红一、三军团兵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猛追逃敌，红军指战员高喊着：“冲吁！杀呀！猛打猛追呀！不让敌人逃跑一个呀！开展缴枪捉俘虏比赛呀！把敌人追到乌江喝水呀！”的口号，连夜向乌江边穷追不舍，敌人已无招架之为，到处可以抓到俘虏。吴奇伟因兵败遵义，无法向薛岳交代，急得痛哭流涕，在到刀靶水（距乌江渡约 15 里）时，他哀伤他说：“好，我就死在这里吧！”他的参谋和卫士挟着吴奇伟向乌江渡逃跑，逃过乌江后，见红军已迫近江边，害怕红军神速地占领浮桥，南渡乌江继续猛追，使命斩断固定在南岸的桥索，浮桥被急波冲断，正在浮桥上的蒋军官兵，一齐栽入乌江。被丢在乌江北岸的 1800 余人，乖乖的缴枪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师——148—兵马大部被歼，这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3 月 1 日，遵义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战场广大，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红军 3 万余众，在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连续作战，猛打猛追，取得了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和八个团，俘敌近三千的伟大胜利。

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重振了红军的军威，极大地振奋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指战员们异口同声他说：“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红军战士称毛泽东是当代的“诸葛亮”。

遵义战役的胜利，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震惊。蒋介石暴跳如雷，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给部下打气，写长信给吴奇伟，勉励他“雪遵义失败之耻”，要求他今后“对飘忽无定之共军作战要慎重。”

遵义战役中王家烈损失惨重，他痛心疾首，自请处分。蒋介石借机排除异已，削去了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稍后又削去了他的军长职务，攫取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充分表现了毛泽东指挥艺术的高超，充分显示了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巨大威力。

三渡赤水

蒋介石不甘心在遵义的大败，决定亲自上阵，与毛泽东一决高低，彻底歼灭红军。1935 年 3 月 2 日，他飞往重庆“督师”。第二天，他发布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①]

蒋介石这个手令一出，立即束缚了其下属各级指挥官的手脚，把他下属的高级指挥官都变成了传令官。

蒋介石这个手令所体现的指挥方法与指挥作风和毛泽东的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指挥方法是，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具体道路由前线指挥员决定，给予机动处置的权利，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

蒋介石到重庆后，立即了解红军情况，他判断红军将向东面转进，“其目的仍在乌江东岸，图与肖（克）贺（龙）台股”，即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他在兵力部署上仍然是四面防堵。他命令湘军一部、黔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部在乌江沿岸布防，防堵红军东进；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打鼓新场一线，堵截红军西进；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滥泥沟、修文、六广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口一线，防止红军南下；令川军郭勒棋三个旅向桐梓、遵义挺进，防阻红军北上；又令各军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最好每里一碉”，迫使红军打堡垒战阵地战。蒋介石企图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特别是在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举歼灭中央红军。

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的图谋，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敌中央军出动，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粉碎敌人的围迫堵截。他以红九军团在桐淬、娄山关、遵义一线，阻击北面进攻之敌，并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集中红一、三军团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机打击周浑元纵队。

为了加强红军的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 1934 年 3 月 4 日发布命令,指出：“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3 月 5 日，红军各部开始行动，除红九军团在桐粹、遵义间钳制敌人外，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集中到鸭溪附近地域，由前敌司令部指挥，准备与周浑元部作战。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肖（周纵队第九十六师师长肖致平）谢（周纵队第五师师长谢溥福）两师的部署》，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 6 日有由长于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师（周纵队万辉煌任师长的第十三师）六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石向大黑水前进。”决定 6 日首先消灭肖谢两师，“以便 7 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原来，蒋介石命令周浑元纵队于 6 日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进攻遵义。周浑元准备按命令行动，但 5 日下午敌机发现红军正向鸭溪西南方向移动。蒋介石得悉这一情报后非常重视，他判断红军不外有两种企图：一是西进，渡江北上；二是先找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他对吴纵队

[①] 薛岳：《剿匪纪实）。

两师被歼犹有余悸，怕周浑元重蹈复辙，因而于 5 日深夜电令周浑元“明日决在长岗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1]同日，他也命令吴奇伟暂取守势防御，这样，前敌司令部的歼敌计划没有实现。

中央红军继续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徘徊诱敌，蒋介石分析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另方面又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2]于是他于 3 月 9 日发布命令，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棋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再次组织对红军的围攻。

敌情瞬息万变，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3 月 10 日 1 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

张闻天召集了 20 余人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大家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唯独毛泽东不主张打，他认为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张闻天就来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回去一想，对这一仗不放心，半夜里他又来到周恩来住处，叫周恩来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周恩来接受了这个意见。毛泽东又去找朱德商量，朱德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重新开会讨论，把大家说服了，改变了进攻鼓新场的决定。3 月 11 日，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据昨前两天情报，犹（禹九）旅已由西安寨迟淬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 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 12 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 10 号 21 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

3 月 13 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但是，黔军王家烈为保存实力，退避不战。周浑元退至鲁班场，构筑工事，坚守不出。蒋介石要求周浑元了解红军真实企图后，“方可大举”，要求吴奇伟到鸭溪后，“不可随意轻进。”当时，红军东有郭勋棋纵队，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北有滇军孙渡部。蒋介石一面回避红军的运动战，一面不断缩小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圈，步步为营，迫使红军与他们打阵地战堡垒战。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附近调动敌人，均调而不出。敌我双方相持在遵义西南的大山之中，虎视耽耽，大有一种大战

---

[1] 《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第 113 页。

[2]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 357 页。

前沉寂而又紧张的气氛。敌人的包围圈在逐步缩小，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军委和毛泽东果断决定，挥师西南，集中兵力，向敌人主动发起进攻，以打乱敌人的部署，使我军争取战略主动，迅速脱出重围，以寻求新的战机。14日，前敌司令部通知各军团：“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在此之前，已派出工兵部队和小分队先期到达茅台渡口，夺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架设了两座浮桥。

鲁班场，是仁怀县一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东西北三面环山，东为海拔1400多米的摩天岭，西有突兀的马鞍山，北部是参差起伏的山峦，甫面侧是十多里长的山间开阔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从鲁班场到茅台渡口约20公里，红军三渡赤水的大路，需经过鲁班场附近。

在鲁班场，驻有周浑元部八个团的兵力，他们比红军早四天到达这里，占据了有利地势，并强迫老百姓代木砍树，修碉，挖战壕，以藤条，荆棘缠绕成一道屏障，守备森严。

15日晨，红军除红九军团在坛厂作总页备队外，以一、三军团主力及干部团为右翼队，五军团及三军团一部为左翼队。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位于鲁班场西侧桃花寨一线，二师在一师南端的团标寺附近；三军团和五军团各一部迂回到鲁班场西南的茅坝一带，三、五军团主力进入鲁班场东南的摩天岭。进入指定地点后，待命向鲁班场守敌发动进攻。

当时从兵力上看，红军稍占优势；从战场地形上看，对敌人有利。这次战斗是红军主动去进攻敌人的阵地。

一军团第六团在鲁班场西侧的阵地，是一块方圆约二三里的开阔地，北端是敌人阵地的前沿，有几个碉堡封锁着这片开阔地，对红六团的进攻非常不利。红六团代政委邓飞与团长朱火秋商量，主动要求去敌阵地附近侦察情况。朱团长同意后，他一人悄悄穿过茂密的森林，迂回到敌阵地侧面约100米左右的地方，对敌阵地进行详细观察。他发现敌人的碉堡都是用圆木围成的，露出地面约有两米多高，地下还埋着一部分，看来很坚固。碉堡埋了许多大木桩，木桩之间缠满了葛藤、荆棘，好似一道道钦丝网。他一边看一边想，这样的地形和坚固堡垒，依靠红军手中仅有的轻重机枪和步枪是很难攻占的。这次战斗，只能巧取，不能强攻，否则会造成很大伤亡。另外，他一直在考虑军委这次的作战意图，他想：据说军委在战前就派部队到赤水河上游占领茅台渡口架浮桥，这说明部队要准备第三次过河。既然想走，这一仗的目的就不是死打硬拼，而是要狠狠地灭一下敌人的士气，打乱敌人的部署，以便我们转移。[①]朱团长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他俩在布置战斗任务时，没有下令强打硬攻，而是决定采取利用敌碉堡的射击死角，以小部队分批接近敌阵地，尽量杀伤敌人，造成对敌威胁，待机攻克敌堡垒的战斗方案。

战斗开始了，红军攻势非常猛烈。刹那间，鲁班场周围的山坡上步机枪齐鸣，喊杀声响彻云霄，敌人躲在碉堡工事里拼命射击。敌机飞来助战，向红军轰炸扫射。红军战士发现敌人用白布指挥敌机扫射的目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向敌机挥动白布，把目标指向敌人阵地。这样，敌机分不清真假目标，不敢盲目扫射，这就减少了红军的伤亡。

15时，红军发动进攻，敌我展开了激战。红军战士非常勇猛，攻下了白

[①] 邓飞：《主动进攻鲁班场兼论鲁班场战斗的得失》，《遵义市党史资料》。

家垭等敌碉堡阵地，红三团在董家坡歼敌一个营，俘敌 400 余人，在团标寺等地也毙伤了一批敌人。激战三四小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一时不能解决战斗。军委和毛泽东因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于当晚 20 时决定各军团主动撤出战斗，除留红六团在原地监视敌人外，其余部队当晚转移到茅台、仁怀、坛厂、小河地域。红军大部队撤出战斗后，敌人摸不清虚实，不知红军是真撤还是假撤？是转移还是“调虎离山”、“引蛇出洞”，然后“杀回马枪”吃掉他们？所以他们一直龟缩在碉堡工事里，不敢轻举妄动。第二天清晨，陈赓率军委干部团来接应红六团撤往茅台。

鲁班场战斗，是四渡赤水战役中较大的一次战斗。红军毙伤俘敌一千余人，红军牺牲 480 人，伤一千余人，战斗打成对峙。红军攻打鲁班场是在一个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战斗，是为了突出敌人包围圈，为了通过鲁班场，实施三渡赤水，寻求新的机动而进行的一场战斗。攻打鲁班场红军实行三面围攻，给敌人在南面留了一条退路，意在调动敌人，迷惑敌人，而不是与敌人死打硬拼。如能调动敌人离开堡垒阵地，则在运动中消灭之，如敌人不出，也有利于红军及时转移。这一仗，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红军千里，红军想打就打，想撤就撤，行动自如。撤退的时间和路线也是预先筹划好了的，一切部署和安排都很有分寸，章法井然。鲁班场战斗，红军采取了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假结合，可真可假的战术，机动灵活，为红军三渡赤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红军在鸭溪地区的机动和鲁班场战斗，诱使蒋介石犯了一个错误：把兵力调集到黔西北地区来了。这时毛泽东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形成了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从茅台三渡赤水，进行全军佯动，把敌人引向川南，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秘密四渡赤水，折返贵州，南渡乌江，调出滇军，然后直插云南，跳出敌人包围圈，争取主动。

红军撤出鲁班场战斗后，于 3 月 16 日进占茅台。茅台，位于赤水河东岸，当时约有几百户人家三四千居民，是个又脏又乱的小市镇，以出产茅台酒而闻名中外。这里有三家较大的酒厂和许多家庭酿酒作坊。茅台酒名不虚传，战士们在茅台镇外就闻到了扑鼻的醇香。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红军没收了土豪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下一些外，都分给了贫苦老百姓。会喝酒的指战员，大都品尝了茅台酒的美味，不会喝的也装上一壶，作舒筋活血之用。一些后到的部队，没有打到土豪，虽在资本家酒厂大库房旁休息，真想进去弄点茅台酒尝尝，但指战员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谁也没有去品尝。

在茅台渡口，原有一座铁索浮桥，被敌人破坏了。红军工兵部队迅速修好了这座浮桥，并在离茅台渡口不远的珠沙堡和观音寺渡口架设了两座浮桥。

3 月 16 日 18 时，军委颁发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 16 晚和明 17 日 12 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并以干部团陈赓，宋任穷为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

部队开始有秩序地渡河，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了浮桥上。一 158 一他们边走边谈，毛泽东赞扬说：“工兵连有办法。”又说：“好，我们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朱德紧接着说：“成立工兵连时我就讲了，工兵很重要，一千年以前就有了。工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

16 日晚至 17 日中午，中央红军大摇大摆地、从从容容地渡过赤水河，再次来到川南。这次渡河是不怕敌人发现的，而敌人的飞机果然发现了，他们飞来侦察骚扰，并如获至主地迅速向蒋介石报告红军西渡赤水河的情报。

三渡赤水河是一次非常奇妙的全军佯动。

军委首长走过浮桥后，进入一个小树林，在这里开了。一个会。他们摊开大比例尺军用地图，研究下一步行动，设计四渡赤水的方案。当工兵连长王耀南走过来时，毛泽东对刘伯承说：“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讲。 ”刘伯承间王耀南：“ 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 ”王耀甫答道：“ 据了解，还在。 ”刘伯承立即命令王耀南派几个得力的人速去太平渡、二郎滩，“ 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王耀南派了六七个人去侦察，回来后向刘伯承汇报说：“ 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刘伯承嘱咐王耀南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王耀南立即对工兵连进行分工，留一部分人在茅台渡口维护浮桥，他亲自带一部分人向两个渡口赶去检修浮桥。

红军西渡赤水河，进入古蔺县境后，立即由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伪装主力西进，公开摆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给国民党的飞机看，以迷惑蒋介石的神经。而以大部队在附近山沟森林内隐蔽集结，待机行动。

这一次，蒋介石又中计了。3 月 16 日至 18 日，敌机把红军三渡赤水前后的情况向蒋介石连续作了报告，蒋介石据此制断红军必然西进“ 无疑 ”，他急调重兵向川南追击，妄图把红军聚歼于赤水河西的古蔺地区。

“ 红军拐个弯，国军跑断腿。 ”国民党的将领发牢骚说。

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突然三渡赤水，大出敌人意料，川军缺少戒各。红一军团佯装主力的一个团虚张声势，大摇大樱地向古蔺城方向前进，到达镇龙山时，与驻守在这里的川军魏楷部的廖九甫团相遇。廖敌毫无戒备，红军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未作有力抵抗，即逃之夭夭。这一仗，使敌人加深了红军将北渡长江的印象，蒋介石急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进剿”，严令各部加紧修筑碉堡工事，紧密封锁。3 月 20 日晚蒋颁发电令给部属打气，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力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连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置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①]

红军的全军佯动奏效了：蒋介石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川南古蔺来了，他的眼睛紧紧盯着红军的行动；他的各路大军被调到川甫、黔西北来了，并加强了长江和横江防线的防守，以阻截红军北渡长江。

毛泽东善于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川南奔集而来，毛泽东却挥师四渡赤水，再向黔北杀去。在蒋介石发布“剿匪成功，在此一举”电令的同一天，3 月 20 日 15 时，军委发出指示，告诉一军团领导人：“我军决定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来水河。”命令一军团立即派出两个先头团，带全部工兵连，于 20 日晚和 21 日上午夺取太平渡、林滩两渡河点，并各架两座浮桥。还要求红一军团留一个团在镇龙山，继续伪装红军主力，向古蔺游击，迷惑敌人。

当天 17 时，党中央和政治部发出《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的指示，指出，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强调“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同时，军委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指出：“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 21 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是不怕敌人知道的；四渡赤水是秘密的，是不让敌人知道的。红军这次东渡，组织工作非常严密细致，真正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于 21 日晚至 22 日上午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重返黔北，与奔向川南的敌军相对而行。红军已到达遵义、仁怀中间地区，而敌人的辎物资还在源源北运。红军战士讥讽敌人的耳目失灵，说：“你们去好好封锁吧，我们走了！”

红军已全部东渡赤水，进入黔北了，薛岳还在其军情通报中称共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龙云继续命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滴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防匪盘旋西窜”。红军东渡赤水后已经三四天了，25 日，龙云仍然命令各纵队将红军歼灭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26 日，薛岳还在判断红军从古蔺“续行西窜成份居多。”这充分说明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动是非常秘密、神速与奇妙的。

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又一次破产，他大为恼火，决定就近指挥围歼红军。3 月 24 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贵阳，同行的有蒋的夫人宋美龄、他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以及陈诚、何成梭等高级将领。一到贵

[①]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阳，他立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发表了一篇“训话”，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洁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他宣布，他此行的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困境的红军的包围圈，将其歼灭。他希望“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他确信红军已“再无回枪之力”，“成功在此一举”了。

蒋介石一到贵阳，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追剿军”总司令龙云和前敌总指挥薛岳，亲自下命令，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把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一个高级传令军官。

现在，毛泽东和蒋介石展开了又一次斗智的战斗。蒋介石判断红军返回黔北的目的，仍在企图寻找渡河点北渡长江，或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或向南绕去湘西。他重新调整了部署，在红军四周布置围堵部队，各防区严密衔接，防止红军逃窜，他确信这一次已真正把红军围住了。

然而红军是围不住的，毛泽东善于引导红军突出包围圈，而且善于设计调动敌人，红军重返黔北后，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挥师南下，南渡乌江。3 月 24 日，军委派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分抵习水的李子英、良村、兴隆场，“示形”于东北，造成敌人锗觉，而以红军主力向南突破敌人的遵（义）、仁（怀）封锁线。25 日，军委要求各军团以遭遇敌人姿势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要求“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

红九军团大造声势，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迷惑敌人，以掩护红军主力的南下。27、28 日，军委主席朱德连电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指出：“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九军团今 27 号到甘溪后应即移狗坝西之马鬃岭，力九军团暂时活动枢纽，并于明 28 晨起分两部，一向长于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特别要注意自己侧卫警戒与封锁消息”；“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军委并加派三十分队无线电台给他们，以加强红九军团与军委的通信联络。

红九军团马鬃岭分兵诱敌，是军委和毛泽东派出的一支战略奇兵，对于保证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总是猜不着毛泽东规划的红军进军方向和路线。在红军主力急速南下，向乌江急进，即将到达沙土的时候，他判断红军在他的遵仁封锁线附近，将向西南方向前进，3 月 28、29 日，他连电滇军孙渡，命令他用最快速度，于 31 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和西安寨、黔西一带堵截，“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望黔西堵击为要。”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向黔西调兵，红军却向乌江前进。

一天，红军行军中途休息时，毛泽东来到了红一军团前卫二师。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暂时做了作战办公室，摊开了云贵川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毛泽东亲自向前卫二师首长面授机宜，说明战略意图，并在云贵川地图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杠杠。毛泽东把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军意图说得明白透

彻，在场的二师首长精神振奋，都说：“毛主席的决策真英明！”[①]

3 月 29 日晚，红一军团先遣团第一师三团夺取了乌江疲口，消灭守敌一个连，在行进中又消灭援敌一个营的大部。3 月 30 日和 31 日、红军主力除红九军团外，分别从大塘、江口、梯子岩南渡乌江，进到了息烽西北的黄冈、牛场、蔡家寨地域。这样，红军又一次跳出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围堵圈，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大部甩在乌江以北地区。红军赢得了主动，蒋介石顿时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地位。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突出表现。聂荣臻说：“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②

[①] 曹丹辉：《伟大的历程》；吴吉清：《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将蒋介石一军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兵锋直逼贵阳。蒋介石企图把红军聚歼于黔北地区，现在毛泽东却指挥红军杀到他的统帅部门口来了。当时贵阳守军不足两个团，兵力薄弱，附近无兵可调，大军被甩在乌江北岸。蒋介石胆颤心惊，手忙脚乱。他深知毛泽东用兵奇妙，担心恶运降临。他不懂得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醉翁之意不在佰，在乎山水之间也"，红军之意不在攻打贵阳，而在于调出滇军西进云南也。

在部署威逼贵的作战行动时，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调出了滇军，就为红军下面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扫除了障碍。滇军是云南军阀的部队，其主要任务是保护云南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盘，是不愿意远离云南边境的，是不容易调出来的。毛泽东调动滇军的办法是"攻其所必救"。蒋介石的行辕设在贵阳，贵阳兵力薄弱，滇军是离贵阳较近的一军，红军直逼贵阳，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

红军南渡乌江后，没有遇到强有力抵抗，即经息烽以南的潮水场、九庄、石洞、底寨等地，于 4 月 4 日占领扎佐，逼近贵阳，红军一路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并到处书写"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又派出部分兵力东进，佯攻瓮安、黄平，罢出要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架势，"示形"于东，迷惑敌人。

蒋介石表面镇静，内心紧张。4 月 2 日，他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浚等高级将领，讨论红军行动的企图及应取的对策。他判断红军行动的企图可能有两个：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二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合。两者中间以后青可能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安全，当前应以确湃贵阳为急。由于贵阳兵力很少，只有郭思演的九十九师所辖四个团兵力，但这四个团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内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为保证贵阳安全，蒋介石当即决定，严令前线各军对红军衔尾疾追，令驻黔西的陈金诚团星夜兼程赶来贵阳"保驾"；令在遵义的李温市纵队速至息烽堵截；令在黔东的李云杰纵队速至黄平，余庆地区防堵；令吴奇伟纵队速至修文、鸡场、沙子哨等地，周浑元纵队在黄沙河、六广河之线防堵：令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在东面，桂军廖磊部在南面堵截。

因当时滇军离贵阳较近，蒋介石从 3 月 31 日开始每天"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的电报给孙渡，命令他速率所部向清镇前进，以保卫清镇机场的安全，防止红军夺取机场，断了他逃跑的退路；速率所部前来贵阳，保卫他的安全。

蒋介石紧急加强贵阳的防备。他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在三天之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加固，又命令别动队四百余人警卫行营。4 月 5 日，他获悉红军在离贵阳东几十里地区的消息心神不定，竟然步行出行营，亲自察看碉堡工事修建情况，并当面责备贵阳警备副司令，中央军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督促下属不力，玩忽职守，陈诚随即把郭思演撤职。

4 月 5 日夜间，传来了贵阳外围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蒋介石心绪下宁。他亲自打电话询问贵阳周围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等处工事和城防守备情况。并特别关切地询问清镇飞机场的守备情况。这一夜，是他倍受熬煎的一夜，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不适泻肚，遗屎床上。宋美龄也伤风发烧，忧心如焚。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大骂侍从副官蒋孝镇，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里不眼，私下发牢骚说："他受了惊，

怪房子。”活现了蒋介石夫妇在红军威逼贵阳时的一副狼狈相。

红军在贵阳附近积极活动的时刻，蒋介石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他时刻关心战局的发展，每分每秒都在盼望滇军的到来。滇军尽管全速前进，蒋介石总嫌他们行动不快。一天上午，他正在办公室与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谈话，顾祝同进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蒋介石急问王天锡：“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王天锡回答说：“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三十华里。”蒋又问：“距清镇飞机场多远？”王尚未回答，陈诚又来报告说：“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蒋介石听罢大吃一惊，准备“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绕开清镇向安顺逃跑，他立即命令王天锡：“挑选 20 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 12 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①] 王天锡迅速地组织好逃跑马队，并向蒋介石报告。

红军加紧“示形”活动。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为伪装红军主力东进，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命令红三军团佯攻龙里，以“催促”蒋介石继续调动滇军东进。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蒋介石通过一个个手令，真的把滇军调到贵阳来了。孙渡率部刚到清镇，蒋介石立即用汽车把他接来贵阳，并立即召见，嘉奖滇军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并犒赏孙渡纵队部二万元，其到贵阳的各旅各一万元。

这时，蒋介石获悉红军已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前进的消息，他才松了一口气，几天的愁容上才露出了喜色。他判断红军“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回江西。”他命令刚到贵阳的孙渡立即率部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他对孙渡说：“现据飞机侦察报告，共军已转到清水江附近一带，并在清水江上架有浮桥两座，队伍正在纷纷过江，向东前进，似有向黄平、施秉、镇远一带回转模样。第三纵队应先开赴黄平、施秉附近防堵，如该处无共军到达，应继续赶到镇远附近迎头阻击。”孙渡立即指挥部队向龙里、贵定方向前进。蒋介石还命令吴奇伟纵队向红军尾追，湘军到黔东、桂军到平越线防堵。

兵不厌诈。调出滇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抓注有利时机，从“声东”迅速转而“击西”，于 4 月 7 日晚给各军团发出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然后长驱西进，直插云南。8 日，红军先头部队控制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南移，红三军团以一个团占领贵阳以东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积极佯攻贵阳。蒋介石听到炮声隆隆，立即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并亲自派飞机侦察轰炸。4 月 9 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贵阳至龙里间约 30 里宽的地段上迅速南移，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一过湘赣公路，红军就甩开了敌人，象长了翅膀似地每天以 120 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

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是一场出色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不断地调动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奇谋迭出，精彩纷呈，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国民党中颇具战略眼光的高级将领评论说，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战略上的“一大转变”，从此，“忽进忽退，一

[①] 王天赐：《红军过黔时蒋介石在贵阳的狼狈相》，《文史资料选辑》第 62 辑。

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倘佯，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又说：“红军盘旋于川黔边境，“大有徘徊下去之势，其用意是在吸引国军及滇、川、黔军主力渡过乌江北岸，而后乘机乘隙，窜渡乌江，径扑贵阳”；佯为东窜之图，实作西窥之计，”“贵阳一役，为共匪西窜最紧凑之一幕。”[①]

长征胜利50年后，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地考察了四渡赤水战场，并对这次战役作了高度评价：“牵住蒋介石的早子。”“红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毛泽东的战略奏效了。”“毛泽东的高明计谋获得成功。”“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事实上，红军中许多将领都称毛为诸葛亮。”②

[①]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从石达开覆灭之地杀出一条生路

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之后，红军迅速西进。蒋介石判断红军一定从清镇与安顺之间平坝附近通过，“再窜织金、黔西、大定一带”；“或是由织金直趋威宁，再窜云南东北边境”；“再不然就是向西南窜到盘江”。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最大。他决定：“以后不必在清镇、安顺之线以南的地区来围剿它，我们的主力应当配备于清镇安顺之线以北，镇西卫、织金等一带地区，等其主力出隘口，再一节一节的突击它。”他命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滇军和湘军 15 师、53 师、63 师迅速西进，在清镇、安顺以北地区夹击红军。

然而蒋介石又一次打错了算盘。红军没有走蒋介石安排的道路，而是迅速渡过北盘江，直插云南。在西进道路上，红军连克定番（今惠水）、长寨（长顺）、紫云和广顺，安龙、兴义、兴仁和安姑，来到了云南的大门口。

红军逼近云南，“云南王”龙云大惊。4 月 18 日，他电令省内外滇军：“不顾重大牺牲，努力杀敌，以收夹击之效”。他密令孙渡：如红军入滇，“务望设法不分星夜超越于前，阻其深入，是为至要。”他又急调李菘独立团赴平彝县（今富源），防堵红军入境。

4 月 23 日，红军进入云南平彝县境，把追敌甩在后面几天行程。这时，蒋介石才如恶梦初醒，大呼“上当！上当！”

入滇第一仗，把李荡独立团基本消灭。接着，克白水、马龙、嵩明、寻甸，兵锋直逼昆明。

兵临昆明，是毛泽东导演的又一幕话剧。

昆明，是龙云的老巢。在红军入滇前，龙云就组织了昆明城防司令部，并决定采取这样的方针：万一红军入境时，设法使红军仅能通过边隅地区，转向邻省，将红军逼向会理、西昌方向，由于红军神速进入云南，他急调第三旅、滇越路警大队和附近各县民团来昆明防守，并加紧赶修碉堡工事。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担负佯攻昆明的任务。4 月 29 日，红军攻占距昆明仅百里的杨林，大造进攻昆明的舆论，到处书写“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打倒云南军阀龙云！”的标语。红军继续向昆明逼近，进抵离昆明仅 30 里的大板桥。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一师侦察连和军团使衣队参加佯攻昆明，大做爬城云梯，大摆进攻昆明的架势。

昆明形势紧张，龙云忧心忡忡。他急令孙渡速回昆明防守，但又怕中央军跟踪而入，“假途灭虢”。他与薛岳约定：不许一个中央军进入昆明，凡入云南“剿匪”的中央军，须按指定的路线走，否则军队发生误会，概不负责。

红军兵临昆明，滇军纷纷调往昆明守城，这就为红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巧渡金沙

当时，红军总部只有一份云南省略图，没有标明金沙江渡口的位置，急需找到一份小比例尺地图，以便找到可供大部队渡江的金沙江渡口。

机会来了。薛岳因部队缺乏云南省详图和医疗伤兵的药品，派其副官乘汽车到昆明向龙云求援，龙云批给云南省十万分之一详图十份，白药十箱。4月28日下午，薛岳的副官携带地图和药品返回部队，车行至曲靖县境时，与红军总部管理科长刘金定和作战参谋吕黎平率领的先遣分队相遇了。先遣分队一个伏击，击中了敌汽车的轮胎，俘虏了敌人的副官和汽车兵，十份地图和十箱白药全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先遣分队的干部战士都非常高兴，风趣他说："三国时刘备入川，是张松献地图，这次红军入滇，则是龙云献地图。"

红军进入云南的神速动作，使薛岳的副官大感意外，他当了俘虏之后说："在昆明没有听到红军已沿滇黔公路西进的消息，听到向汽车射击的枪声后，才知道是进入了预设埋伏圈里，已无法逃脱。幸运的是，汽车驾驶室前的玻璃虽遭子弹击碎，但鄙人没有中弹负伤，而且蒙官兵积德，免除一死，盖红军宽大恩情也。"

后来，红军总部作战科的参谋们集体创作了一首诗：

曲靖公路处，
巧获两件宝；
地图辨方向，
白药治伤员。
渡江走捷径，
龙云有"功劳"。
……

当天，在寻甸县哨口村宿营时，毛泽东获悉了这一胜利消息，表扬先遣分队"机动行事，处置得当。"并且特别高兴地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又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当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在总部作战科办公室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陈云、王稼祥、刘伯承、李富春等同志。会议分析了敌我情况，研究了当前运动方针。新缴获的云南详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上面清楚地显示了金沙江的各个渡口，参谋吕黎平奉命在刚缴获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军委纵队和各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的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200公里，最远230公里）。会上各人都发表了意见。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说：

一."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先锋，离我后卫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行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象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

明为好。”

三.“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汲金沙江，以争取先机。如果大家同意这一作战方针，我提议具体的兵力部署如下：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从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行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地出发，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央军委纵队，提议由刘伯承同志率领，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皎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五十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 5 月 3 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我们在 5 月 3 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是上策，万一敌人先我烧船，能占领其中的一个到两个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以前烧毁或撤到北岸。因此，要不怕疲劳，务必限定在四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五军团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的轻装营，进至嵩明以南的杨林附近佯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产生错觉，以为我军要攻占昆明城。其主力随军委纵队之后，向西北的金沙江方向跟进……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①]与会同志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北渡金沙江的方针就决定下来了。据此，中央军委于 4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指示》对各军团的先进路线，渡江地点和注意事项也提出明确要求。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特指自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市的一段。全长 2308 公里。它沿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到云南石鼓急转北流，来了个 110 多度的急转弯，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削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即举世闻名的虎跳峡。虎跳峡 16 公里长，60—80 米宽，至元谋、禄劝一带后，江面较宽，在元谋县一段，有龙街渡口，历来是川滇间一个重要渡口。禄劝县的皎平渡，也是一个较大的渡口。在皎平渡上面有鲁车渡，下游有小渡口洪门渡。在会泽县（今属东川市）有树桔渡口。

金沙江西岸都是崇山峻岭，江涛汹涌，水深流急，自古称为天险。蒋介石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挡红军北进。

在红军即将抢渡金沙江之时，蒋介石才猜测到红军的意图不在乎攻占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据此，他急忙部署新的围堵计划，命令川军在金沙江北岸堵截，命令薛岳部及滇军尾追红军。4 月 28 日，他密电龙云：“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江之材料，……严令该段之各军民长官与地方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严令渡河点附近要进行“坚壁清野”，“竹木板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晚即下令有关各县，封锁金沙江各渡口，收集和毁坏所有

[①]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 187—188 页。

渡船。蒋介石和龙云企图把红军压迫至金沙江边“聚而歼之”。

红军不怕天险。兵分三路向金沙江急进。

红一军团担负夺取龙街渡口的任务后，以红四团为前卫，立即经富民县西进。沿途须经过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商定：“只能智取，不宜硬攻！”红四团以全部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的三个连队作先导，采用连环计，不贫一枪一弹，接连赚开了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随后，红一军团夺取了龙街渡口，在永仁附近架设浮桥，因江水太急，桥架起一半就被急流冲走了。而敌机又不断飞来侦察轰炸。红一军团在龙街未架成浮桥，但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蒋介石和龙云均断定龙街渡口是红军的主要渡口，薛岳从5月3日至8日，一再命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元谋急进”，“向元谋兜剿”，乘红军渡江之际“歼剿”。

龙街渡因架桥不成，又没有找到渡船，便根据军委命令赶往皎平渡过江。当薛岳的主力部队于5月8日赶到龙街渡时，红军早已无影无踪。

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夺取洪门渡。这里没有守敌，红三军团迅速进占洪门渡，并找到了一只船，因水流太急，浮桥没有架成。红十三团凭这条小船渡过了金沙江。这时军委命令红三军团赶往皎平渡过江，军团首长立即卒部队向皎平渡前进。

刘伯承率领军委干部团担负夺取皎平渡的任务。周恩来亲自向团长陈度、政委宋任穷交代任务，张闻天亲自对干部团全体指挥员进行战斗动员，要求干部团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完成夺取皎平渡的任务。干部团决定以第三营为先遣营，九连为前卫连[1]因陈庚负伤，决定宋任穷随三营行动。

前卫连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驰向金沙江边，于黄昏时到达皎平渡口，夺取了两只小船。宋任穷令前卫连长肖应棠率领全连首先渡江，在穷苦船工的帮助下，顺利到达北岸，迅速消灭了敌人一个连，俘虏了厘金局和保安队员60亲人，缴获了五千元白洋。这样，干部团不折一人一马，胜利地夺取了皎平渡，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了一份厚礼[2]，为中央红军跨越金沙江天险开辟了通途。

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高兴地说：“找到一条船，就会有若干条船。”他立即命令干部团继续前进，扩大纵深，并迅速四处找船，以确保大部队胜利渡江。

于是，干部团一面迅速前进，占领了通安，扩大了纵深，巩固了渡口；一面派人找船，在人民群众的热心帮助下，又找到了五条船，并找来了汉、彝、傣、纳西等各族船工36人，为保证红军主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样，军委纵队、红一、三军团就陆续人皎平渡开始渡江。

为保证全军胜利渡江，后卫任务极为重要。这个任务落在了红五军团肩上。

毛泽东在赴皎平渡途中，经过禄劝县石板河时，看到这一带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又是迫敌必经之地，即决定红五军团在这里布防，阻击迟滞追敌，掩护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江。

石板河，是禄劝县掌鸠河上游。河床是由一块块平展的岩石铺在河水下面，状似石板，因而得名。附近有个村子，叫石板河村。该村背靠一座上60

---

[1] 据宋任穷和蒋耀德回忆。

[2] 莫立骅：《“五一”的前后》

里下 50 里的大山，山势婉蜒，险峻，是打阻击的好阵地。从石板河村下山约百里，就是皎平渡。红五军团是一支能攻善守的部队，具有打掩护战的丰富经验，他们在这里依据地形，严密布防，严阵以待，准备打击追敌。

蒋介石获悉红军已分头到达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一带后，一面命令飞机天天侦察轰炸，一面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纵队尾追，命令已到团街的万耀煌第十二师全力向皎平渡急追。

万耀煌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非嫡系，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他力图保存实力，既怕蒋以追击不力吞并他的部队，又怕孤军深入被红军收拾。其先头部队遭到红五军团后卫三十七团痛击后，他便构筑工事在团街固守。5 月 4 日，蒋介石严令各纵队加速追堵，“否则以纵匪论罪。”当晚，万耀煌致电蒋介石谎报军情：派侦察队严密搜索，在前进方向上，尚未发现共军的任何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俟查明井军去向后，再尾击而“剿”之。5 日晚，万又继续向蒋谎报：经过一天侦察，前方仍未发现共军，6 日拂晓前如无新的训示，将率部队从团街以南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它方向“围剿”共军。发报后，他即命令部队后撤。蒋接电后恼怒异常，向万发出“限即刻到”手令，声称飞机侦察共军确实已经从皎平渡到了北岸，命令他仍从团街向皎平渡口全力“追剿”如再违令，将按军事从事”。这样，万耀煌重新向团街推进，尾追红军。

这时红军侦悉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企图保存实力，往回收缩的电报，毛泽东等当机立断，决定抓住机会，令一、三军团速来皎平渡过江。5 月 5 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设在金沙江边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研究渡江部署。毛泽东面对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地图，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比划着，对作战参谋们风趣地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同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过江，将来也让后人写段故事吧！”①

为了保证红一、三军团从龙街渡、洪门渡折来皎平渡过江，毛泽东等决定加重红五军团的掩护任务，并派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到五军团传达任务，进行动员。李富春来到了五军团阵地，他对军团和各团干部说：原来，全军准备从三个地方北渡金沙江，由于情况发生变化，现在只能集中在皎平渡过江了。过江的时间要延长几天，所以你们阻击敌人的任务也加重了。又说，数万红军正依靠几只小船，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日夜渡江。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只要我们能再坚守三天三夜，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即要宣告破产。李富春最后说：“毛主席要我告诉同志们，中央相信五军团是能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①]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五军团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尽管追敌日益增多，继敌十三师之后，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纵队的兵力从 5 月 8 日起陆续向石板河蜂拥而来，敌我兵力异常悬殊，但五军团指战员勇气百倍，凭借有利地形，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顽强战斗，英勇阻击，始终把阵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是 5 月 3 日乘船渡过金沙江的，过江后，住在北岸石洞中。一过江，他们立即和刘伯承、陈云、蔡树藩一起组织渡江工作。

[①] 张南生：《遵义会议的光芒》

三万多红军，依靠七条小船，36 位各族船工，昼夜下停地秩序并然地北渡金沙江。

军委纵队渡过了金沙江。

红三军团渡过了金沙江。干部战士热烈议论说：“ 真有趣，诸葛亮 5 月渡沪深入不毛，我们也是 5 月来渡沪啊！ ”我们一过江，就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甩到后边了！ ”

红一军团从龙街渡折向皎平渡时，在一条建筑在急流上的路上行进，一夜过了 48 次急流，赶了 120 里路，终于赶到了皎平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红五军团在胜利完成掩护任务后，迅速脱离追敌，于 5 月 9 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 5 月 7 日在树桔渡也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追敌姗姗来迟。5 月 9 日，敌人赶到了树桔渡江边，5 月 10 日，他们来到了交平渡口，红军早已全部度到了金沙江北岸，他们只好望江兴叹了！

在军委和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夺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在巧渡金沙江的重大胜利中，刘伯承在指挥干部团夺取皎平渡和组织渡江中表现了卓越的才能，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了热情的称赞。毛泽东风趣地说：“ 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讲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周恩来接着说：“ 主席估计是对的，我们不是已经过来了吗？ ”。[①]生动形象的话语，引起了朱德、刘伯承的哈哈大笑。

[①] 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第 91 页。

“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中央红军巧度金沙江后，蒋介石于 1935 年 5 月 12 日急匆匆飞到昆明。龙云向他献计，建议象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太平军石达开那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向大渡河前进，深人四川腹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制定了一个把中央红军封锁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在大渡河畔予以“聚歼”的计划。他命令薛岳部渡过金沙江尾追，命令四川军问刘湘派兵堵截，以杨森率 20 军及 21 军一部在大度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 24 军大渡河以南约五个旅堵截红军北上，并掩护薛岳部北进，以 24 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与杨森部协同防堵。蒋介石纠集了 15 万至 20 万重兵进行大渡河会战，妄图“叫朱、毛做石达开第二。”蒋介石致电刘文辉进行打气，称“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又给大渡河南北各军去电，吹嘘“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①]刘文辉力图保存地盘，他严令所属各旅长：“不能成功、即当成仁”，“与城共存亡”。

蒋介石图谋在大渡河边歼灭中央红军的方针已经定了，大渡河战役的战鼓即将擂响了。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中央红军怎么办？

5 月 8 日，红三军到达会理城郊，9 日，干部团也到达会理郊外，即与红三军团共同围攻会理。红军围攻会理的目的，在于能打开则打开之，不能打开就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休整，掩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刘少奇、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三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李德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二是确定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当前任务，以统一领导核心和高级干部的认识。

会前，对遵义会议以后的战略方针有不同意见。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指挥下，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许多胜利，部队士气大振。但因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有时难免多走一些路，有的人就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聂荣臻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创议的一个。”[①]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红军到达会理地区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拒绝了。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

[①]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 404 页。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 252 页。

左权、罗瑞卿、朱瑞都在场。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他警告林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拒绝了聂荣臻的批评，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下台，主要是要求毛泽东下台。林彪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遭到聂荣臻的严词拒绝，他就一个人单独签字上送了。

鉴于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不同意见，召开会议来统一认识就是非常必要的了。会理会议集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彭德怀。会议开始，张闻天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针对林彪所谓“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的错误意见，批评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他还说，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对林彪的信，彭德怀也表示了态度。他写道：“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①]

关于与林彪信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后来写道：“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有林彪写给中央写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①]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指出，林彪的活动，不仅在军事路线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在政治路线上与组织路线上都是机会主义的。会议一致认为，大家都有义务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是战略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建议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会议最后由张闻天做结论，他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决定中央红军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陕甘边建立新苏区。会议决定组织先遣队，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先遣队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①] 《彭德怀自述》第199页。

[①] 《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

会理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批评了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对实现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彝族区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于 5 月 16 日从会理出发北进。从会理到大渡河计程约 500 公里。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嶲（今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今汉源），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路；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要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第一条路，因而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

军委组成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一军团第一师一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力政委；第二先遣队由一军团第二师五团组成，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两支先遣队均经越西向大树保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待发之时，中共冕宁地下党主动派人到泸沽，向刘、聂首长汇报敌情，红一团侦察组亦汇报了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居民、给养和敌军布防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已判定我军将走西昌玉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并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当即由刘伯承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军委在行军中，电台联络不上。刘、聂果断决定，红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络。

21 日凌晨，红一团到达冕宁，与军委取得联络，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红一团和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小路向大渡河前进，红五团则继续经越西北进，以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这次红军改道走小路向安顺场前进，充分体现了红军高级指挥员实事求是、主动创造的精神，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一贯的民主作风。将师协和、机动专行，团结一致，集思广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要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最重要的是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过去由于汉族统治阶级对彝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彝民对国民党军极端仇恨，国民党军通过彝族区时，必须大队人马，一团以下人员通过，即被缴械。彝汉民族隔阂很深。

为顺利通过彝族区，1935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召集冕宁地下党的廖志高、黄映龙、陈荣檀等了解彝族的情况，他指出：形势是前后都有敌人，前面是川军拦阻，后面是薛岳追兵，我们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是不容易的。但还是有办法，那就是通过彝族区，所以最要紧的是团结好彝族。毛泽东要求先遣队对彝族风俗习惯进行调查，并对红军全体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朱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详细说明了党对彝族同胞的政策。刘伯承、聂荣臻、左权、刘亚楼亲自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教育，然后率两支先遣队分路前进。

部队在行进中不时受到彝民的袭击，有的同志负了伤。第一先遣队工兵连进入彝族区后，全部武器、工具均被彝民抢走，衣服全被扒光。消息传来，各部队普遍产生了急躁情绪，都来向毛泽东和红军总部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指示说：“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不准打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又说：“早晨，刘伯承总参谋长带领的先遣队已进入彝族区。他是四川人，又带了通司（翻译）。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

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成友好。”他告诫说：“目前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一定会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这样，彝民不但不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顺利通过彝族区争取时间，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抢先渡过大渡河。”①

毛泽东又亲自对战士们进行教育，他说：“四川的彝族人和广西的苗族人都一样，他们都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民族，所以他们也最痛恨白军。可是他们对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尊重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弟兄，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白军的压迫。”又说：“我们朱总司令和刘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

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支等，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彝族同胞。还要求每个指战员也给彝族同胞准备一件礼物。

在冕宁，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与总部请来的一位彝族通司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位彝族同胞30多岁，头缠厚厚的灰布，上披一件披肩，下穿宽大的裤子，打着赤脚，长得非常剽悍，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朱德、刘伯承与他亲切握手，并叫他“老根”（即“老乡”）时，他放声开怀大笑。毛泽东了解彝民酷爱喝酒，就让拿酒来给他喝，他毫不推辞，把大碗白酒一饮而尽。一边喝酒，毛、朱、刘一边对他讲红军的政策，讲红军反对军阀，北上抗日，借彝民区通过的道理。这位彝族同胞认真听讲，频频点头，豪爽地说：“皮娃子的事格老子去说通，大军不要放在心上，你们会‘龙快，过去的。”这样，这位彝族同胞成为红军通过彝族区的得力通司。

在冕宁，毛泽东亲自对彝族上层人士进行争取说服工作。请来当地彝族头人沽基达涅，与他进行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彝族区各方面的情况。沽基达涅详细他说明这一带的地理民情，从冕宁到大渡河各个彝族家支及其头人沽基小叶丹、沽基洛莫子、罗洪作一、罗洪点都等人情况。毛泽东对他具体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北上坑日的主张，沽基达涅很快理解红军的主张并表示同情。毛泽东赠送给他一份礼品，并委托他与彝族家支四位头人联系，把红军的礼品分别转送给这四个彝族首领。

党的民族政策真灵。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进入彝族区后，经过肖华、冯文彬等的努力和通司的协助，刘伯承与彝族头人沽基小叶丹，在一个清水地塘名叫袁居海子的地方，按照彝族习惯，杀公鸡饮血，结拜金兰之盟。当晚，刘伯承设宴款待小叶丹等人，刘伯承把一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其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第二天，刘伯承送了10支步枪给小叶丹，小叶丹把他的坐骑大黑骡子送给刘伯承。刘伯承对小叶丹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

对于彝族其他家支，红军也同样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他们的理解。

通过彝族区的道路畅通了。在小叶丹的四叔的陪同下，刘、聂率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族区，红军主力也安全地全部通过彝族区，来到了大渡河畔。

大渡桥横铁索寒

大渡河，是混江的支流，古名俄江，当地人又叫铜河。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是 1863 年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72 年后的 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也来到了这个历史上出名的地方。

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五团，一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勇敢机智的斗争，胜利地到达大树堡。在这里，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敌人主力牢牢地吸引在富林一线，为红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的率领下，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到达离安顺场约 15 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察。了解到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守敌有两个连，只有一条船，其余船只均被毁坏或抢走。渡口对岸有敌人一个团，团主力在下游 15 里处，该团韩槐阶营驻在紧对岸，与南岸恶霸地主、国民党 24 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共同负责安顺场渡口的防务。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正向大渡河前进，大喜过望。因为他相信石达开失败的历史必会重演，红军一定会做“石达开第二”为了“确保河防，困厄红军”，他严令大渡河守军立即做到：收缴南岸渡口船只以及可作渡河的材料，搜集南岸民间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烧尽南岸一切可供红军利用来掩护接近河岸的民房，以扫清射界。蒋介石确信大渡河河防是万无一失的。

军委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为此，军委电令红一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红一团立即进行动员和部署。

敌人疏于戒备，以为红军还有几天行程才能到达。红一团以神速的动作，迅速击溃两连守敌，占领了安顺场，并夺得了敌人的船只。这时是 5 月 25 日凌晨三时刚过。

下一步是做好渡河的准备。

大渡河的这一段，河宽约 300 米，水深 10 余米，流速每秒约 4 米，水中礁石很多，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遇到的又一道天险。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 1981 年 7 月来中国旅游，参观了安顺场红军渡河点之后写道：“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象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倒流，……似乎和地球的引力场不发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①]

杨得志仔细考虑着渡河的方法：在这样的河流上，凫水不行，大危险；架桥不成，桥桩无法安下去；只有一种办法：船渡。这就需要渡船和船工。经过努力寻找，一共找到 3 条船，52 个船工。

[①] 布热津斯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大江南北》第 126—127 页。

在刘伯承、聂荣臻的亲自指挥下，在杨得志、黎林的具体组织下，红一团组成了以熊尚林为队长的 17 人渡河奋勇队，乘着一条小船，在当地熟练船工的摆渡下，在轻重机枪的人力掩护下，冒着恶波涛和敌人的密集弹雨，英勇冲向对岸，一举夺取了敌人渡口工事，并击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为红军渡河取得了立足点，从而突破了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大渡河防线。17 勇士为长征的胜利立了大功！

红军主力在向大渡河前进，当先遣队胜利强渡大渡河的消息传来时，指战员们兴高采烈，不由自主地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部队来到离安顺场约五六里的一个山脚下休息。附近有一块石碑。战士们围着观看碑文，毛泽东来到了战士们中间，他看完了碑文，对大家说，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 1863 年 4 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困：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崖，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四十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接着，毛泽东对石达开的失败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说：“ 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

历史是昨天对今天的嘱咐，是过去对未来的昭示。讨论历史教训是为了指导现实的斗争。毛泽东又说：“ 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者很大的幻想，他们以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

红军战士们响亮地回答着：“ 哼，敌人是在做梦！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 ”

毛泽东高兴地说：“ 同志们，你们说得对！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 ”“ 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 ”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了安顺场。这时，刘伯承正在发愁。先遣队只找到了三条小船，附近再也找不着船只了。工兵连几次架桥，都被桀骜不驯的急流冲垮了。仅靠三只船载渡 3 万多红军需时一个多月，而追敌薛岳的先头部队已到西昌，杨森 20 军的先头部队已到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行程。如何在短期内把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毛泽东一到安顺场，立即赶往渡口，向刘伯承、聂荣臻了解战斗情况，研究渡河问题。他还沿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中午，中央首长在先遣司令部吃饭，席间端上缴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祝贺胜利，接着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他说：“ 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答：“ 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 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方起誓吗？ ”刘答：“ 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彝人下跪是先

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个问题刘伯承可没注意，他被问住了。

周恩来善于解人之难，他岔开话题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朱德接着表扬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这时，刘伯承摆出了面临困难：“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接着，刘、聂汇报了架桥和寻找渡船的情况，说明在短时间内全军渡河存在的困难。毛泽东深知石达开覆军的历史，对红军渡河的多种可能早有筹算。他当即指出，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在敌五十三师等部正向我军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在兵力部署上，他提议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前进。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决定：以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从安顺场过河，为右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罗瑞卿任参谋长，肖华任政治部主任，从大渡河东岸北上，策应西岸，准备攻打泸定桥：由林彪率一军团主力和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迅速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红三、九军团从泸定桥过河。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 340 里，要求两天半赶到。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①]毛泽东这样组成右纵队也是有战略考虑的：红一师是一支能打善战的部队，有根强的战斗力；干部团军政干部齐全、年轻又有实践经验，只要有群众，就能开展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又配备了一个能独立开展新局面的很强的军政领导班子。万一与左纵队会合不了，就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到川西创造个局面。

泸定桥，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防区，他令其第四旅在这里防守。该旅旅长袁国瑞以旅部驻于飞越岭下的龙八步，以团长李金山率 38 团（缺一营）防守泸定铁索桥，以团长杨开诚率领十一团布防于海子山、冷硫一带；以团长谢洪康率十团驻于飞越岭，作总预备队。

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敌人甚为震惊，立即把防御重点转到泸定桥上。刘文辉命令第四旅死守沪定铁索桥，蒋介石急忙调兵向沪定桥增防和“追剿”。

兵贵神速。必须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必须在敌人增防部队到达之前夺取泸定桥。军委和毛泽东命令先头团加速向泸定桥前进。

右纵队在崎岖难行的道路上前进，胜利占领了泸定桥南 50 里的龙八步，为左纵队进军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左纵队以红二师四团为先头团，在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急进。5 月 27 日晨，他们从安顺场出发，边打仗边行军、走了 80 余里，在什月坪宿营。28 日 5 时出发，不久，军委来电命令他们“于明天夺取泸定桥”。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轻装前进，边行军边动员，边行军边打仗，昼夜兼程，一昼夜走了 240 里崎岖的路和没有路的路，终于赶在援敌前面，于 5 月 29 日 6 时许到达泸定桥西，消灭守敌，占领了西岸全部阵地。

泸定铁索桥，位于泸定城西，当时是千里大渡河上的唯一桥梁。桥身有 13 根铁索，以 9 根作桥面，4 根作两边扶手，每根铁索有碗口粗，桥面铁索上铺以木板，以通行人。桥身净跨长为 100 米，净宽为 2.8 米，桥面距枯水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 260—261 页。

位 14.5 米。铁索桥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根铁桩上。该桥自清康熙 44 年（1705）始建，第二年 4 月建成，已有二百余年历史。

泸定桥守敌为 38 团的两个营，以一个营负责守桥，一个营布防于左翼阵地，在东岸桥楼上垒起了沙袋。敌人从桥西开始撤除桥板，大部已撤向东岸，只剩下 13 根光溜溜的铁索，已不能通行。敌人集中人力封锁铁索桥，不时地向西岸扫射，打迫击炮。敌人认定这里河水咆哮，红军无法泅水，不能船渡，也不可能另架浮桥，要想过河只能通过铁索桥，他们以为严密封锁铁索桥，红军插翅也难飞渡，所以非常狂亡地向红军叫喊：“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有种飞过来！”“为什么不过来呀！”

对于敌人的挑衅，红军战士们给予了最响亮的答：“老子不要你的枪，要你们的桥！”“你们等着缴枪吧！”

红四团首长决定由二连担任突击队，挑选了 22 名突击队员，由二连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由三连连长王友才率领三连第二梯队，负责铺桥板，战斗部署是：以一个主力营正面突击，以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网掩护，阻止两侧援敌；以军团教导营部署在打箭炉（康定）方向警戒。

下午四时，总攻开始。廖大珠率领 22 名突击队员，在我火力的掩护下，手扶桥边铁栏，脚踏摇晃的铁索，冒着敌人的弹雨，奋勇向对岸冲去。敌人见枪弹阻挡不了红军的前进，就在东侨头集中撤下的桥板和稻草，浇上煤油，燃起熊熊大火，企图用火阵阻挡红军前进。廖大珠率领突击队员勇敢冲进火海，冲进了泸定城，与敌人展开激战。王友才率第二梯队铺好了桥板，冲进了泸定城，后续部队也进城了，与敌人展开了两个小时激烈的巷战，歼敌大部，占领了泸定城。这一次战斗，红四团以伤亡 3 名突击队员的极小代价，取得了夺取泸定桥，占领泸定城的辉煌胜利，使红军主力得以源源不断地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在大渡河畔“聚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也于当晚胜利到达泸定桥。

毛泽东对夺取庐定桥的胜利给予了热烈的赞扬。他说：“我们英勇的红四团和红一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河开辟了道路。”又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朱总司令也一再表扬红四团夺取庐定桥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在敌人内部引起了震惊。蒋介石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立功”，令刘文辉对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敌人有的高级将领对红军组织大渡河战役的卓越才能，曾情不自禁地加以称赞：“自朱毛西窜以来，曾渡贡水、章水、来水、潇水、湘水、清江河、乌江河、赤水河、白层河、黄泥河、金沙江，然无有过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杨之役，翼王石达开西行至此，而授命。……今朱毛至此，竟安全通过。”[①]

泸定桥战斗的胜利也得到了外国人士的热烈赞扬。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参观泸定桥战斗现场之后说：“泸定桥战役是征途中重要的一仗”，是“一次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从而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渡过泸定桥对长征而言确实是有重大意义的。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

[①]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②]美国著名作家哈索尔兹伯里参观庐定桥后写道：“在长征中，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同沪定桥相比，我为飞越大渡河以及赢得这一胜利的红军男女战士们欢呼！”

聂荣臻对大渡河战役的出色指挥有一段精避的论述。他说：大渡河战役，“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得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得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庐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沪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处境？那就很难设想。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挥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①]

大渡河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导演的又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毛泽东指挥红军走通了。

[②] 布热津斯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 264—265 页。

万水千山只等闲

长征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求生存谋解放的斗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毛泽东身系全军的安危。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强敌堵截，他无所畏惧；饱一餐，饥两餐，甚至是几日断粮，他硬是象普通战士一样顶过来了；条条湍急的河流，座座危耸的雪山，茫茫无边的草地，并没有在毛泽东面前有什么特殊，三百六十九天的万里征途，他和大家一起一步步地走完；敌人的枪弹、飞机也不是对毛泽东就格外开恩，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就在他身边被炸死，他的妻子贺子珍又在另一次敌机轰炸时被炸成重伤，他对战友的伤亡痛心不已，但对自己的安危却处之泰然。毛泽东，他是长征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又是长征队伍的统帅，他肩负一颗被悬赏二十万元通缉的头颅，而心中想的却完全是红军、党和祖国的命运。他与恶劣自然环境斗，与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斗，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斗，与张国秦的分裂主义威胁斗，与侵袭自己肌体的疾病疲倦斗，与一次次接踵而来的身心挫折斗……

他担负着人们无法想象有历史重托，承受着任何人不曾经历过的艰苦与磨难。他既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感慨，更多的却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中透出的豪迈与乐观。

万里征途中的普通一兵

长征路上，万水千山，行军打仗，非常艰苦。因为毛泽东身体不好，长征初期他大病初愈，组织上给他制作了一副担架，配备了坐骑。担架，毛泽东用的很少，不是让给生了病的警卫员，就是让给冻了脚的红小鬼。坐骑，一直是为他的秘书、警卫、勤杂人员所公用，大家感觉过意不去，而毛泽东总是一笑置之。

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虽然经常要找人谈话，了解敌情，工作紧张。但还可以得到适当的休息。遵义会议以后情况不同了，他肩负指挥红军行动的重任，工作忙得厉害，失眠也很严重，实在疲倦不堪了，他还把电话机放在床头上才倒头休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毛泽东的健康担心，想方设法使他能吃好睡好。

当时，红军干部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一角五分钱，毛泽东也执行同一标准，毫不特殊。卫生员钟福昌和警卫员们总是分头想办法去买腊肉、鸡蛋、辣椒和酒酿这些他喜欢吃的东西，在规定的伙食标准内尽量改善伙食。可是每当这些改善了的饭菜端到他面前时，他就用怀疑的目光严肃的询问：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违犯了纪律？别的同志是不是也吃这样的饭菜？因为红一军团每次打胜仗时常给毛泽东送来战利品，所以钟福昌他们就用一句老后回答：“一军团送来的。”不然他是不肯吃的。

进入藏族区后，藏族同胞因受反动派的欺骗胁迫都躲起来了，红军部队先是断了食盐，接着是严重的粮荒。战士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青稞、包谷，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每顿只能吃半饱，把两天的粮食分做三天吃。这是红军部队为求生存而斗争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吃同样的伙食。有一次，部队吃青稞面混合着野芹菜、豌豆叶子熬成的汤，当警卫员吴吉清给毛泽东端去这样的饭菜时，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毛泽东看出来了，就说：“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听说盘古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他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毛泽东坚持和红军战士同吃野菜，同尝甘苦。在一次行军途中，毛泽东在路边的沟壕里发现了一些别人扔下的羊下水（羊肠、羊肚、羊肺等），他就让炊事员拣回来，收拾收拾，烹调好后，他与身边人员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算是长征路上的一次打牙祭。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肖凤几十年后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现在想起来我都鼻子发酸。”[①]

毛泽东的伙食太差了。他的身边人员总想找点有营养的东西给他吃。在梭磨的一个喇嘛庙里，警卫员王七九找到了一副腊羊架子，兴高采烈地说：“找到好吃的了，给主席改善生活吧！”毛泽东听到了，走过来问明情况，批评王七九说：“原来你违犯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又对大家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严守纪律。我知道，你们是想给我搞点好菜吃，可是在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万不可以这样做，特别是在群众不在家的时候。”王七九把腊羊架子送回了原处，大家受到了一次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教育。

[①] 李丁：《毛主席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 年 3 期

“惯于长夜过春时”，毛泽东习惯晚上办公和看书报，工作起来不愿早睡，行军时不愿坐担架，这样长途行军是很消耗体力的。卫生员钟福昌格守职责，每当毛泽东迟迟不睡的时候，就去督促他早点睡觉，而当他睡觉时，就保持周围环境的安静，使他能够睡得安稳。”

有一次在贵州境内行军，白天走了九十里路，晚上天黑了好大一会才到达板桥宿营。毛泽东照例深夜工作。再过四五个小时又要继续行军，敌人在后面尾追。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在前面走了，毛泽东跟着干部团在最后面行动，如果被敌人切断道路，就有跟不上红军主力的危险。可是毛泽东具有一种异常镇定沉着的优良品质，他虽然和干部团一起断后，还是和往常一样工作到深夜，在一盏马灯前面聚精会神地看着厚厚的一叠电报材料，思考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一点睡意。卫生员轻手轻脚地来到他的跟前，催促说：“主席，早睡吧！再过三小时就要出发啦！”毛泽东笑着说：“钟福昌同志，你看仗打的这么紧，我怎能睡呢！”他又用商量的口气说：“等我做些工作再睡吧！”这时，干部团陈赓、宋任穷来了，他们一来就批评卫生员和警卫员不好好照顾主席休息，并一再劝说毛泽东早点睡觉。毛泽东同意了，他躺在床上，把灯芯捻小了一点，继续把文电看完。他刚睡觉不久，部队出发的时间到了，他又起床跟部队一道前进了。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以后，干部团一直走在军委纵队的前面，毛泽东也是与干部团一起行动。毛泽东的住处，一般是干部团的一个营在前，毛泽东在中，干部团的其他部队在后。毛泽东与各军团的通信联络，也大都用干部团的电台。

毛泽东到皎平渡后，是在天将拂晓时上船渡金沙江的。一下船，他就去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研究部队渡江问题，警卫员陈昌奉负责为毛泽东安排住处。

金沙江北岸全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房屋，只有八九个洞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怕承等都住在这些洞中。毛泽东住的洞子潮湿，有的地方还有积水，找不到木板和稻草，陈昌奉只好找一块干地方，铺上油布，放上毯子，为毛泽东铺了个地铺。铺了铺，没有搭办公的地方，没有把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打开，就去烧开水了。

天亮时，毛泽东回到了住处，看到没有办公的地方，就叫把陈昌奉找来，问他：“办公的地方呢？”陈昌奉回答道：“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您先休息一下喝点水吧！”

毛泽东严肃而又温和地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有几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说着，毛泽东亲自搬动装文件的铁皮箱子，要陈昌奉把另一个搬来，两个铁皮箱子合在一起，就成了办公桌。随后，毛泽东把办公用具摆在上面，把背包当作凳子，坐了下来开始了办公。

等了一会，毛泽东看了看陈昌奉，对他说：“你今天犯了错误，我要处分你哪！”又说：“我罚你一夜不睡觉，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只不睡觉还不行，还要动脑筋想一想：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犯的，今后怎么办？”当晚，陈昌奉陪着毛泽东办公。毛泽东的洞子里装了六七部电话，电话铃声不断，“桌子”上摆满了文件、电报，毛泽东接了一个电话又接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又看文电，忙个不停。陈昌奉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见毛泽东这么忙，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早把“桌子”摆好多好啊！

待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站起来对陈昌奉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要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他走近陈昌奉，用手抚摸着陈昌奉的头，关心他说：“好了，快睡觉去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工作上出了毛病，找到了原因，以后改了，就是进步。”[1]毛泽东的这次批评，陈昌奉一直牢记在心，终生不忘。

就是在金沙江畔的这个石洞里，在这样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度过了几个紧张繁忙的昼夜，与他的战友共同指挥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迫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中央红军沿大渡河北进，快到摩西面的时候，部队正在过一座不到两米宽的小桥。战士们见毛泽东来，自动让开一条路，让毛泽东先过，饲养员老余牵着马就上了桥，马受惊似地大声嘶叫，桥上乱起来了。毛泽东立即对老余说：“不要过啦，先让同志们过！”陈昌奉帮老余把马拉回来，等部队过完，毛泽东一行才从桥上通过。晚上，到摩西面宿营后，毛泽东对身边人员说：“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要想到部队，想到大家！你们想，为了我们一匹马，误了那么多同志行军，该多不好呀！”

毛泽东与他身边人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非常关心爱护他们也非常尊敬和照护他。

一次，黄昏时从茅台出发渡赤水河。警卫员黄泽九因肚子痛走路困难，他偷偷地告诉班长胡昌保，请允许他在后面走。胡昌保同意了。当时工作人员有病都不想让毛泽东知道，因为他一旦知道就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一定会让病人骑马或坐担架，并把营养食物给他吃。

毛泽东在很多时候兼负管理员的职责。在茅台河边等候渡船时，他照例要查问人数，而且是一个一个地查问，决不笼统含糊。他点名问黄泽九，没有人答应。他便问胡昌保，胡昌保说：“黄泽九肚子痛，走在后面，马上就能赶上来。”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吩咐把担架留在河边让黄泽九坐，胡昌保央求着说：“担架还是留你坐吧，把马给他就行了！”毛泽东说：“肚子痛怎能骑马呢？让他坐担架好好休息休息吧！”[1]担架留下了，毛泽东命令上船出发。

这天夜里行军走了一百里山路，毛泽东坚持和战士们一起走路，不肯骑马，他尽管很疲劳，还是不断给大家讲笑话，鼓舞大家的情绪。

中央红军来到雪山底下，即将爬雪山了，这是一个六月飞雪的地方。机要秘书黄有凤突然得了疟疾，打摆子发高烧，担忧怎样才能爬过雪山。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找卫生员给他服药治疗，又把自己的担架叫来，硬是让他躺上去，并一再安慰他，鼓励他要坚持下去。而毛泽东却拄着拐棍，迎着刺骨的寒风，一步几滑地向着雪山高峰走去。黄有凤躺在暖融融的担架上，望着半山腰上毛泽东那举步艰难的身影，心潮激荡，不由自主地视线渐渐模糊起来。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长征中，许多红军战士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天，军委纵队翻越化林坪的一座大山，因为山高路小人多，行进非常缓慢。当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时，随着马达的一阵轰鸣声，天空中出现了几架敌机，大家还没来得及隐蔽，敌机

---

[1]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 176 页。

[1] 钟光：《在毛主席身边的时候》。

扔下的炸弹便呼啸而来，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立即飞向毛泽东身边，把毛泽东推到了一边。顿时，“轰”的一声巨响，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倒，毛泽东和胡昌保被爆炸的烟雾笼罩，烟雾散去，陈昌奉等看毛泽东满身是土，怀中躺着受伤的胡昌保，毛泽东立即喊卫生员钟福昌：“快，给他上药！”

“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你们继续前进吧！”胡昌保忍着剧烈疼痛说道。

“没关系，你会好的！”毛泽东一边安慰胡昌保，一边与钟福昌一起为他包扎伤口，然后，用双手把胡昌保抱住，安慰说：“胡昌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昌保深情地望着毛泽东，非常吃力地说：“主席，我知道，血全流在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最可惜的是不能跟您去看一看我们的新根据地，跟您到前线打日本鬼子！”“主席，……我不行了。您要……多多保重！”停了一会，又说：“我的父母在江西吉安，革命胜利后，请转告他们：我为革命牺牲在长征路上了。叫他们不要难过，要跟着毛主席建设新中国！”

胡昌保的目光逐渐转向泪痕满面的班里同志，缓慢地，吃力他说：“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能继续保护主席了，我们的任务很重要、很光荣。你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啊！”

胡昌保用尽全部的力气，费劲地一字一字地说：“祝——革——命——成功！”

胡昌保停止了呼吸。班里的同志全哭了，毛泽东也哭了。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在长征中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掉泪。毛泽东缓缓地从胡昌保脖子底下抽出手来，把他轻轻地放在地上，把一条毯子打开盖在他的身上，然后摘下自己头上的红星帽，默默地站在自己警卫班长的身边，很久，很久。

后来，毛泽东沉痛地说：“胡昌保，你是个好同志，安息吧。！”

战友们饱含泪水，掩埋好胡昌保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已经走到队伍前边的毛泽东还舍不得离开，他又折了回来，从战士手中接过工兵锹，再一次为警卫班长的坟头培土，培了一锹又一锹，高山上刮起了大风，刹那间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战士们全都变成了雪人，静静地站在雪白的墓旁，默默地看着毛泽东把一锹锹沃土铺洒在高高的坟堆上。最后，毛泽东把新上重重地拍打了几下，深情地告别长征路上的这座新坟，继续前进了。

草地行军，是长征中最困难的行军之一。在草地中没有村庄，没有房屋，只是偶而碰到几棵小树，一片沼泽，走路非常困难。这一无风雨交加，大家身上都淋得湿透。在一条小河边的一棵小树旁宿营，战士们为了让毛泽东能避避雨，就把一条被单试着绑在小树上，没有成功。正在战士们为睡觉发愁的时候，毛泽东过来了，他要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避风雨的油布拿下，支起来。支好后，他笑着说：“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战士们感动了，原来他要支起油布是为大家。战士们你瞧我，我瞧你，心中想：那怕我们几天不睡觉，也不愿影响主席一夜的睡眠！毛泽东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亲切地问：“是怕影响我睡觉吗？”“是！”有的战士回答说。毛泽东指着正患痢疾的陈昌奉说：“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觉吗？你们想，是大家好好的过草地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觉好？”说完，他让陈昌奉和他睡在一个担架上，陈昌奉急了，满脸涨得通红说：“不能因为我，使主席传染上……”他哽咽了，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只得慢慢地走向提架。这一夜，战士们和毛泽东挤

在一起睡得很香甜。

按照毛泽东的习惯，他总是一边行军一边工作，不是和干部战士谈心，了解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嘱咐医务人员加强医疗护理工作。进入草地以后，他的工作更繁忙，一旦发现伤病员缺粮，就立即指示副官处，在中途休息时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给伤病员吃，而他自己则坚持吃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副官处的同志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提出给他马肉。但调查了他的粮袋，发现只有很少一点青棵麦子，就硬给警卫班留下二指宽的一条马肉，警收班瞒看毛泽东收下了。到宿营地后，炊事员准备把马肉混着野菜、野葱煮汤吃。毛泽东发现了，责备说：“你们又打埋伏了！”吩咐道：“马肉不能完全吃尽，要给戴天福同志留下一些”！

警卫员戴天福年龄较小，毛泽东对他非常关心。长征到大渡河时，他患了疟疾。进草地后，病势越来越重了，毛泽东一直非常照顾他。当有的战士说小戴是重病号，马肉一定能分到一份时，毛泽东说：“还是留下一些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

这时，卫生员钟福昌和担架员回来了，小钟向毛泽东报告戴天福已经牺牲的消息，并把用纸包好的一条两指宽的马肉交给毛泽东，流着热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吴吉清、黄亚堂、王七九以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你。”

毛泽东摘下了军帽，为戴天福同志致哀，战士们也随着摘下军帽致哀。毛泽东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长征路上的患难夫妻

长征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编在不同的单位，毛泽东随军委总部行动，贺子珍被安排在干部休养连，毛泽东经常随部队走在前面，贺子珍随休养连在后面行进。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很多。在一段时间里，贺子珍的身体不好，又怀了孕。毛泽东便要吴吉清留下照顾她。她也常常牵挂毛泽东，到了宿营地，只要有机会，她就放弃自己的休息，到毛泽东那里去，帮助毛泽东拆洗缝补衣服，或是帮助抄写材料，整理文件。弄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她或是送给伤病员吃，或是装进饭盒里，送给毛泽东吃。有一次，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一起吃饭。毛泽东吃饭时习惯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书报，贺子珍怕毛泽东吃不饱，就悄悄地把自己的饭菜往毛泽东碗里扒，毛泽东因注意力集中在文件上，没有发现贺子珍的动作，但他感到碗里的饭菜总吃总有，想了一想，发觉了其中的奥妙，就幽默地对贺子珍说，“子珍，我的碗是个宝咧，怎么碗里的饭越吃越多呀！哪里变出来的？”贺子珍笑而不答。

贺子珍很关心毛泽东的睡眠。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常常熬红了眼，几天几夜不睡觉。卫生员和警卫员劝他早睡点，他不肯睡。他们就去“搬援兵”，请贺子珍来催，贺子珍来了，他还是说：“不行呀，我正等着前方的电话。”贺子珍说：“我来替你守电话，你先去睡一会儿。电话一响，我就喊你。”这样，毛泽东终于开始了睡眠。

毛泽东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人，他同中央领导人之间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从不同贺子珍讲。但贺子珍和毛泽东一起生活多年，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很能观察和思考问题。长征期间，他与她之间也就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过交谈。

毛泽东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早就看清楚了，他曾对贺子珍说，一个人穷极了，饿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可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到军事问题时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模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指挥打仗，都是认准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象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毛泽东也谈了李德，说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常常有一位全力支持他的好妻子。长征期间，贺子珍是毛泽东真正的同志，是毛泽东精神上的重要支持者和安慰者。因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了种种罪名，扣了许多帽子，一直到长征初期还没有取消，因此，许多人回避毛泽东。在离开中央苏区前，许多人因种种原因都不同毛泽东说话，毛泽东也避嫌，很少找人谈话。长征初期，许多人仍然不同毛泽东说话，而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开始打破沉默，主动找人谈话，政治局的同志，中革军委的同志，他一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反复阐述自己的意见：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长征初期，贺子珍到宿营地后，有时去看望毛泽东，她的来到，都使毛泽东精神上得到安慰。比较多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同志们告诉她：主席去找

什么人谈话了。后来，毛泽东对贺子珍说，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我们党就要垮台，红军也要垮台。由于毛泽东耐心地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终于争取到多数，实现了遵义转折。遵义会议后，他对贺子珍感叹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感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①]

红军长征来到了贵州遵义，这时贺子珍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在遵义时，为了给遵义会议做好准备工作，争取开好遵义会，议，毛泽东忙极了，抓紧时间找同志们谈话，准备发言提纲。睡眼习惯也改变了一半，过去是晚睡晚起，这些天是晚睡早起，睡得极少。白天多数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得很晚，还得看一会儿文电报刊，写一阵材料。

为了支持毛泽东工作，贺子珍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毛泽东爱吃鱼，贺子珍用自己的津贴，到遵义街上买了新鲜的鱼，回来精心烹调，加上辣椒，做得辛辣味美，等着毛泽东回来一起吃。从傍晚一直等到深夜，毛泽东回来时贺子珍趴在桌上睡得正香，她睡眼惺松地埋怨说：“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吃饭了没有？肚子不饿啦？”毛泽东说：“还没吃饭，顾不上呀！”贺子珍进一步问：“这么晚了，还忙什么？”“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毛泽东回答后，又歉意他说：“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毛泽东吃得很满意，贺子珍觉得很欣慰。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为了争取遵义会议的成功，毛泽东不分会内会外都在紧张地工作。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战友和同志，贺子珍对会议的进展极为关心，她企盼会议的成功，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她对毛泽东有深刻的了解，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渴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会议的尊重。在会议休息毛泽东回家吃饭时，贺子珍关切地问：“会开得可好？”毛泽东颇为高兴地说：“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会上都讨论了什么？”“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贺子珍已预感到到会议将会取得成功，中国革命即将出现转折。遵义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回到家里，兴奋地对贺子珍说：“王明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贺子珍也为会议的成功而非常高兴，说：“是呀，现在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

部队在贵州境内行进。一天下午，干部休养连来到一个苗族的村庄，准备翻越一座山峰。贺子珍突然感到肚子阵痛起来，她意识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的女战士赶忙为她准备生孩子用的东西，连长候政立即在附近找了一间破旧房子，把她扶了进去，并让医生和卫生员、女战士留下来为她接生。房子是破的，没有门，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锅、灶、柴禾，也没有水，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

贺子珍生的很慢，连长侯政守在“产房”外面。部队一支支地从这里经过，殿后的部队也过来了，他们说，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四时前翻过这座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我们在后面顶着，你们分娩后赶快走。

孩子姗姗来迟，终于降临人世。这是一个女孩。没有现成的小孩衣服，只好用旧洗脸毛巾把婴儿包起来。

孩子哇哇坠地，母亲愁绪满怀。在长征中，上级规定不许带孩子。毛泽

[①] 贺子珍：《对毛泽东的了解》，载：《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已到前面指挥部队去了，军情紧急，已经来不及与他商量了。贺子珍自作主张，当机立断，决定把刚生下的女孩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她把这件事托付给弟妹，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去办。她掏出了仅有的四块银元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扶养孩子用吧。”

钱希钧要贺子珍给孩子起个名字，或留点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贺子珍不假思索地说：“不用了。她是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这个孩子要是革命呢，我们就是同志，将来也有可能重逢；要是她不参加革命，就做个老百姓吧；孩子大了要是当反革命，她不会找我们，我们也不要她了。”

交代完毕，担架员就抬着贺子珍翻山越岭追赶部队去了。

到了宿营地后，毛泽东来看她了，她把路上分娩的经过讲给他听，并说把孩子送掉了。毛泽东安慰她，要她好好保养身体，并赞同她的决定，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这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①]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指挥红军胜利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1935 年 4 月上旬红军从贵阳附近南进后，突然一折向西，直向云南奔去。一天，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到达贵州盘县猪场，大家吃过中午饭后正在休息。突然，天际响起了嗡嗡声，敌机来了，司号员急忙吹起军号，通知部队分散隐蔽。休养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贞连忙照顾老同志和大姐们防空。敌机越来越近，刹那间钻出了云层，数架敌机直向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而来。

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要贺子珍到路边的沟里隐蔽，但贺子珍却不顾个人安危，立即上前帮助伤病员隐蔽，敌机快速俯冲而来，吴吉清拉着贺子珍往路边跑。敌机失是用机关枪扫射，随后投下了一枚炸弹；在贺子珍、吴吉清的周围弥漫着巨大的烟尘。贺子珍发现一个伤病员正吃力地挣扎着起来，立即扑过去帮助他隐蔽。敌机这时又投了一枚炸弹，弹片向贺子珍袭来，贺子珍栽倒在血泊中，遍体鳞伤。吴吉清急忙背起贺子珍，轻轻地放在担架上。贺子珍昏迷了，鲜血染红了军装。吴吉清哭了，周围的同志都为贺子珍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

吴吉清骑马请来了总卫生部医生李芝，李医生给贺子珍打了止血针，然后进行检查，发现贺子珍头部、上身、四肢共 17 处中弹。因当时没有麻醉药，只服了几片止痛片，取出了浅表弹片，深入体内的弹片没有取出。一直镶嵌在她的身上近半个世纪。

过了好一会，贺子珍才苏醒过来，她见周围站着许多同志，用微弱而坚毅的声音说：“同志们，不要难过，血债要用血来还！”

解放后，贺子珍回忆说：“离开遵义以后，在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我为了帮助伤员隐蔽，躲过敌机的扫射，负了重伤。”

部队就要出发了，然而贺子珍的伤很重，怎么办？休养连领导考虑长途行军，生活很不安定，想了一个妥善办法，想把她安置在一个老乡家里，便于养伤。贺子珍苏醒后，考虑自己伤重，得很长时间要在担架上行军，她怕增加组织上和同志们的负担，因而主动向连里提出，把她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她的意见和连里的想法不谋而台。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行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钱希钧，来到了贺子珍的担架旁，贺子珍吃力地睁开双眼，深情他说：“泽民弟、希钧妹，

[①]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 200 页。

我大概不能和你们共同北上抗日了。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军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贺子珍的心情非常难过，但很真挚恳切。

毛泽民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安慰说：“大嫂，我们已经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了，请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一定把您带着走！”

贺子珍在担架上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当她清醒时，她思忖着休养连老同志和伤病员多，担架和马匹少，自己躺在担架行军，对部队拖累太大，因而一再向组织上提出把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的要求。每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她思想上都产生了感情的波澜，她牵挂着毛泽东，感情上难以离开毛泽东，正象她后来说过的那样：“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但她又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是一个以革命利益为重的人，她不愿拖累部队。

一次，贺子珍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吴吉清在照顾自己，她微笑着开口了：“吴吉清同志，自从邓颖超同志和我介绍你入党后，你进步很快，我们都很高兴。希望你今后多照顾主席。”

停了一会，她强忍悲痛说：“前面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但胜利一定会来。很可惜，我大概不能和你们继续前进了，因为那样会拖累你们。希望把我寄放在这里的老百姓家里，不要继续抬着我走了。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见面。如果我为革命牺牲了，有件事情托给你。前几天，我们从国民常报纸上看到，毛泽覃被反动派杀害了。我妹妹贺怡和小毛，现在也不知道下落。革命胜利后，你要想办法把小毛他们找到。你是知道的，主席特别喜爱小毛这孩子。如果将来小毛找到了，你告诉他：他的母亲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长征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小毛继承母亲的遗愿，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这一番话语催人泪下，吴吉清禁不住热泪直流。他哽咽着说：“贺大姐，怎么也不能把您一个人留在这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一定要抬着您走！”

毛泽东来到了干部休养连，向连的干部询问了飞机轰炸情况，询问了贺子珍的情况。在谈到贺子珍的走留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①]毛泽东一一看完了受伤的同志，逐个进行安慰，然后向贺子珍的担架走来，他先向李医生问了贺子珍的伤势，又向吴吉清间了负伤经过。吴吉清把贺大姐希望留下来的要求作了汇报。毛泽东走近贺子珍的担架，俯下身去，把她的被子掖好，轻轻地温情地问：“子珍，怎么样？”

贺子珍在这最需要感情安慰的时候，听到了毛泽东那非常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心情异常激动，眼睛流出了晶莹的泪花。她想坐起来，毛泽东阻止了她。她柔情地望着毛泽东，声意微弱他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

毛泽东是一个注重实际又感情丰富的人，他对贺子珍如此重伤深感悲痛，他深情他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毛泽东又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贺子珍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增强了与伤疼作斗争的力量。

[①] 贺子珍：《对毛泽东的了解》。

毛泽东又把自己的担架派来给贺子珍使用，以减轻休养连的负担。

贺子珍在担架上躺了两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白天和军委首长一道指挥行军作战，到宿营地后，只要有可能，他总要来探望贺子珍，并带来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给她吃。毛泽东的关怀，战友们的情谊，医生的精心治疗，自己的顽强意志，终于，贺子珍的伤势逐渐好转了，她坚毅地走下担架，迈开自己的双腿继续长征了。

长征中的这一段经历，深深地铭刻在贺子珍的记忆中。尽管后来历经坎坷，她仍然没有忘怀。解放后当她回顾这一段往事时，她一往情深他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在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①]

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和贺子珍谈心时说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①]

[①]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 208 页。

[①]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 228 页。

翻越夹金山

蒋介石不甘心大渡河战役的失败，于 5 月 31 日命令薛岳及川军孙震、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各部合力围堵红军。6 月 5 日，他在成都召集川军高级将领开会，重新部署围堵计划，企图将中央红军围困在雅安地区，将红四方面军阻击在川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分别加以“围歼”。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需要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泸定城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度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等。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讨论并决定了两个问题：一、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一线，以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二、派陈云去上海，以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中央开始也准备派李维汉去白区工作。后来因为他有事，没有去白区，而陈云则从天全、芦山一带出发，经成都、重庆到达上海，后来又到了莫斯科。

根据中央决定，6 月 8 日，军委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指出：“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强调：“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在军委和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迅速北上，6 月 8 日，袭占天全，继占芦山。

蒋介石企图凭借无法逾越的夹金大雪山来阻止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而中央红军决定翻越夹金山，是毛泽东又一出敌不意的果断决策。

军委把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今小金）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红一军团决定由红二师师长陈光率红四团携带电台为前卫,限他们在 6 月 12 日赶到懋功；由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红五团在红四团之后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一师及红三军团一部在红五团之后跟进。

前卫红四团到达宝兴，来到了大硗碛。面前高耸着晶莹耀眼的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懋功以甫，理县西南，海拔 4500 多米，终年积雪。山上神秘莫测，当地面姓叫做神仙山，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都劝红军不要冒险登攀，说如要上山，不累死饿死，也要冻死。如果一定要上山，必须在上午 9 时以后，下午 3 时以前，而且要多穿点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还须手里柱根拐棍。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第一次翻越大雪山，需要积累经验。红四团把了解的情况向上级作了详细汇报，作了爬雪山的过细准备，对部队进行了认真的动员，要求过雪山时不拉一个人。

6 月 12 日 9 时许，红四团的英雄战士们穿着单衣，每人拿着一根拐棍，呼喊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昂首阔步地踏上了征服夹金山的征途。山坡是一片原始森林，路还好走。越柱上走雪越来越深，空气越来越稀薄，气温越来越低，呼吸越来越困难，路越窄越陡越滑，走路越来越费劲。稍一不慎，就会掉进几米深的雪窝。在雪山上，气候变化急骤，有时晴空万里，忽又大雾迷漫，瞬又寒风大作，雨雪霏霏。红四团的战士们用刺刀、铁铲在雪山挖出踏脚孔，在没有路的地方挖出了一条路，有人滑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有人掉到雪窝里去了，别的战友立即递去木棍、绑腿，把

他拉拽起来，拍去身上的雪，又继续攀登了。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站在雪山的一个高坡上鼓动说：“同志们，老乡都说雪山是神仙山，鸟飞不过，人烟绝迹，只有神仙能过，如今我们上来了。岂不成了神仙！”“前进！同志们，胜利在前！”

战士们顽强战斗，不怕困难，终于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山顶，爬过了雪山，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胜利会师。原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获悉中央红军已渡过泸定桥北进的消息后，立即派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三十军和九军各一部前往懋功迎接。6月8日攻占懋功，6月9日占了达维镇。而中央红军的同志们并不知道这点，以为红四方面军还在理番茂县一带哩，翻越夹金山，意外遇亲人。顿时，两个方面军的同志欢呼雀跃，喜泪盈眶，欣喜欢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天，徐向前致电中央，代表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继红四团翻越夹金山之后，中央红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翻越夹金山。

6月14日晨，毛泽东喝了一碗热乎乎的辣椒水，手里拄着一根木棍，身上穿着夹衣夹裤，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沿着许多人踩过的又陡又硬又滑的雪路，向着高耸入云的夹金山顶峰前进。

路大滑，有时前进一步连退好几步。警卫员陈昌奉说：“主席，这山太难上了，让我们搀扶着你走吧！”毛泽东谢绝了：“不！你们和我一样嘛！”

毛泽东有一匹黄骠马，大家劝他说：“主席，你不骑马，那就拉着马尾巴走吧，这样安全，也省劲多了！”毛泽东笑着说：“马，首先应该让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多一个同志爬过这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啊！”

有的战士陷入了过膝没腰的深雪里，毛泽东看见了，总是伸出有力的大手给拉了上来，警卫员吴吉清脚下一滑掉进了路边齐腰深的雪坑里，戴天福把他拉了起来，他发牢骚了：“这叫什么鬼山？我定肯翻十座山岭，也不愿走这么一雪山！”毛泽东听见了，笑着问：“吴吉清，你没见过雪山吧？”

吴吉清说：“没有。”毛泽东鼓励他：“那你应该走走。这艰苦对于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很有乐趣嘛！”

突然间，狂风骤起，浓云密布，震耳欲聋的雷声，鸡蛋大小的冰雹的呼啸声汇合在一起，铺天盖地般狂扑而来。毛泽东和战士们手拉着手前进，他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过了一会儿，暴风冰雹骤然停止。毛泽东问：“这一场战斗怎么样？有负伤的没有？”饲养员老余诉苦说：“雹子把我的手打肿了。”毛泽东叫卫生员钟福昌给老余上药，老余说“不上不上”，拉着马前进了。

越来越接近山顶，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了。戴天福实在走不动了，他说：“我想坐一会儿。”说着，就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回到了戴天福的身边，对他说：“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吴吉清动作敏捷，抢在毛泽东的前面把小戴背到自己的背上，用尽最大的力气，在毛泽东的帮扶下，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走去。小戴在心坎里深深地铭记着阶级爱、同志情的温暖。

毛泽东迈步登上了雪山顶端，极目四望，容光焕发。山北面，下山的队伍正向达维镇奔去，山南面，后续部队正在奋力向雪山顶走来。他向对这支他亲手参加缔造的红军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他向正在登山的战士们招手，

打招呼，鼓励他们奋勇攀登。

战士们太累了。攀登上雪山顶后，战士或三人或五人一伙地坐在雪地上休息，也有的躺在雪地上闭目养神。毛泽东登上山顶后，有些战士来到他身边，说：“请主席休息休息吧！”毛泽东来到坐着休息的战士们中间，说：“不能在这里体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四方面军会师啦！”

毛泽东在红军指战员中间有崇高的威信，战士们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听到毛泽东的话，他们都起来向山下走去，有许多人是“坐汽车”——坐在雪山坡上滑下去的。

毛泽东从雪山顶峰一步步地向山下走去，和部队一起来到了达维镇，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率领的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一、四方面军会师了。

北上！北上！

险恶的夹金山被征服了，蒋介石在雅安地区“围歼”红军的企图破产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军人数下子又壮大到十万人，如果两支主力红军能够在党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团结一致地统一行动，一个革命的新局面必定会很快创造出来。革命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身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看成向党争权的资本，向党闹独立性，给党和红军的统一投下越来越严重的阴影。毛泽东也因此而面临一种新的挑战。他后来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懋功会师

从夹金山下来，毛泽东在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座喇嘛庙。他与韩东山新切交谈，详细询问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情况，从军队的建制、干部的成份、思想状况、战士们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问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的建设，部队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韩东山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汇报，并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顽强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拚命地往前冲。”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说：“是啊！这就是红军的作风！我们从江西出发那天起，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地上追，我们还是闯过来了！”后来，他又找韩东山谈了一次话，热情地鼓励说：“中国的革命才刚开始。道路还很遥运，斗争还很复杂，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奋斗到底。”

6 月 14 日晚上，总政治部在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坡地上，举行了两军会师联欢会。搭了个简易讲台，挂了几盏油灯和大汽灯。联欢会由周思来主持，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联欢晚会，热烈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他的开场白，引起了会场的一片欢笑声。

接着，韩东山在会上讲话，他对中央红军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详细讲解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道路。他的讲话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随后，毛泽东和朱德相继在会上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四方面军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英勇，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很多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迫堵堆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种子……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①]

6 月 15 日，中央首长离开达维向懋功前进。出发前，毛泽东又对韩东山进行亲切的谈话，他说：“我们走后，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们的任务是把警卫布置好，提高警惕，坚决消灭敌人，掩护部队安全通过。现确定将五军团三十七团支给你指挥，我们在懋功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等我们从懋功出发，你们再向懋功行动。明白吗？”

“明白！徐总指挥也早指示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七天，坚决完成掩护警戒任务！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韩东山坚定地回答。

中央首长到达了懋功，受到了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部队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志同志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院内。当天晚上，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会见了李先念。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红军全体同志，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

[①] 韩东山：《攻克懋功会师达维》，《艰苦的历程》（下）第 54 页。

表示亲切关怀和慰问，并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给四方面军很高评价。他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现在会合了。这样，我们的力量更大了。”他详细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李先念作了详细汇报。他还打开一幅军用地图，边看边问李先念：“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形怎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怎样？还能不能打回去？”李先念说：“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大平坝子很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汉族居住地区，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如红军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而且这时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一，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李先念继续说：“来懋功的一路上，只看到很少的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供给。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运动，不容易在这里站住脚。向西和向北条件更差。”李先念总的思想是说明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从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会师后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毛泽东在倾听李先念汇报时，全神贯注，频频点头，他正在思考全局的大问题，准备制定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李先念汇报后，毛泽东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①]

为庆祝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总政治部在懋功召开了红一、四方面军驻懋部队联欢庆祝大会。在会上，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代表红四方面军致欢迎词，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一定虚心向中央红军学习，团结奋斗，并肩前进争取新的胜利。毛泽东和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打击。过去就耳闻过四方面军的光荣战绩，相信两军会合后，一定会打更多的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更多的部队。他们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开创革命的新局面。他们的讲话获得了热烈的欢迎。“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充满战友深情。会后，由战士剧团演出了活报剧《一只烂草鞋》等文艺节目。在天主教堂里，两军一些团以上干部集中开了一次会，进行了会餐。

懋功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李先念说得好：“懋功会师，标志着我们党和我们军队团结胜利的一个新开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50 年过去了，懋功会师所体现的党和人民军队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①]

红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红军指战员人人兴高采烈，他们放声欢唱《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①] 徐向前：《永坚持党指挥的原则》；李先念：《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

[①] 李先念：《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向前进！

然而，敌人却不同了，他们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合的计划破产了，他们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无可奈何地承认了他们的失败："国军防止朱毛西窜之声，早已传之数年，今朱毛毕竟西窜，而达其预定之目的矣。在朱毛西窜当中，行营三令五申，严防朱毛与徐匪向前会合，声犹在耳，墨尚未干，而朱毛毕竟与徐匪向前、张匪国焘会合矣。然而全川之六路大军，不能拒堵徐匪之南窜，中央与各省数十万劲旅，不能截拒朱毛之西奔。中央虽有河山之险隔，给养之困难，病疫之交侵，霜雪之严冷，均不足以摄匪胆，而刺激其改变初衷。两大洪流，竟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应为 6 月 12 日），在懋功之达维合拢。查国军电令，一再言曰，须收聚歼之效，今使之聚矣，何以不歼。然在分窜之中，各不尚不能击破，今既会台，则已蔓不歼，尚可聚歼之大言不惭哉。"[①]这一段评论，除了骂共产党和红军是"匪"，诬红军长征是"窜"、"西窜"、"南窜"、"分窜"之外，其余评论是相当客观的，既承认红军的坚定意志，红军的坚强战斗力，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的不可战胜，又承认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计划的破产，讥讽蒋介石再谈"聚歼"红军就是："大言不惭"。

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才使中央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又跑了出来，不战胜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就不可能夺取长征的全部胜利。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老党员。1919 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参与领导五四运动。1920 年参加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主任。1927 年在党的"八七"会议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 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 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 年回国后，进入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立即产生了分歧。

两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改变了原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 月 16 日，中共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明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

[①]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中央认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地区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中央的这个方针，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主张是一致的，因为蒋介石判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而以胡宗南部 27 个团，布于松潘至于武一线，扼阻红军北进；以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川军 90 余团，固守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杨森、邓锡侯部川军 50 余团布于名山、芦山、雅安、荥经一线，防阻红军东出，以刘文辉、薛岳等部尾追红军，并策应岷江东岸；以马步芳部布防于青、甘边，防堵红军西出青海。又因为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且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建立革命根据地很不容易。据此，徐向前与率先念交换意见，对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问题进行探讨，一致认为还是实行川陕甘计划比较好。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为此，6 月 12 日，徐向前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里说：“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展开，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请西征红军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①]徐向前是赞同中央的川陕甘方针的，是很讲风格的。

然而，张国焘的态度不同。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没有同驻在理县的徐向前商量，即于 17 日复电中央，表面上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却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县、理县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张国焘实际上提出了与党中央不同的另一个战略方针。

18 日，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一、四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20 日，中央再电张国焘，强调：“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力争红军主力出东北，实现川陕甘计划；如绝无办法，暂时只好向川西南发展。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422～423 页。

两河口会议

6 月 24 日，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首长到达懋功县两河口。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很友爱，很慷慨，给中央红军送粮食，送衣服，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很关心，关照中央和军委总部同志要多多了解红四方面军的的情况，做好团结工作。毛泽东在同张闻天交谈时，就要张闻天注意做陈昌浩、傅钟、张琴秋等同志的工作，因为张闻天与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

为了欢迎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6 月 25 日，天下着滂沱大雨，毛泽东、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站在路旁，欢迎张国焘的到来。张国焘骑着骏马，在 30 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来到两河口镇。他态度非常傲慢，骑马疾驰而来，几乎把欢迎的人们溅了一身泥水。他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面红光，象个阔老板，表面上摆出一副豪爽的样子，实际上皮笑肉不笑。他看见中央红军指战员衣衫破旧，表露了瞧不起的神色。

在欢迎会上，朱德首先致欢迎词。他热情地说：“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张国焘在讲话中公开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西进错误方针。他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四川）、康（西康）、新（新疆）大局面的更好条件。”[①]这次讲话，给两军会师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晚上，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了当地出产的青稞酒。

这一天张国焘的无礼态度，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很有意见。毛泽东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听到大家的反应后，皱了皱眉，默不作声，他已经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复杂和艰辛。

这期间，陈昌浩也来看张闻天，畅叙旧谊。谈到过去，津津乐道，然而当张闻天一问到四方面军的现有兵力、装备和今后的打算时，善于言词的陈昌浩却闪烁其词，不肯吐露真情了。

张闻天在和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很多情况。他及时地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他谈到，到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思想状况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他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他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浓厚，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川西北、过草原的打算，缺乏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观念。针对张国焘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如何维持和发展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有利形势，如何搞好两军的团结，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商讨。他们研究确定要张闻天写一篇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文章。6 月 24 日，张闻天就在他的住处——两河口关帝庙里很快写出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并在油印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深刻论述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

[①] 莫休：《大雨滂沱中》，《党中资料》1954 年第一期。

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1]文章还提出了“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

1935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会议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记录，王首道也参加了会议的秘书工作。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来讨论，从战略上讲这是关系向北还是向南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就是由哪个部队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问题。

会议在张闻天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他提出，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他说，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具有上述优良条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并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他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打成都”。他强调应迅速北出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解决。

其他同志在发言中也赞同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张国焘原来认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他曾宣传中央红军有“30 万”之众。这时他得知中央红军长途征战仅剩两万余人的情况后，顿时变了脸色，野心膨胀。在这次会议上，他明里不好反对攻打松潘，心中不愿攻打松潘，不愿承担攻打松潘的重任。他意在保存实力，不愿同胡宗南部战斗。他讲话不紧不慢，不阴不阳，绕圈子，不直接了当，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他摆出各种困难，反对北上，理由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 20 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由于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意见，他最后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看透了张国焘的心理，很耐心很诚恳的讲道理，说得他理屈词穷、最后也同意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攻打松潘。

6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

[1] 《张闻天文集》（一）第 546 页

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还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决议，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张国焘的错误方针而载入史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两河口会议时，不得不承认："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对于张国焘到两河口以来的无礼态度和争权野心，政治局的同志都反对，有的同志非常气愤，说他要夺中央的权。毛泽东进行了慎重的考虑，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毛泽东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商定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国焘对于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但他又攻击这个决定是出自"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①]

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主力北进，保障后方安全；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迅速消灭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

随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于 7 月 10 日克哈龙，16 日攻占毛和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

张国焘是个两面派，他时两河口会议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会议一结束，他就采取政客手腕，在背后进行拉人活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他的手首先伸向这两个军团。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就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去吃饭，对聂、彭二人表示关怀，说他俩"很疲劳"，"干劲很大"，并说他准备拨两个团给聂、彭补充部队，实际上是相当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张国焘的"关心"，引起了他二人的警惕。

张国焘特别在彭德怀身上下功夫。《彭德怀自述》中对这一点写得很清楚："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国焘）主席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希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三）第 235、246 页。

“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①]

张国焘的幕后活动没有奏效，聂荣臻和彭德怀他都没有拉动。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在下东门见到了徐向前。本来，同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应该向徐向前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的，但是张国焘却不愿多谈两河口会议情况，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又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②]张国焘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他并要徐向前第二天直去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他的意见。徐向前因战局紧张，无法脱身，没有去成。张国焘回到茂县后，又给徐向前来电话，要求按照中央决定，攻打松潘。于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主力于 7 月 6 日分别从理县、茂县出发北上。

中共中央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派出了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的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红四方面军，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方。张国焘也赶忙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实际上，他是去限制慰问团的，他对慰问团表面上很客气，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陪同，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慰问团接近红四方同军的指战员。他还背着慰问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大肆散布他反对北上的主张。他歪曲事实真相，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右倾逃跑”。他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他还把他所领导的地区当成了“独立王国”，不接受中央派去的干部。开始，洛甫与李维汉谈话，要他参加慰问团后，就留在那里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然而张国焘不欢迎，他派人陪着李维汉，实际上把李维汉软禁了。不让他出去与人接触。后来，中央打电报要李维汉在红四方面军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他因了解到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底细，感到无法担任这一职务，即向中央发报，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中央明白他的处境不妙，立即回电要他回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的一个重要干部，就这样被张国焘软顶了回去。

张国焘对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并不满足，还加紧向中共中央伸手要权。7 月 1 日，他致电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他煽动一些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任总参谋长。7 月 16 日、18 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边电中革军委，称“浩甚望指挥统一”，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

[①] 《彭德怀自述》第 200—202 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426 页。

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

张国焘这些争权活动，都是背着徐向前进行的。徐向前说：“我当时被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1]

当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北进时，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为此，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问题，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周恩来过夹金山后就病了，发高烧，病中仍为两军的团结操心。在与张闻天商量时，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说：“我这个总书记（总负责人）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认为不妥，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朱德也提出把自己的职位让出。毛泽东经反复思考，认为应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说：“让他当总政委吧。”于是同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主动表示愿把总政委的职务让出。这样，中革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对于这次解决组织问题，彭德怀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1]

7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汇报。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工作情况，徐向前、陈昌浩作了补充发言。会议对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进行了审查，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

为了统一指挥，7 月 21 日，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

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立即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从此一、三军团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络隔断了，与中央也不能直接通报了。

---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427—428 页。

[1] 《彭德怀自述》第 204 页。

毛儿盖会议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给了蒋介石以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东出北上的机会，使红军丧失了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

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后，蒋介后 7 月中旬在成都召开了薛岳部师长以上将领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在甘陕边之风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之企图。根据这一判断，他决定：命薛岳率部于 8 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樟腊营、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8 月，上述各部先后到达指定战略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就很困难了。

7 月底，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8 月初，军委召开会议，朱德、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叶剑英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敌情，认为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实行夏洮战役计划，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歼灭敌主力，达到在甘南创造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正当部队准备过草地的重要时刻，周恩来病倒了，这使毛泽东非常着急。

自从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非常忙碌，白天与战士一道行军，到宿营地后，要工作到深夜才能休息。他太累了，身体日益消瘦，本来就不短的胡子，显得更长了。到毛儿盖后，他每天照常工作到很晚。一天，他突发高烧，一量体温，39.5℃，第二天烧得更高，全天昏迷不醒。邓颖超一直在他的身边精心照护，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等都来看望。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问题，他问总卫生部的同志：“傅连瞳能不能回来？”卫生部同志说，太远了，回不来，但是，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姓戴的医生。毛泽东要卫生部立即发电报叫那位戴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戴医生很快来了，王斌、李治两位医生也来了。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周恩来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神智也清醒了。他们的诊断是，周恩来患的是肝脓疡。这种病治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尤其在长征极艰苦的条件下。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周恩来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在周恩来重病的那些里，毛泽东关怀备至，每天都来看他，每次部队来了同志，毛泽东都嘱咐他们去看看周副主席，使周恩来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毛泽东还要彭德怀负责照顾周恩来的行动，凡部队行军，都用担架抬着行进。

然而周恩来这次肝脓疡痊愈的疤痕，40 年后却生出了肿瘤。1975 年 3 月 20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自已的病情时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空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1]正是这个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

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后，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派人侦察行进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等多次去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去找张国焘谈话，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女）带去了。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二人早就相识，但并不投机。毛泽东想把谈话气氛搞得轻松亲切此，所以与张国焘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指刘英，女）来了。”张国焘一下子没转过来，问：“什么水呀？”毛泽东笑着说：“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是讲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恍然大悟，也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胸怀宽广，讲话痛快、风趣，他想摸清张国焘要解决“政治路线”的真实意图，从各个侧面提出问题启发张国焘讲话。但是张国焘讲话转弯抹角，很不痛快。他反复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啊。他是想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干部尽可能多的提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是他不明说。毛泽东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后，便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量妥善的解决办法。

陈昌浩、傅钟也来找张闻天谈问题，张闻天了解到问题也及时找毛泽东商量。一次，张闻毛泽东说，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泽东看了名单之后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加那么多，”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俩又去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

1935 年 8 月 4 日至 6 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因沙窝在毛儿盖以南 40 里，且属毛儿盖管辖，因此这次会议也叫毛儿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还有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张闻天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决议草案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张国焘的南下西进主张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博古说：“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1]对于博古的批评，张国焘气恼异常，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在多数同志的耐心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主张，毛泽东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有关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毛泽东的想法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他的这种想法和处理，保证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在反对张国

---

[1]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34 页。

[1]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 218 页。

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保证了沙窝会议以及以后多次中央会议的成功。

8 月 5 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指出这种动摇是当时“最大的危险。”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单，是提升红四方面军中三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两人进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在会前商量过并取得张国焘同意的名单。然而，张国焘惯于食言而肥，他会前同意了，会上又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机智地把他顶了回去：“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作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企图在随一、四方面军长征的原有政治局委员七人的基础上，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因此，他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批评他向中央要权。又耐心地说，红四方面军中的这些好同志，可以接受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没有达到全部目的，而且受到严肃批评，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也对徐向前发泄不满，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张国焘多年以后在回忆沙窝会议时，对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首要作用的毛泽东犹咬牙切齿”恶狠狠地咒骂为“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①]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前进。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向甘南进军。

沙窝会议前，徐向前见一方面军保存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从四方面军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中央同意从四方面军抽三个建制团过去，即四军第三十二团，三十军第二百七十团，三十三军第二百九十四团，共 3800 人。沙窝会议前后，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三）第 253 页。

这三个团陆续补充到一、三军团，毛泽东指示一、三军团说：“团结是很重要的，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必须搞好团结；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1]这几个团补充到一、三军团后，受到了热烈欢迎，互相团结友受，融洽无间。

张国焘对沙窝会议非常不满，他一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露骨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不顾沙窝会议的明确规定，又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的错误主张，拖延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8 月 15 日，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还强调指出：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主张的最好保证。要求“全部应即开始出动”。

徐向前也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赶快向北出动，他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已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机关的粮食也将告罄。郑义斋、吴先恩这些“老后勤”愁得不行，徐向前也着急得很，他说：“我想，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1]

张国焘终于迈出了非常难迈的第一步，开始率部北上。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北上。

为了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还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去左路军，均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

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他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蒋敌之部署正是迫我向黄河以西。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因此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还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报告，主张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并强调指出，不应把向

---

[1] 胡炳云：《铁流长征指路明灯》，《甘肃日报》1981 年 6 月 29 日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439 页。

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还认为，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挺高兴，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时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要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路线。昌浩同志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铭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战略预备队，战役预备队还赶不到，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最后，会议通过了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而形成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形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后，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红色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定巩固不拔之基础。”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的正确性。

8 月 20 日和 21 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毛儿盖会议作出的新决定，即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力量灭敌，速出甘南。接着，中央政治局也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

横跨草地攻占包座

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向大草原进军。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行军。红军长征经过的这块草地，是一块纵横数百里，人迹罕至，没有房屋，没有牧民，没有羊群的一片大沼泽地，被深草覆盖着。水呈酱黄色，草底下是草根和腐草结成的软绵绵的泥潭。人和马在草地上行进必须把脚踏在每丛草的根部，踏着草垛前进。否则，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一旦陷入泥潭，如果没有人救助，就会越陷越深，遭到灭顶之灾。气候变化急骤，象小孩子的脸，变化无常，忽而太阳高照，晴空万里，忽而浓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这里茫茫荒野，找不到粮食，野菜、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地看过草地后，这样描绘：“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

毛泽东对草地行军极为重视，因为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大军经历过草地行军。他亲自抓右路军草地行军中的重大问题。他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决定派叶剑英为过草地的先遣司令。

他亲自向过草地先遣团——第一军第四团政委杨成武交代任务。他对杨成武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毛泽东说：“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毛泽东分析了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指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

杨成武汇报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民当向导，准备以八名战士用担架抬他带路时，毛泽东说：“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又嘱咐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毛泽东要杨成武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

最后毛泽东叮嘱说：“望你完成任务。”[①]

杨成武接受了任务，迅速返回部队，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于8月21日开始向草地前进。

毛泽东还抓了部队的粮食和衣服的准备。

一天，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杀以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吃，牛肉每人分一块，晒成牛肉干当干粮。毛泽东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警卫队长分好后一份一份的送到每个人的手

[①] 杨成武：《忆长征》第176—180页

里。因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给她的比给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同志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来，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刘英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毛泽东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他。他很为难的说：“啊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刘英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邹队长就从剩下的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把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这才放了心。[①]

为了战胜草地行军中的各种困难，毛泽东和前敌总指挥部采取了多种办法，如组织有经验的同志挖野菜，“尝百草”，挑出无毒可食的野菜，不让个人乱挖乱吃，以减少可能发生的意外；腾出马匹、牦牛，减少干部坐骑，供宰杀食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团员模范作用，开展唱歌、讲故事和篝火晚会活动，激发部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组织思想和体力互助，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等等。草地行军是异常艰苦的，但红军战士们的情绪则是豪迈、奋进、乐观的。

在草地行军中，毛泽东工作很忙很紧张，还非常注意与战士们同乐。

这是草地行军中的一个夜晚，在一块露营地上，战士门拣了许多湿草根，点了篝火。周围聚集着很多干部战士，有烧开水，吃炒麦的，有烤火烤衣服取暖的，有唱歌、讲故事的，也有拉提琴、吹口琴的，来消除一天行军的疲劳。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著名文学家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油布垫在地下，坐下了。这是一场领袖与士兵的同乐晚会。彭德怀首先开口了：“同志们，我请毛主席同你们讲故事好吗？”一阵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站了起来，他以浓重的湖南乡音，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说明红军胜利的经验，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毛泽东讲完后，他点将了，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

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发起成立了创造社，曾任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欧洲学习。1928 后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党》。1931 年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军委干部团政治教员等职，是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大知识分子，经毛泽东一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成仿吾起来发言了，他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后来留学德国的经过，讲了他从学习机械工程开始，转而学习创作小说、诗歌，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他现身说法，讲了一个知识青年追求理想，献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启迪。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文武聚会，是在千古荒原上进行的、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联欢晚会。这场晚会表明，红军是一支有高度军政和文化素质的队伍，是一支领袖和战士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队伍，是一支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队伍。

[①] 刘英：《难记的三百六十九天》。

经过六七天极为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右路军终于跨越“魔毯”，走出了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阿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总指挥部住在巴西，两地距离很近。

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里的上下包座，是红军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胡宗南部在这里扼守，堵截红军北上。

徐向前。陈昌浩因一、三军长征中减员较多，向党中央建议由三十军、四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前敌总指挥部致电红三十军首长：“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 49 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消灭 49 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 9 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立即命令以八十九师为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然后他二人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在一座寺庙里见到了毛泽东等首长。因为没有桌椅板凳，毛泽东把一张川陕甘交界的略图铺在地下，大家围着地图或蹲下，或找一块木板坐下。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如掉队多少，各连多少人，战士们情绪高不高，生活怎样，部队政治工作怎样，粮食困难是否克服了，打仗准备给养了没有，等等。程世才和李先念一一作了详细汇报。接着，毛泽东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简要的阐述。他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全东北，现在又向华北步步逼进，而蒋介石却一再退让投降，这些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们要北上抗日，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接着，他详细阐述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和意义，他用手指着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四川的北部说道：“我们要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域宽阔，交通方便，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比较多的地区，而且敌人相对力量比较薄弱，加上派系复杂，内部矛盾较多，这些都有利于我军发展壮大，站住脚跟。”在谈到当前任务时，毛泽东指出，为着实现川陕甘计划，“第一步先要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但现在胡宗南抢先占了包座，又派其四十九师赶来增援，我们如果不消灭这个敌人。就走不脱。”又说：“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三十军、四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①]接着，徐向前对攻打包座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布置。程世才、李先念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部队，进行战斗部署。

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敌援兵。在徐向前的亲自部署指挥下，从 8 月 29 日至 31 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奋勇战斗，攻占了上下包座，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 4000 余人，俘敌 8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1500 余支，轻重机枪 70 余挺，电台一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

包座之战，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在徐向前直接指挥下的第一次战斗，打开了红军北出甘南的通道。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为红军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表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①] 程世才：《包座之战》（1986 年 4 月）。

脱离险境

红军右路军北出草地，包座大捷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耳里，蒋顿时大怒，立即下令把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并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这时敌人在甘南兵力比较空虚，利于红军出击。

为督促左路军迅速北进，党中央于 8 月 24 日致电张国焘，指出：“我纵队到甘南后，应迅速以主力出击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还指出，如果违反这一方针，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而严令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张国焘抵制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徐向前得知张国焘的态度后，与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徐、陈于 8 月 24 日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说利害，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强调指出：“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张国焘对这些劝告当作耳旁风，不为所动。

8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9 月 1 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把这一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第一步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以一部控制包座。平行向东推进，以便随时与胡敌五个旅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后，即以两个支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去。

然而，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徐向前也非常焦急。毛泽东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很赞同，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向张国焘发电报，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并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

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在徐向前、陈昌浩的多次劝说下，张国焘终于率左路军迈出了极为艰难的一步。左路军开始向草地前进，前卫红五军到达了墨洼附近。但是，张国焘很快变了卦。9 月 3 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电称：“（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这

份电报的实质是主张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所提的两个“理由”，实际上两个借口。其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当时，坚持北上的朱德曾派人骑马探测河水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渡过的。何况，红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渡过河去，其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粮食丰富，张国焘以前的电报曾强调这点，现为了政治需要，他改变了腔调，他不顾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与他一起发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的严词拒绝后，他竟擅自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与党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包座大捷后，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一军向饿界地区探路前进。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利用有利时机早日北进，并反复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为此，党中央几乎每天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毛泽东、洛甫、博古多次与陈昌浩谈话，做工作，争取他参与做张国焘的工作。9 月 8 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思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同一天，张国焘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张国焘坚持南下方针与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斗争，激化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商量怎么办，徐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即带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决定当晚到周恩来（因生病起不了床）住地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前，毛泽东等拟好了一份给张国焘的电文，会上念了这份电文，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当晚 22 时，中央即以与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甫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面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天芦雅名邛大直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

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然面，陈昌浩一面同意中央这份电报，一面却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于同一天深夜命令红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准备南下。

9 日，张国焘再电徐、陈并转中央，再次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方针。电称：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眼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著向东北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部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立候示遵”是假，命令中央执行他的命令是真。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前敌总指挥部的态度立即发生变化，陈昌浩明确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即去中央驻地，向毛泽东等转告张国焘要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并反映他与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等的严肃批评。陈昌浩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正确批评，反而对中央不接受张国焘和他的意见很不高兴，极不满意。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阴谋和陈昌浩态度的变化，彭德怀有明显察觉。在北进途中，他就发沉张国焘有野心，心存警惕。当红三军跨越草地，到达巴西、阿西地区后。为了防止突然事变，他采取了几项措施：秘密派红十一团隐蔽在东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因张国焘收掉了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他令

另编密电本，以沟通与红一军的联络；他每天去前敌总指挥部，了解情况，观察动静。《彭德怀自述》中耳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我们拥护线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①]

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的性格是坚持真理，不怕挑战。在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党中央当天致电张国焘命令他速即率部北上，“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已了解徐的态度，未再表示什么，就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张国焘的野心恶性发作。他在同一天密电陈昌浩，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一。”[①]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份电报电 9 月 9 日约中午时分到达前敌总指挥部的。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一方面军调来的）和前总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这份密电。译完后，他俩大吃一惊，立即把正在开会的叶剑英从会议室请了出来，把密电当面交给他。叶剑英看完电文后把电报装入了口袋，说：“你们回去吧！”后来又郑重嘱咐他俩说：“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分电报之事。”

叶剑英回到会议室继续参加开会。当天下午，也亲赴牙弄（阿西），把密电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彭德怀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同意想办法。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毛泽东以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寻求解决办法。他亲自到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叫周、王开会吧。”陈昌浩没有察觉到这是脱身之计，同意了。

[①] 《彭德怀》自述，第 202 页。

[①]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 200 页。

毛泽东等来到了三军团司令部，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巴西会义）。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企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在危急情况下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全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杨尚昆说：“长征中有个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地区单独北上的事。那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南下，反对北上。为了坚持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张国焘分表裂党、分裂红军、企图危害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毛主席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如果没有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主席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①]

准备单独北上的工作在秘密而迅速地进行。叶剑英回到前总后，一切如常地参加会议，开展工作。当晚，他来到作战科，悄悄地向吕黎平要来了一份包座战斗中缴获的十万分之一甘肃省全图。深夜时分，他悄悄起床，牵出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直奔红三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因叶剑英与陈昌浩同住一处，担心他能否脱身，。“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①]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叶剑英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大智大勇，果断机敏，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当时就称赞他“办了一件好事”，以后又多次加以褒奖。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泽东同志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毛泽东以手指着叶剑英，又说：“这件事可不简单罗，张国焘当时要是抓住你，脑袋就保不住了。”周恩来 1972 年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长征时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健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②]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毛泽东

[①] 杨尚昆：《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73 页。

[①] 《彭德怀自述》第 203 页。

[②] 《老帅在长征中》第 347 页。

再一次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高度称赞叶剑英的历史功绩。[③]中央机关和总政治部出发的组织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负责。洛甫亲自向李维汉交代任务，他说：“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要李维汉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同北上，并叮嘱他对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李维汉立即分别通知凯丰（负责党中央机关）、林伯渠（与曹菊如共同负责政府机关）、杨尚昆（负责总政治部），叫他们明天凌晨组织部队行动，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当天晚上，李维汉到街上走了两趟，观察动静，看看有没有人发现中央机关的北上意图，他见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丝毫察觉，才放心了。9 月 10 日凌晨，李维汉亲自站在路口等候、指挥，党中央机关和总政治部都出发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因银行、辎重多还没有走出来，他立即跑到政府机关驻地去督促，告拆他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这样，政府机关也很快出发了，他们安全到达巴西，并立即向阿西前进。

中央机关出发时，有人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凯丰对大家说：“都不要问：，快走！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他们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这时张闻天等数人骑马跑来了，张闻天对大家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现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了队伍来追，部队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赶快往北边走吧！

红军大学情况比较复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合，军委干部团与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积极追随者；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党总支书记莫文骅。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军委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特科团的干部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强烈要求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南下方针。团政委宋任穷曾对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提出：“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①]

9 月 10 日凌晨，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莫文骅床边，把他叫醒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车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防备他整你。”莫文骅意识到这是军委示意他通知的，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动员布置，并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到骑兵科长苏进处，通知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北进。

凌晨 3 时许，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特科团接到命令后，韦国清，宋任穷立即集合全团干部、学员准备出发，韦、宋简要地向大家说明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个方针，一个是向甘肃、陕西北上，一个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又说明，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干部和学员们一致回答：“我们要北上，

[③] 宋时轮：《最艰难处显奇才》，《萦思录》第 62 页。

[①] 宋任穷：《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

不要南下！”于是特科团出发北上了。红军大学全部都出发了。何畏一接到北上命令，就借口找军委谈谈，溜到陈昌浩那里去了。

北进中，李德与特科团同行。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也表示不满，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这时，红一军已到达甘肃南部俄界，巴西地区仅有红三军和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一起。在单独北上行动中，毛泽东要求红三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彭德怀决定以红十团担负这一任务，并要军参谋长肖劲光与红十团一道行动，以便及时处理特殊情况。彭德怀亲自向红十团政委杨勇交代任务，他说：“张国焘闹上了。他要南下，让我们也跟他走，那不成！中央已决定我们单独北上。你们团的任务就是掩护中央机关，保障他们的安全，要格外小心，以防万一。”杨勇小心他说：“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彭说：“那也没得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要走到一块儿。”杨勇又担心地问：“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来打我们？”彭说：“有可能，要作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杨勇接受了任务，连夜作了妥善布置，并到各营逐一仔细检查。他对部属反复叮嘱：“我们不先开枪，向他们申明不打自己人的道理。但绝不能放下武器，更不充许他们冲击中央机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绝对安全，是我们的神圣职责！”[①]

杨勇率红十团勇敢机智地担负保卫中央机关北上的任务，直至顺利到达陕北。

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十团在后尾前进。在行进中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9 月 10 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强调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并深刻分析了南下方针的错误：“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党中央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9 月 10 日凌晨，党中央率三军团、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北进。天亮后，徐向前刚刚起床，指挥部的人就来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大为吃惊。

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报告：“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在懋功战斗中负伤）来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向北挺进了。他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他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①] 姜峰：《杨勇将军传》第 68 页。

接着，红四方面军有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向陈昌浩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当时不错，按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一场红军自相残杀悲剧的发生。

随后，陈昌浩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的指挥部部分领导干部开会。会上，陈说：他们走了，怎么办？李特、何畏主张派部队尾追；徐向前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付我们自己的同志。其他与会的同志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这样，陈昌浩才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陈昌浩对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执行很坚决。会后，他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陈昌浩还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李特追上红三军后，毛泽东出来面见李特。李特气势汹汹地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毛泽东义正词严他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毛泽东对李特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要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毛泽东对他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说：“党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领左、右路军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陈昌浩派来的传令兵骑马赶上了红军大学的队伍。传令兵通知：部队原地停下，并说这是陈昌浩送来的张国焘的命令。红军是很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这个命令极其不满，部队还是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也在红军大学前头半山坡上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特科团领导同志也赶到毛泽东眼前。李特持枪带着一批骑兵也赶来了，他的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板机，表情凶狠，气氛非常紧张。李特斥问毛泽东：“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一 294 一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在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面前，毛泽东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对李特晓以大义，耐心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恳切地说明在当前形势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他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和耐心说服，彭德怀能征善战的声威，使李有所顾忌，示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又非常诚挚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

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毛泽东重复讲了三遍，使当时在场的同志几十年后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李特见要挟党中央和一、三军南下无望，便退一步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答复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当即令韦国清、宋任穷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他对四方面军的学员进行了亲切的讲话，分析了当前政治、军事形势，阐述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指出甫下是没有出路的，他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再见！”

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四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我要限毛主席到抗日前线去！”“我也要跟毛主席走，死也不走回头路！”“他们不按组织手续，随便叫人回去，我们不去！”他们坚定地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终于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域，使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战略方针得到实现；这是党中央和毛译东在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的激烈斗争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惊人地准确。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之后刚好一年，1936 年 10 月就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的伟大会师[①]当时红四方面军一个干部王加善回忆说：“我还记得，当红一方面军跟着党中央、毛主席继续北上，即将和我们分开时，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同志们，再见！我还同别人一起嘀咕：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屁股对屁股，怎么再见嘛！毛主席还对一方面军其他同志讲：红四方面军迟早要回来的。可是我们当时就是不能理解。事实证明，毛主席所说的都实现了。”[②]

[①] 宋任穷：《忆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

[②] 王加善：《三过草地话长征》，《湖北文史资料》第一辑。

俄界会议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地区迅速北进，于 9 月 11 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当天，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文指出：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但是，张国焘再次抗拒中央命令。9 月 12 日 22 时，他直接致电一、三军团，声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攻击“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诱令一、三军团：“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 9 月 11 日晚至 12 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共 21 人。

这次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点名批判，有的同志对张国焘非常气愤，要求给他做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

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愿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强调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去走这绝路。

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单浊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

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关开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问题。毛泽东指出张国焘在通（江）南（江）巴（中）苏区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的六路围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一条错误路线。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

毛泽东报告后，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严厉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决定的严重错误，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一、三军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睡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方针。”决定还指出，张国焘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对党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

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同意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是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系统地揭发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及时地调整了战略行动方针，对于保证长征的全部胜利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俄界会议的成功也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卓越的斗争艺术。对此彭德怀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张国焘分裂红军，抗拒中央命令，指战员中议论纷纷。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部队中担心力量削弱了。为了及时把俄界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军指战员，解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认识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给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会后的一个清晨，部队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大森林里集合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发、李德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并决定：我们的红军还要继续北上。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他接着说：“前几天，当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地区后的行军路上，张国焘曾指使陈××派遣了十多个武装骑兵，趁着部队休息，叫喊：‘是四方面军的回去！”这充分暴露了张国焘他们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那天，虽然有的同志跟他们走了，但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今后，我们一定能‘以一当十’，而且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几十’的作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目的，不仅不能得逞，而且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为他们的先遣队，为他们回来开路，为他们将来北上扫清道路。”

毛泽东最后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向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党所领导的英勇红军的！”

毛泽东生动有力的讲话，使广大指战员一扫因张国焘闹分裂而带来的一片愁容，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和勇气。

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共中央于 9 月 14 日再电张国焘,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说明“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坚（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尖锐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恳切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并且特别要求一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张国焘继续抗拒中央命令，并且越走越远。9 月中旬，他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四军、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他预言一、三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葬送”，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他屡电一、三军表示”“诚意”：“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

在阿坝，张国焘大造反党舆论，上演分裂闹剧。他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反党分裂的《阿坝会议决议》。在会场上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标语，围攻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妄图强迫朱德、刘伯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遭到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朱德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叵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南下了。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党中央没有割断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联络，张国焘也没有断绝与党中央的无线电往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开创新局面的同时，仍然极为关心红四方面军这支党的武装，一直想方设法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为保存和发展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殚精竭虑，费尽心智。

奠基西北

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毛泽东每天都随一军团走在前面，实行靠前指挥，彭德怀和叶剑英率中央直属队和三军团随后跟进。

欲出甘南，是必须通过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是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毛泽东决定打开天险腊子口，红一军团决定以红二师四团承担这一任务。红二师师长陈光与红四团首长一起观察地形，共同研究作战方案。

腊子口，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遇到的又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这里地形比娄山关更加险要，两边是悬崖绝壁，崇山峻岭，山口很窄，宽 30 余米。中间有条腊子河，水流湍急，深约 3 米，不能徒涉。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桥挂在两山之间。要通过腊子口，木桥是唯一的通道。腊子口守敌为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第一旅的两个营，在桥头筑有碉堡，在腊子口后面的三角形谷地设有军需仓库，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敌人在这里组织了交叉火力网，企图阻止红军通过。

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观察地形后，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战斗方案，又召开连队士兵大会，发扬军事民主。决定采取正面强攻与爬山迂回两面出击的战斗方案。分工由杨成武指挥正面强攻，以二营六连为主攻连；迂回部队由侦察队、两个连和信号组组成，由王开湘率领，从背后奇袭敌人。

9 月 16 日晚，正面部队开始向腊子口进攻。敌人自特地形奇险，大吹牛皮：“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今天，也别想通过我们鲁司令的防区腊子口！”红军战士被激怒了，大家决心天明前一定拿下腊子口。正面部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迂回部队在一个能攀藤附葛的苗族小战士“云贵川”（外号）的带领下，攀登上峭壁，从山崖上向敌人的碉堡工事扔手榴弹。两面夹攻，迅速地打垮了敌人，于 17 日凌晨一举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了进入甘南的大门。红四团猛追溃敌，占领了大草滩，在这里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盐两千斤，对经过雪山草地行军长期缺粮的红军是一个极可宝贵的补充。特别可喜的是，受到了汉、回族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使在藏区很少接触群众的红军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部队离开大草滩向哈达铺前进。这时，红军已走出了岷山山脉，结束了几个月来异常艰苦的雪山、草地、栈道行军，进入了汉回杂居的地区，长征胜利在望，指战员精神非常振奋。毛泽东在其著名的《长征诗》中有这样两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充分反映了广大指战员的欢愉心情。

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毛泽东授意以一、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的名义，于 9 月 18 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各军首长，报告胜利喜讯：“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 17 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 30 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此地物资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恳切地提出要求：“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然而张国焘没有回音。

确定长征的目的地

红四团夺取腊子口后，红一军团首长派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立即出发到哈达铺，执行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的任务。当时在场的毛泽东说：“我补充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要搞几份来。”

接受任务后，侦察连干部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哈达铺。正巧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带着几驮子书籍、报纸、衣物等物品。曹德连从少校副官的驮子里缴获了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登载着涂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台的消息，还有被敌人诬为“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聂荣臻看到报纸后非常高兴，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了报纸，兴奋他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①]

过去，党中央对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存在是知道的。但当时对其发展的具体情况是不清楚的。现在，敌人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情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翻读这些报纸，边看边谈，眉飞色舞，决定率领陕甘支队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并且决定沿途尽量避免打仗，减少战斗减员，昼夜兼程向陕北前过。

据张闻天 1935 年 9 月 22 日写的“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发表在 1935 年 9 月 28 日出版的《前进报》第 3 期）记载，当时记载陕北红军与徐海东红军情况的报纸，有天津《大公报》1935 年 7 月 23 日、29 日、31 日、8 月 1 日各期。该文在详细摘引了《大公报》关于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消息后指出“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8 月 20 日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9 月 19 日，红一军团部和红二师进入哈达铺，9 月 21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哈达铺。部队在这里进行了短暂休整，改善了伙食，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并且进行了整编。9 月 22 日，中央在哈达铺召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长征的历程，说：[①]

“同志们，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再过几天是阳历十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在谈到当前形势时，他说：“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 30 多万人。朱绍

[①] 曹德连：《“精神食粮”》，《星火燎原》1983 年第 1 期第 51 页。

[①] 《张闻天文集》（一）第 569 页。

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 1933 年 1 月 17 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图再次的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毛泽东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例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毛泽东特别提到，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的“并键时刻，叶剑英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幽默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毛泽东深情地预言：“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接着，他宣布了中央关于改编部队的重要决定。他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其他领导成员是：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兼），政委邓发。

他又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1]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 1929 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就是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将来一定要扩展到全国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伙夫、马夫都是很好的干部！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他说：“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有刘志丹、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有我们的

---

[1] 《彭德怀自述》中说，此时，五、九军团大概约六六千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哈达铺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

抗日前进阵地！我们两军会合以后，就可以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①]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广大指战员异常激奋，特别是第一次听到陕北有块苏区，长征二万里，这才明确了长征的目的地，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情绪非常高昂。

在哈达铺，毛泽东和党中央耐心等待张国焘率部到来，当确知张国焘已率部南下时，党中央即决定率领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迅速前进。9 月 23 日，从哈达铺出发，毛泽东和彭德怀随一纵队司令部前进，亲自了解敌情，掌握行军路线。

渭河沿岸，从和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到天水一线，是蒋介石构筑的封锁线，驻扎着国民党第三军王均部、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9 月 26 日，陕甘支队顺利渡过渭河。突然，左右两侧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响起来了。这时，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邓发等领导同志来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敌情，彭德怀问：“主席，你看怎么样？”毛泽东笑着说：“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样的”。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判断，派出了小部队，放了几枪，敌人真被吓跑了，红军又从容前进了。指战员们兴高采烈地议论说：“毛主席真是料敌如神啊！看，毛主席一句话，就把敌人制住了。”

就这样，红军胜利通过了渭河封锁线。

自从在哈达铺了解到陕北苏区的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就找贾拓夫谈情况。贾拓夫原在陕北工作，1934 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他作为陕北的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长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从哈达铺北上后，毛泽东每天行军都把贾拓夫带着一路谈，向他了解陕北红军、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获得了对陕北苏区较具体的了解。

9 月 26 日，前卫一纵队到达通渭的榜罗镇。27 日，后续部队进入榜罗镇。在一所小学里获得了很多报纸，提供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北方的很多材料，也登载了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六军会合的具体情况。根据获得的新材料，9 月 28 日，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会议根据报上提供的材料和贾拓夫所说的情况，决定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10 月下旬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榜罗镇会议确定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决定。

政治局常委会后，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

[①] 杨成武：《忆长征》第 225—228 页；潘振武：《战歌春秋》第 115—116 页。

条件；（四）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1]他说：“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六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我们出了潘州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因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勇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精华汇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强调要整顿纪律，“要把军风纪大大地整顿，要教育，要不怕麻烦，讲了一遍又一遍，要干部自己做起模范来”

干部会后，干部们分头向战士们作了传达。中央红军辗转征战，历尽艰辛近一年，眼看就要到“家”——陕北苏区了，广大指战员都非常振奋。

9 月 29 日，陕甘支队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进占通渭，歼敌 300 余人。在这里，红军休息了两三天，作好通过西（安）兰（州）大道的准备工作，进行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组织会餐和游艺联欢会，并抓紧军事方面的准备，在通渭城召开干部会时，毛泽东诗兴大发，他在讲话中即席朗诵了一首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长征诗，是一首气势磅礴、寓意深远的不朽名篇，是一幅威武雄状、伟岸恢宏的历史画卷。

10 月 2 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向西兰公路前进。10 月 4 日，跨越西兰公路北进。这时，蒋介石获悉陕甘支队系红一、三军团组成，由毛泽东率领的消息，他暴躁恼怒，衷叹“六载含辛前若，未竟全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部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以削弱和歼灭红军。

红军继续前进，一鼓作气攀登上六盘山顶，冲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在望。毛泽东健步来到六盘山上，感慨万千，哼成了《六盘山》的光辉词章：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

[1] 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词，道出了红军战士的胜利豪情和北上抗日，消灭敌人的坚定决心。

10 月 7 日下午，一纵队在青石嘴发现了敌情，毛泽东决定消灭面前的敌人。他立即召集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下达战斗任务说：“ 隘口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人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 ”又说：“ 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 ”一纵队首长林彪，聂荣臻、左权指示说；“ 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三个大队似猛虎下山，迅速包围并解决了敌人，缴获战马一百多匹，及十多辆马车的子弹、军装和布匹，敌骑兵团 500 多人，除击毙外全部当了俘虏。根据毛泽东和一纵队首长的指示，红军用缴获的马装备了一个骑兵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陕甘支队加速向陕北前进。10 月 19 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镇），宣告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敌东北军骑兵军第三师和第六师、马鸿宾三十五师骑兵团等部一直紧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对支队领导说：“ 要想办法打它一下。 ”他让聂荣臻到前面阵地上实地观察一下。了解一下敌情。聂荣臻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 ”毛泽东当即定下了打击敌人的决心，并召开指挥员进行部署。他在会上说：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 尾巴 ”，一定要把这条“ 尾巴 ”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他号召坚决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毛泽东、彭德怀决定，以一纵队在正面，二纵队在左翼，向吴起镇西北的敌骑兵进行突击。

毛泽东亲自对战斗部队动员说：“ 敌人如此猖狂，我们要狠狠地打击消灭他们！ ”

10 月 21 日早晨，敌人的骑兵“ 如约 ”前来，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第三师从正面推进，马鸿宾三十五师骑兵团为侧翼，企图两面夹击红军。彭德怀直接指挥了这一次战斗。红军勇猛突击，迅速歼灭敌人一个骑兵团，击溃了敌三个骑兵团，抓获了大批俘虏，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取得了重大胜利，砍掉了敌人的“ 尾巴 ”，使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进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表彰彭德怀的杰出指挥才能：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到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后，在这里召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对长征作了精辟的总结。

毛泽东最后说：“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损失也是巨大的，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八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

命的伟大任务。”[①]

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深远影响。史沫特莱获悉这一胜利喜讯后非常高兴，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鲁迅，并建议鲁讯去电祝贺。鲁迅把这件事又告诉了茅盾。鲁迅还单独向中共中央发了贺电：贺电写道：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中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每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①]

鲁迅的贺电，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勇斗争的模范”。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热情赞扬中国红军长征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誉中国红军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举世无双的”，“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②]

[①] 《聂荣臻回忆录》（1）第 286—287 页：杨成武《忆长征》第 254—256 页

[①] 《茅盾的一封解疑信》，《文摘报》1992 年 6 月 4 日第 7 版；《<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 年第 3 期第 132 页。

[②]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隆重奠基

中央红军的长征，以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为标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敏锐和战略家的气魄，发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感慨。但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革命的危机依然严重地存在。

尽管陕甘支队在彭德怀指挥下消灭了尾追而来的一股敌人骑兵，暂时把追敌挡在了陕北苏区的外面。但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国民党中央军毛炳文、王均、胡宗南部和东北军、西北军，以及西北“四马”等几十万武装，蜂拥而至，将仅存在一块苏区团团围住。陕甘苏区随时面临着被强敌攻占的危险。

经过一年多艰苦跋涉的中央红军，征尘未洗，指战员衣衫滥缕，武器装备奇缺，而且只剩下了八千人。英勇顽强的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虽然连续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正在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但这时“左”倾肃反扩大化的阴影又笼罩着他们，包括陕北红军创始之一的刘志丹在内的一批军政干部被抓，或被杀。而且，红军赖以生存的这块仅存的根据地，土地脊薄、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很难供养大量的部队和支撑长期的战争，怎么办？这是毛泽东和所有透悟出局势之严重的人共同焦心的问题。

历经磨难的毛泽东，经过长征风雨的洗礼，显得更加成熟、坚毅和自信，他首先把眼光注视向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上。

10 月 29 日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奠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并且特别强调：“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斗争。

当这个文件送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手中时，徐海东和其他同志欣喜异常，“中央来信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打胜仗迎接党中央！打胜仗庆祝会师！”的口号，成了红十五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军团政委程子华立即前往吴起镇方向迎接。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派贾拓夫来与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联系，他带了一个连，并带了一部电台准备给十五军团。在安塞县的下寺湾（后属甘泉县），他们相遇了。程子华和郭洪涛通过贾拓夫带的电台，把陕北苏区和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经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红十五军团正大打张村驿，张村驿，是一个小村镇，周围有四个围子，守敌有 300 多人枪。徐海东刚刚发出攻击命令，就收到了军团政委程子华从军团部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到军团司令部来，请徐海东同志速回军团部驻地。”徐海东非常高兴，立即下令部队暂停攻击。并飞身上马，快马加鞭，3 个小时跑完 135 里，回到了道佐辅军团司令部。他刚走进窑洞，洗完脸，毛泽东、彭德怀、贾拓夫、李一氓等同志就来了。未经介绍，毛泽东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接着他向徐海东、程子华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徐、

程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毛泽东拿出一张三十万分之一地图，问道：“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徐海东把敌情作了分析，对反“围剿”的打算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折起了地图，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谈话结束，毛泽东等与徐海东、程子华一起吃了饭。分别时，毛泽东对徐海东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徐海东以前通信联络主要靠骑兵通信员，从未用过电台，就说：“我不会用它。”毛泽东微笑着说：“不要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徐海东带者电台，回到前方，立即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的消息向部队传达，并转达了毛泽东对大家的问候和指示。部队情绪沸腾了！战士们纷纷说：“打下张村驿，迎接毛主席！”“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大家一鼓作气爬上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打开了附近的据点，歼敌 300 多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发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电报，他致电毛泽东，报告战斗胜利的消息。当天，毛泽东复电徐海东，向参战部队祝贺胜利。

张村驿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北返（富）县以北地区，11 月 6 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与陕甘支队胜利会师，会师当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但两军指战员似亲人久别重逢，战友情深，气氛非常热烈。

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将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红一军、红三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二师、第四师和第一团、第十三团；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警卫团。全军共一万余人。

为了加强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西北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伍修权、毕士梯等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有力地加强了红十五军团的建设。

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途征战，到达陕北时经济相当困难。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张给徐海东的纸条，交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长杨至诚带着来见徐海东，说明要向红十五军团借 2500 元钱，以解决红一军团的吃饭、穿衣问题。毛泽东的字条，杨至诚的说话都很客气，没有丝毫行政命令的语气。当时，红十五军团经济也感拮据，还须数千元才能解决购买油盐、药品和冬装问题。但是徐海东胸怀大局，毫不犹豫地要军团经理部长查国侦从军团现存的六千元现洋中，“拿出五千元，送给党中央”。他的这一行动，使杨至诚很受感动，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热烈赞扬。说红十五军团这是“雪里送炭。”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成红一方面军后，有力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当时，蒋介石发动的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没有结束。党中央率陕甘支空到达陕北后，对敌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红十五军团劳山、榆林桥两战两捷，使敌人大为震动。10 月末，敌“西北剿总”决定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企留先沿葫芦河构成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和延安之

间的联系，沿洛河构成南北封锁线，再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方针，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东地区，彻底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根据陕北第三次反“围剿”的形势和当时敌情，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粉碎“围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杯新临前线指挥。作战方针是，向南作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力争初冬解决“围剿”。尔后向洛川、中部（今苏陵）。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以扩大苏区和红军。

为保证战役的胜利，决定以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继续围困甘泉敌一个团，以二四三团在羊泉塬地区配合地方游击队积格活动，牵制鄜县、中部之敌，阻敌西援，以保证直罗镇胜利歼敌。

在下寺湾召开了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进行战役部署。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敌情，讲解了部署，下达了作战任务，他援引《水浒》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他说，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生动的比喻，严密的部署，使大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周思来强调说，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去做，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彭德怀对各级指挥员提出了严格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我们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歼灭敌人。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彭德怀又组织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的小山上仔细地观察地形，进一步研究了部署。

部队认真进行了战斗动员和战斗准备，并拆除了直罗镇东面的旧寨子，以防被敌利用。新解放来的战士问：“敌人真的会来吗？”老战士信心十足他说：“会来的，这是毛主席算好的。”

敌人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听从了毛泽东的调动。

10 月 28 日，敌西路第五十六军开始东进，11 月 1 日占领太白镇。11 月 6 日，敌南路六十六军之——七师进至富县。为迷惑和调动敌人，红二四一团向甘泉加紧围枚。敌“西北剿总”见甘泉危急，令第五十七军三个师迅速东进。11 月 19 日，敌五十六军先头第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一带。

红军派出小分队到黑水寺方向去“惹牛”、“牵牛”，以连续不断的零星战斗，牵着敌人鼻子走。敌师长牛元峰很骄狂也很“驯服”，20 日下午 4 时许，在飞机的掩护下，牛元峰率一〇九师进入了直罗镇，他兴高采烈，急忙向其上司报捷，说他已胜利占领了直罗镇。

当天晚上，毛泽东下达命令，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行军前进，于次已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

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直罗镇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和战斗进行中，他一一再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突然发动猛攻，激战至上午 10 时许，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分别将北山和南山守敌大部歼灭，牛元峰率残部 500 余人，撤至镇东旧寨子，固守待援。红七十八师向旧寨子残敌第一次攻击没有奏效，周恩来亲自到阵前观察，指示说：“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夜 12 时，牛元峰果然率残部向西突围，红军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歼灭。当红军追近时，“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

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1]

红军猛追溃敌，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中间歼敌后卫第一〇六师第六一七团。

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因和扩大了陕北苏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2]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在于：“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分；四、群众与我们一致。”徐海东说：“还要补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主席的英明指挥。”[3]

直罗镇战役之后，毛泽东提出：“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猛烈扩大自己，……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1]在1936年春夏的扩红运动中，扩大了四五千新战士，新编了三个军，即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和两个独立师，使红军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

毛泽东在着手组织直罗镇战役的同时，就着手解决陕甘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毛泽东在吴起镇时，就听到陕北地方领导人的汇报，悉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主要干部被拘捕的消息。贾拓夫、李维汉携带电台到甘泉下寺湾遇到郭洪涛时，又进一步证实这一消息。他们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后来毛泽东又听到徐海东等同志对肃反情况的反映，得悉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许多负责干部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2]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王首道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与刘向三等迅速赶赴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中心），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又说：“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王首道等迅速到达瓦窑堡。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搬出了证明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许多案卷，王首道认真

---

[1] 沈叔明等：《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213页。

[2] 《毛泽东选集》一卷第一版第136页。

[3] 徐海东：《奠基礼》。

[1]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75、76页。

[2] 王首道《怀念集》第25页。

审阅了这些案卷，并深入干部、群众中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从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对革命忠心耿耿，出主人死，英勇奋斗，在渭华起义中，在创建陕甘苏区和红军的斗争中，屡建功勋，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的优秀领导干部，而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戴季英等强加在刘志丹身上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强加在其他被捕同志头上的“罪状”，也全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

11 月初，中央组织了以董必武为首，有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思来赶赴瓦窑堡，与张闻天一起，亲自处理肃反扩大化问题，听取了王首道的汇报。认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应予立即释放，党中央对制造这次冤案的戴季英、聂洪钧给予了处分。

刘志丹等 100 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迅速获得释放。毛泽东、周思来接见了刘志丹，毛泽东安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思来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泽东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非常高兴他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刘志丹以博大的胸怀积极对受冤枉挨整的同志做工作，说，“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①]

随后，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思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等重要职务。稍后，毛泽东从徐海东那里了解到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还有 30Q 余同志受冤枉，被打成“改组派”、“AB 团”、“反革命嫌疑犯”，这些同志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至今仍戴着这些帽子。毛泽东了解真实情况后，指示说：“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当徐海东亲自为这些同志平反，并宣布给他们恢复党籍团籍时，这些同志都感动得哭了，徐海东也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这样，肃反扩大化问题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毛泽东不但在长征中挽救了中央红军，而且也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1979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

东征、西征

在粉碎敌人的“围剿”之后，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这是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如以来，红军第一次准备实施积极进攻的方针。毛泽东提议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

据此，军委决定进行东征，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兼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另外，留下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九、红三十军和一些地方武装，担任陕甘根据地留守任务，由周恩来指挥。

1936 年 2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东征宣言》，宣布“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2 月 18 日，在延川县清水关古峪村召开了东征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亲自作动员，他明确提出了东征的任务：一、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还指出，当前我军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渡过黄河。

红军东渡黄河。创造新根据地，政策是关键。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认真贯彻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如对俘虏、商人、富农、小地主的新政策，2 月 10 日。他电示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他询问部队对这些方面“具体政策了解如何，即告。”东征各部队新策略新政策认真进行了教育，清除了中央苏区后期王明“左”倾昌险主义政策的影响。

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东征军兵分两路，以一军团为左路军，以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为右路军，于 2 月 20 日 20 时，准时地展开了敌前偷渡，被敌发觉后立即变偷渡为强渡，一举突破敌人河防，渡河成功。随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发布“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通由全国。

红军东渡黄河后，纵横驰骋于晋中、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威逼太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阎锡山急忙把进驻绥德、米脂的晋军四个旅调回山西，使陕甘苏区进一步得到巩固。

阎锡山遭到沉重打击后，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早想插手山西，满口应承。当即决定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陈诚任总指挥，杨爱源任前敌总指挥，孙楚任副总指挥。并于四月中旬派了十个师进入山西，配合晋军，妄图将红军聚歼于隰县、石楼地区。同时，蒋介石还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向陕甘苏区进攻，扰乱红军后方。

为避免与优势敌人的决战，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国民党政府共同抗日，毛泽东决定回师西渡，撤回陕北。

东征军回师西渡时、国民党中央军和晋军 20 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黄河渡口压来，形势颇为紧张。毛泽东决定带者电台和一支小部队留在河东，亲自率领这支小部队为全军西渡作最后掩护。毛泽东的亲自指挥，给了广大指战员以巨大的信心和勇气。部队秩序井然地乘着仅有的几条木船，源源不断地渡回黄河西岸，毛泽东科学地计算着各路敌军逼进的时间和进程，当他随同

最后一批掩护部队安全渡河，回到西岸不久，敌人的大军也来到了黄河渡口，望着滔滔黄河，徒唤奈何。

5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称蒋介石为蒋氏，阎锡山力阎氏，开始将过去反蒋抗日的策略向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

这次东征战役，历时 75 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共击溃阎军 31 个团，歼敌 17000 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 4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4000 余支，火炮 20 余门，电台一部，子弹数十万发，扩大红军 7000 余人；筹款 40 万元；组织地下游击队 30 多支；并在广大地区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东征战役，是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继直罗镇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泽东在总结东征的经验教训时说：“这次东征战役我们撒了两网，一网撒到了太原以南，一网撒到了临汾以南，收获是很大的。但是，可否设想把网撒到京汉铁路上去，胡宗南的部队就可能被吸引到京汉路上去。我们则有太行山脉作依托，那样战争的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了”。[①]

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国民党拒绝中共中央“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坚持其反共内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调兵遣将围攻陕甘苏区和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

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

1936 年 5 月 14 日，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东征，动员与部署西征。毛泽东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西征的任务：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逢、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促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 月 18 日，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 1.3 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进行西征作战；以红二十九、红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群众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保卫陕甘老根据地；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坚持当地斗争的红七千四师，在鄂豫陕边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后来军委决定红二十八军改在石湾、绥德以南地区掩护运粮，并参加西征作战。

5 月 20 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到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十五团到新城堡集结；红八十一师、骑兵团和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后跟进。

5 月 27 日，右路军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攻占宁条梁，经惠安堡、韦洲、豫旺地区，于 6 月 12 日占领同心城，进至王家团庄附近。

5 月 28 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吴起镇出发。6 月 1 日，红二师攻占曲子镇，迫使敌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旅长治成章等 150 余人投降。红四师击溃敌一个营，进占阜城。6 月 3 日，红一军团主力在阜城地区歼敌三十五师六个

[①] 郭述申：《革命生涯中难忘的导师——回忆毛泽东》。

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营大部，俘敌 1100 余人。

左路军在曲子镇和阜城地区两战两捷之后，乘胜攻占了环县、洪德，于 6 月 13 日进至宁夏七营附近。

6 月中旬，由红二十八军、八十一师和骑兵团组成的中路军也到达宁条梁和定边附近。

至此，西征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西方野战军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开辟了一大片新苏区。

6 月 14 日，西方野战军首长提出了下一步的基本任务：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地区，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城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这样，西征作战进入了第二阶段。6 月 16 日，右路军袭占定边城。21 日，中路军攻占盐他。20 日，左路军攻占七营，并于 21 日攻占王家团庄，27 日攻占豫旺县城。左路军前进至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后，就地整训，发动群众，有意识地不接近西兰公路，以免过早惊动敌人。

在这期间，敌人不断组织力量进行反击、袭扰。对于马家军，红军予以坚决打击；对于东北军，红军原则上避免与其作战。必要时予以打击，六七月间，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张学良去南京开会之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七个师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向红军进犯。7 月上旬，他集结步、骑兵五个师于固原、七营之间，准备分两路沿清水江向北进攻。

7 月 14 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 对何柱国指挥“ 进剿 ’ 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 并指出：“ 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 ”“ 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 ”

7 月 17 日，何柱国以骑六师向红军进行试探性进攻。直逼红军驻地七营的堡子下面，红二师一举将其击溃，消灭其四个骑兵连，缴步枪 300 余支，敌人见红军已有准备，且张学良已从南京回到西安，即暂停进攻，红军对抓到的俘虏，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归还马匹、武器，全部予以释放。

至 7 月底，西方野战军在两个多月的西征作战中，大量消灭了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火枪。战马 500 余匹，开辟了纵横 40D 多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陕甘宁的广大地区。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材，在新开辟地区建立了县、区乡各级革命政权，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西征的胜利，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5 年 9 月，张国焘一再抗拒中共中央北上命令，擅自率军南下，10 月 5 日，张国焘在松岗卓木碉召开反党的高于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还非法成立了“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机构，并以第二“中央”的名义，非法地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工作，开除其党籍，下令通缉；杨尚昆和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行动，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徐向前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

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而灵活的斗争。1936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念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 1935 年 9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饿界的决定。”

张国焘率领南下的部队，包括红四方面军全部和红一方面军中编入左路军的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军，总数达八万余人。1935 年 10 月初，张国焘率领这支部队开始向南征战。10 月 7 日，制定了《绥（清）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部队分左右两纵队南进，广大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运用奇袭、夜摸、迂回穿插等灵活机动的战术，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抚边、达维、懋功、日隆关、巴朗关、火烧坪、邓生等地。10 月 20 日，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溃川敌六个旅，歼敌 3000 余人。

红军南下，蒋介石急令刘湘调兵防堵。刘湘调集了约 80 个团兵力，布防于名山、芦山、天全、宝兴、大硗碛、金汤、泸定、雅安、汉源一线，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10 月 20 日，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兵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南进攻。开始，进展比较顺利。至 11 月 12 日，先后攻克主兴、天全、芦山，前锋逼近邛郫县境。这时，刘湘集结 80 多个团的兵力，企图在邛崃、名山地区与红军主力战，阻止红军东进成都平原；另以 16 个团赶向新津、洪雅地区策应；而薛岳部主力则集结成都等命行动。

然而，张国焘不顾敌情严重，仍令红军主力进攻名山、邛崃，11 月 16 日，红军攻克名山东北要镇百丈。19 日，敌集中 10 多个旅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向百丈地区反扑，红军基战七昼夜。毙伤敌 1.5 万余人，红军也伤亡近万人，被迫撤至名山西北地区转入防。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被迫结束。百丈失利，标志着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徐向前就：“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第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

的。”[1]

南下以后，红四方面军行军作战，减员很大。1936 年 4 月进行整编，已从南下时的 8 万多人减到 4 万余人，这是张国焘南下方针造成的恶果。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极为关心，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告以全国形势，通报敌情，指示行动方针，转告红一方面军的胜利消息，1935 年 12 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党中央立即把会议精神通报红四方面军，使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干部开阔了眼界，受到巨大的鼓舞，大家表示应在新的统一战线策备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

党中央又及时把红一方面军胜利的消息，转告红四方面军。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和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广大指战员在私下纷纷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益强烈。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越来越认识到停留在川康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出路，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增长。部队到达甘孜、炉霍地区后，徐向前提出：“西康少数据民族地区，地广人稀，部队兵员、粮食、衣物无法补充，要赶快北上与中央会合。”[1]

1935 年 11 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他受中共中央委托，积极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 年 1 月 24 日，张浩致电张国秦，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己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立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关于张国焘与中内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他不断地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北上与党中央会合，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结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当头一棒，促使陈昌浩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劝他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以后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他们还提出：这边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办法，张国焘表示愿意接受，中央从维护党内统一出发也表示同意。1936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系己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表示同意“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张国焘见处境孤立，被迫于 1936 年 1 月 27 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同意”党中央的路线，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6 月 6 日·张国焘被迫公开宣布取消伪“中央”，准备成立西北局，历时 8 个月的张国焘伪“中央”，终于寿终正寝。

1936 年 7 月 1 日，红二、六军团长征入康，齐集甘孜，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朱德与任弼时、贺龙见面时非常高兴，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任弼时坚定地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指挥！”南昌起义时的老战友贺龙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哩！”

---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456 页。

[1] 徐深吉：《徐向前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艰苦地历程》（一）第 46 页。

7 月 1 日，中共中央为红二、六军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发来贺电，说：“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者，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随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设立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红二军（红二军团）、红六军（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红二方面军的成立，对配合朱德、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维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执行，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共中央还发了一份由任弼时亲译的电报，电文大意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要团结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要求任弼时结合具体情况，去传达、宣传、贯彻中央的方针。任弼时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与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同志共同努力，对促进张国焘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起了重要作用。

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北上。在开始北上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不断来电，询问情况，热情欢迎北进，5 月 25 日.党中央致电四方面军，告诉说，红一方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6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二、四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并指出：“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

7 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共同北上。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高兴，不断给予指示。7 月 13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氓州，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胜。”7 月 22 日，党中央致电红二、四方面军，告以“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井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指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合，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创西北的伟大局面。”7 月 27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7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询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 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攻占包座后，毛泽东等立即致电视捷：“接占包座捷电，无任欣慰。”并提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电后即复电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前进。约 8 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8 月 13 日，党中央来电表示：“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

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 月 5 日，西北局发布了《岷》（县）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分三个纵队向甘南发展，先机夺取岷县、临潭、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8 月 5 日至 12 日，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甫前进。至 9 月中旬，红二、四方面军全部进入甘南，先后攻占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县城，控制了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礼县等县的广大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毛泽东对苏区军民进行动员教育，要求以热情诚恳的态度欢迎二、四方面军的到来，对过去的争论一概不谈，积极筹集粮食、牛羊，筹款买布，缝制棉衣棉裤，准备送给二、四方面军的战友，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党内的斗争，与人为善，诚恳相处，给予信任，不可求善太急，期待他进步的态度。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主力于 8 月底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并以聂荣臻率红一师直插静宁、隆德地区，9 月 18 日，攻占界石铺。10 月 1 日，红十五军团步、骑各一团组成的特别支队攻克会宁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已经指日可待了。

9 月初，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急忙将南调兵力调回陕甘，以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胡宗南部先头部队已达西北战场。9 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敌情变化，决定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以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以红二方面军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钳制与侧击胡宗南部，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的行动，以便三个方面军提前汇合。

9 月 18 日，中共西北局会议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讨论贯彻中央静会战役计划问题。张国焘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据古浪，江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进入甘北，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朱德、任弼时，陈昌浩等坚决主张立即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定。会议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当天，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静、会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宗南部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央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19 日，红四方面军发布了向静宁进军的命令。

然而，风云突变。张国焘离开岷州，跑到漳是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后，立即改变态度，命令四方面军部队停止北上，从通渭、渭源等地西撤，准备西进从循化地区渡河。于是，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开会，会议同意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决定四方南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占领甘北，而后实现与一方面军会合，全力夺取宁夏。9 月 22 日，张国焘命令部队西进，并致电中共中央，称：“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已令四方面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时机紧迫，千祈采纳。”9 月 26 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素，不同意四方面军西进。同一天，张国焘向中共中央连发四电，称：“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现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改动，务

祈采纳。”又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计划行动，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四方面军已开始西进行动。徐向前率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向老乡调查河西地形、气候等情况。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向前认为，地形、气候条件不利，渡河计划难以实现，9月27日，他把调查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向朱德、张国秦作了汇报。恰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上，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因此，中央认为四方南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区，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逼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9月18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徐向前地汇报，朱德、张国煮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方针，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执行中央指示北进。随即复电中央：“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红一方面军为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于9月30日派出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主力为左纵队，南下与先期占领界石铺的特别支队靠拢；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于10月2日进占会宁城。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中共中央立即来电表示“十分佩服与欣慰”。30日，红四方面军分为五个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北进。10月5日，重占通渭城。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会合。10月8日，红四军第十师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军团第一师会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10日，朱德、张国焘抵会宁，与红一方面部队胜利会师。

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胜利会师。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

10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致电毛泽东，兴奋他说：“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已胜利的实现了，全世界的群众奋起了，……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场面是极为热烈的。红一方面军将久已准备的毛衣、毛袜、毛手套、羊皮、羊毛、缝衣机和粮食、牛、羊、肉、菜、蜂糖等

大批慰问品，送给二、四方面军的战友们。战友们相见，紧紧握手，热烈拥抱，喜泪盈眶，欢呼阵阵，充满着团结、友爱、融洽、欢欣的气氛。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红军的领导者、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提出了会师后红军的任务：“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①]

中国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对于发展壮大红军的力量，开创革命的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35 年 9 月张国焘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时，毛泽东曾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一定要北上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毛泽东又对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总有一天要北上与我们会合，“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时间正好过了一年 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毛泽东的预言惊人准确地实现了。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7 册第 262 页。

致力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不少同志提出清算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一系列罪行。毛泽东为了等待一部分受蒙蔽的四方面军同志的觉悟，使全党、全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耐心说服了那些要清算张国焘错误的同志。对张国焘本人，他以诚相待。张国焘来到陕北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1937 年 3 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会议之前，毛泽东又把张国焘请到自己住处的窑洞——延安吴家窑洞里来，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话，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队伍拉到西康，并且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要他深入地进行检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张国焘很会演戏，他掉了几滴眼泪，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他还说出了自己的思想顾虑：怕从此以后，自己威信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今后无法再工作了。毛泽东给他讲解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劝他打消思想顾虑。张国焘临走时表露出一副很感激的面孔。

1937 年 3 月 2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红军军以上干部，共 56 人。会上，张国焘作了检查，原则上承认自己是“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对具体事实拒不认错，进行狡辩。随后，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张闻天、秦邦宪、凯丰、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彭德怀等 30 多人发言，以大量具体事实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大搞军阀主义、退却逃跑主义的罪恶活动，分析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深挖其错误实质及历史根源，与会大多数四方面军干部积极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自觉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张国焘在会上假惺惺地保证：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为了给张国焘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中央决定暂不给他做组织结论。

3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决定》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错误。这此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决定》揭示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阶级根源，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指出张国焘轻视党的领导作用，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中央的一切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面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实质。

《决定》指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估计，对敌

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对自己的力量的估计不足。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肿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的。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延安会议以后，1937 年 4 月至 6 月在党内和军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这是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4 月，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斗争大会，中央团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和罪行，批出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四方面军一些原来不明真相，对反张国焘路线心存疑虑的同志，听了都大力震惊，非常激愤，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有的还要求枪毙他。

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这次大会使大家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有了亲身的体会。西路军失败后历尽艰辛回到陕北的戴克林，参加大会后认识发生很大变化，他说：“毛主席才真正是最爱护干部、最爱护党内团结、最能以理服人的啊！“要是按张国焘的办法来处理，不用说今天的他（指张国焘），就是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枪毙，也得一撤到底，当挑夫，罚劳役。那真正是军阀主义呀！[①]

毛泽东还深入抗大了解情况，及时指导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健康发展。有一次，毛泽东到抗大调查研究，有的同志汇报说，四方面军一个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汇报同志主张整一整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当即制止这种做法，说：“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②]毛泽东从这件事情中，发现并纠正了张国焘路线斗争中一度出现的扩大化和过火行为。从而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

抗大清算张国素路线一度把矛头指向四方面军学员，引起强烈不满。有

[①] 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 452—453。

[②]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 276 页。

30 个干部，包括 5 个军级干部、6 个师级干部、20 多个团级干部和两个营级干部，准备离开陕北川陕苏区游击去。出这个主意的是许世友，订行动计划的是许世有，划行军路线的还是许世友！这个计划被党中央发觉并制止了。有人说许世友要领导暴动”，他听到后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他躺在延安的窑洞里。想到自己不能再活着出去。思想极端苦闷。一天，突然有人来看望他，并受毛泽东委托给他捎来一条哈德门香烟，许世有顿时精神大振，焕发了继续生活、斗争的勇气。

更出许世友意料的是，毛泽东亲自到他的窑洞中来登门看望，毛泽东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他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毛泽东热情的话语，温暖了许世友的心，一下子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的疙瘩，几十年后，当毛泽东逝世时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在《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一文中，谈到当年反张国焘路线的情景时说：“开始，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对这场反对对裂主义的斗争，还认识不够。一天上午，毛主席亲自到我住的窑洞中来看我。毛主席微笑着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同我促膝谈心。他爽朗地告诉我：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主席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我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给毛主席温暖的活语一扫而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促进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历尽艰辛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亲切温暖的谈话。徐向前回忆说：“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①]

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耐尽地进行教育和挽救，他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一会儿痛器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一会儿全盘翻案，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毛泽东感叹了：“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②]

张国焘患的是不治之症。这场顽石终于点了下头。1938 年 4 月，他借口祭黄帝陵，逃往西安，武汉，卖身投靠蒋介石，当了国民党特务。1938 年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张国焘叛逃时，警卫员不愿意跟他走，因此他连一个警卫员也没有带走。这一点，证明了张国焘非常孤立，也证明了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彭德怀说：“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采取坚决的人，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也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在张国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53—554 页。

[②]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 219 页。359——1Rq——

煮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煮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①]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培养干部。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又把培养干部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36 年 5 月毛泽东率东征军回师陕北不久，就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长征前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定名为“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各军团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只几天时间就把大批干部送进红军大学学习。

1936 年 6 月 1 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在瓦窑堡正式开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红大校部所在的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亲临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又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①]他指出，要办好红大就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要艰苦奋斗，要学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红大第一期学员共 1063 人，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干部。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编一个队，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均为团以上干部，共 38 人，平均年龄 27 岁，平均每人有 8 年战斗经验，有 3 处伤疤。第二科编两个队，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共 225 人。第三科编六个队，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 800 人。

红大初创时，在职干部仅 14 人，学校领导除毛泽东东外，大多由学员兼任。专职教员仅杨兰史、张如心、张秀山等，教员不足，就请兼职教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样、徐特立、李维汉、何克全、王智涛、伍修权都来学校兼过课。

当时保安条件非常艰苦，仅有几十户人家 300 多口人，学员们人人动手清理环境，把破石窑，改造成校舍和讲堂，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毛泽东来讲课了，他诙谐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一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红军甘肃会师后，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也会台

[①] 《彭德怀自述》第 219 页。

[①] 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中共党史资料》（7）第 27—28 页。

了。11 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由校政委何畏带领去保安，校参谋长张宗逊带其余部分到木钵，与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第一、二科、第三科分别会合。本钵学校随即改为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周昆任副校长，袁国平任副政委，张宗逊任上级干部队队长。11 月 28 日，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学员也由谭家述带领来到木钵，编入红大第二学校。这样，红大的教学员队伍都空前发展壮大。

红大第一期第一、二科在课程设计上是军事政汉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军事战略等内容。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在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讲的，前者是学校的基本政治教材，后者是红大的基本军事教材。其他的课程，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分别由张闻天、博古、凯丰讲授。

毛泽东在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既不用资产阶级军事战略学的教科书，也不用苏联的军事课本，而是深入到干部和学员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研究它的规律性，自己编写教材。讲课时，他从一般战争规律讲到革命战争规律，再讲到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大家十分爱听，有一次，他在讲课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问题，当他讲到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动脑分析研究，别人一鼓动，就打莽撞仗，结果好汉吃了眼前亏，仗没打好时，他精辟他说：“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突然，一名学员站起来说：“您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家的毛病，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印在学员的头脑里，而“不当鲁莽家，要当勇而明智的英雄”的名言就成了广大红军指挥员的座右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进入了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各方面需要大批干部。红大第一期遂于 1936 年 12 月底毕业，除部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才入红大学习的干部转入第二期学习外，其余全部分赴红军部队和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推动对日抗战的任务。

1937 年 1 月 20 日，红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岁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毛泽东兼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下编四个大队，学员前 1362 个，第一、二、三大队有红军干部 753 人，其中有部分军师团高级干部；第四大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 50 人；另有一个女生区队，多数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 59 人。在职干部也由第一期的 14 人增加至 87 人。

毛泽东亲自力抗大规定了基本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的建设反映出了明确地方向。毛泽东出席了抗大的开学典礼并讲了活，他指出，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侵略者。勉励大家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毛泽东的讲活，对学员们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是很大的教育启发。

毛泽东极其重视提高广大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影

响，毛泽东亲自到抗大讲授哲学《辩证唯物论》（后来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四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从 1937 年 5 月开始，一直讲到“ 七七事变 ”发生以后，共讲了三个多月 110 多小时。他讲课紧密结合实际，使大家人情 j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对革命的危险性。端正了思想路线，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初步肃清了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影响。

1937 年 5 月，毛泽东相继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他在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在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必要性，认为这是革命成败的关健。他还特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思想统一和严格的纪律。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全国各路红军齐聚陕甘宁，全党、全军的思想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严重白色恐怖时期被破坏殆尽的各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得以重新恢复，全党上下出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成为公认的全军统帅和党的领袖。

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全国各路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落入了最低谷。如何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是所有共产党人时刻关注的问题。还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变举起了“北上抗日”这一最能代表全国人民心声的旗帜。

长征一到陕北，1935 年 12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会议正确分析了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 12 月 27 日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他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①] 毛泽东的报告，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的重点，首先是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

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实力派。在蒋介石命令下，他们都参加了“剿共”战争。但是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们都有抗日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分析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情况，决心把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为建立抗日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步骤。

1935 年 9 月，张学良指挥“西北剿总”十万之众，向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陕甘仅有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人数只七八千人。然而首战劳山，东北军一一〇师大部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再战榆林桥，东北军一〇七师又遭沉重打击，六一九团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张学良认识到，红军是有战斗力的。10 月末到 12 月中旬，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行前，他嘱咐部下将领结红军作战要小心谨慎，严令在他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然而在他开会期间，直罗镇一战，东北军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个团被歼师长牛元峰又阵亡。在发动“围剿”的三个月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外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在东北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给了张学良及其所部官兵的极大震动，使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出路。他开始另找出路。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做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是促使张学良从“剿共”转向联共抗日的关键因素。在陕甘三战三捷中，红军俘的东北军官兵有数千人，其中军官有 600 人，红军对他们生活上给以优待，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红军把全体东北军被俘军官集中起来，开了一个热烈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并作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这使他们深受教育，非常感动，他们被释放回东北军后，积极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使东北军内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

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与张学良关系亲密，抗日要求相当强烈。被俘以后，他断定必死无疑，更不信会释放他，但是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而且对他待之如宾，让他参观红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版第 141 页。

军的营地和生活，红军领导人彭德怀等亲自找他谈话，使他深受教育。他主动找彭德怀说，张学良、王以哲等都有抗日的要求，东北军将士更是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与红军合作的。彭德怀果断他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种工作。"随即派骑兵护送高福源到王以哲部防地。

高福源到达洛川，见到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详细汇报了在红军中的经历和见闻，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王以哲立即密电张学良："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张学良接电后，第二天就亲自驾驶其座机飞到洛川。

张学良正在积极寻找与红军的联系渠道，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非常高兴，要高休息一二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式商谈一下。

1936 年 1 月 16 日，高福源进入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了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高福源，表扬他的行动。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去与张学良谈判。

为进一步争取东北军，1936 年春节前夕，毛泽东指示围困甘泉的红军：主动停止攻击，让开大路，纵敌南归。当时被围困在甘泉的东北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己被围三四个月，缺乏粮食，马匹已杀尽吃光，缺少柴禾，桌椅板凳门窗均已烧光。依靠空运接济，茶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以外无援兵，红军即使不进攻，这部分东北军也已无法继续维持。红军让路给他们南撤时，在路旁列队唱歌，送饭送水，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东北军官兵力红军的行动所感动，热泪盈眶他说：再也不来攻打红军了！

193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回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东北军的工作。6 月 20 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写信，指出："先生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蔽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记图之。"[①]毛泽东还单独给东北军军长于学忠、王以哲等写信，晓以民族大久，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东北军下层官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6 年二三月问，红军代表李克农到洛川会见王以哲，达成了红军与六十六军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通商和交通三个口头协定。随后又与张学良会谈，商定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会谈后，李克农于 3 月 7 日离开洛川，前往晋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会谈情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78—79 页。

3 月 16 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的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是有诚意的，即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李克农一道去延安会晤张学良。4 月 9 日，在延安天主教学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会谈，红军方面还有李克农和刘鼎，东北军方面还有王以哲参加会谈。会谈气氛热情坦率，开诚布公，就许多政治和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谈中，张学良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扭转蒋介石的错误政策，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就，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这是个重要方针政策问题，愿把这个意见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决定。张学良非常高兴他说：“ 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功，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会谈最后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谈判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一步。

毛泽东对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工作也给予很大关注。杨虎城当时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是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将领，主张抵抗日寇入侵。他与共产党人早有交往，大革命失败后，他保护过共产党人。他与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也不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毛泽东对杨虎城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决定利用蒋、杨矛盾，争取杨虎城联共抗日。

1935 年 11 月，中共北方局联络局负责人南汉震（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他曾任陕西省府秘书长，与杨虎城有深厚友谊），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到南京去找杨虎城，向他传达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建议他与陕北红军沟通关系，订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杨虎城对宣言内容表示同意，要南汉宸提出实行合作的具体办法。南汉宸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供杨虎城考虑。

同月，毛泽东派在陕西省委军委长期负责十长路军地下党工作的汪锋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行前，毛泽东与汪锋进行了多次谈话，询问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情况，汪锋作了详细回答。然后，毛泽东精辟分析了全国政治形势，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交代谈判的具体任务。他说：“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 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 中央 ’，同‘ 中央 ’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 ”“ 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 西北大联合 ’ ”，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又说：“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 ”“ 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

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1]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嘱咐，使汪锋对完成谈判任务充满信心。

12 月 5 日，毛泽东、彭德怀写了一封给杨虎城的信，交给汪锋带去转交。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2]

汪锋到西安后，三次会见杨虎城，转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信，双方确定了联含抗日的原则。

12 月下旬，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工世英到达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双方进行抗日教育、抗日准备等协议。

1936 年春，王炳南从德国回国，党中央派他去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信心。

后来，杨虎城思想有过动摇，毛泽东又亲自写信做工作。8 月 13 日，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赞场他“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也批评了他：“全国各派联全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1]同时，毛泽东给爱国进步人士、杨虎城的总参议社斌丞写信，请他给杨虎城做工作，以坚定杨联共抗日的态度，9 月，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张文彬即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这样，红军与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关系正式形成。

对山西军阀阎锡山，毛泽东亦积极进行争取工作。红军东征的胜利，使阎锡山尝到了厉豁。红军回师后，毛泽东于 1936 年 5 月 25 日致函阎锡山，揭露蒋介石强制、监视晋军反共的险恶用心，表示红军愿与晋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的真诚意愿。阎锡山因恐遭蒋们石排斥、控制，又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为了保持对山西的统治，被迫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中共派正式代表谈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派遣彭雪枫、南汉袁为代表，携带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阎表示愿意联共抗日。彭雪枫即以中共联络代表名义在太原住了下来。12 月 22 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阎锡山，表场阎在西安事变中反对内战、“共维大局”等主张，提出了建立电台联络、徒步通信站、晋陕经济通商等建议。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各项要求均得到了落实。

薄一波出狱后，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他向阎锡山提出了三条：第一、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都做，不利的事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对我们用的

---

[1] 《西安事变新历记》第 105—106 页。

[2] 《西安事变简史》第 20 页。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8 页。

人，应保障安全。阎锡山表示同意。这样，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山西也获得了重要进展。

1936 年 12 月 12 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爱国义举，毅然扣留了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2 月 12 日晨 5 时前，张学良致电毛泽东、电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旧怨，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道，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准备全国抗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继续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他根据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适时地向全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其中，特别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任务的中心环节，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此，1936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希望蒋介石能够履行他在西安允诺的条件，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证人民权利、联合红军抗日等，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翌年 2 月 9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现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此后，国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谈判。

毛泽东除在原则上和具体步骤上对谈判工作进行指导外，还从多方面着手，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多次致信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力陈抗日救国大义；1937 年 5 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负和平使命赴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口号；继 1936 年夏秋间同斯诺的谈话之后，他又先后接见吏沫特菜、海伦·斯诺、范长江、厄尔·H 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既告诫全党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又及时提醒党员干部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和联合，注意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他亲自起草祭黄帝陵，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祭扫黄帝陵，表达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仰和团结全民族共赴国难，光大古邦的决心。

经过毛泽东和全党上下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及其年领导的军队，迅速从逆境中走出，成为抗日救亡的旗帜、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毛泽东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投入民族抗战的神圣事业。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坚定无畏的丰碑。在这座雄伟的丰碑上镌刻着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光彩夺目的名字，而最不寻常的名字是毛泽东。长征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对长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的名字将与长征这座丰碑一道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人们将一代又一代地从毛泽东的身上吸取勇气、智慧、献身精神和创造精神。